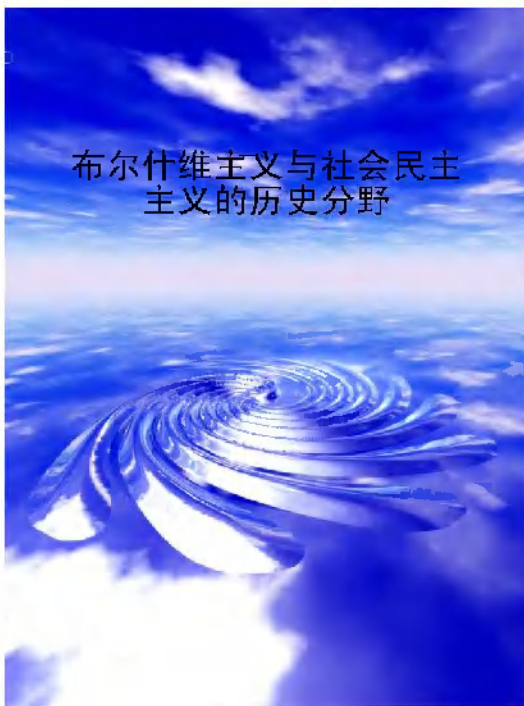


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
主义的历史分野



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 历史分野

张光明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

张光明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9

ISBN 7-80109-339-9

I. 布…

II. 张…

III. 社会主义-派别-思想斗争-研究-俄国

IV. D6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484 号

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 张光明 著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欣新照排中心(84028707)

印 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59 千字

印 张:7.25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1.40 元

|| 引 言 ||

问题的提出

这里要讨论的,是发生在本世纪初的一件往事,但在我看来,却是一件奠定本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总体格局,进而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往事。它不仅仅具有历史的兴味,而且还具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当代现实意义,这就是,它对于回答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

我们这个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演进中的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现象是:它似乎与19世纪的理论预测恰好相反。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本应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从而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西方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取得胜利。而历史发展的事实却是,社会主义在欧美资本主义中心地区迄无革命胜利的记录,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远为低下的东方“边缘”或“外围”地区,它却意外地通过革命获得了统治。现实与理论似乎“脱节”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正是这一基本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始终引起世界范围内无数的争论,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正挑战。熟悉

这些争论的人们都知道,这种挑战不仅针对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结论,而且涉及到了引导出这些结论的理论方法。

西方学者中相当普遍地认为,历史的实际进程早已证实了马克思学说的根本错误。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恰好是上述现实与理论的“脱节”表明,社会主义之替代资本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运动必然规律的结果,而只是主观意志作用的结果。1983年马克思逝世百年之际,一位作者向这位百年前的思想家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达并没有带来革命的必然性,因为,“在多次的灾难性发展面前,工人阶级不但采取观望态度,而且往往保持沉默和漠不关心”^①;而按照S·胡克更早的说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1917年10月,当共产党人在俄国夺取政权时,资本主义已经走完了自己的全部路程”^②。胡克的著名主张是,1917年10月的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列宁这个意志坚强的领袖一手造成的而已。^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现实与理论的矛盾证明了理论的错误,错误的根源则在于马克思那灾难性的“经济决定论”或宿命论。^④由此得出的进一步

① 内格特:《致马克思的一封信》(按:该“信”系在马克思逝世百年时对马克思学说的质疑),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4年第9期第5页。

② 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页。

③ 参见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第十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④ 例如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考虑到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先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及不发达世界的状况的前景,经济决定论似乎已成为马克思著作中一个基本的(虽然是非常有启发性的)错误了。”(《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9—130页)

结论还有,马克思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历史的客观规律,而只是提出了一种具有盲目信念的宗教,^①等等。

上述意见由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是毫不奇怪的,本来也不能指望他们称赞马克思。然而,他们所揭橥的问题却不能说不存在。更重要的是,由共产国际和苏联 20 年代以来所奠定、至今我们仍还在经常重复的学术传统,同样没有对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按照这一传统,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和东方落后地区历史结局的不同,应当归结为“主观条件”的不同。据说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欺骗、“收买”、机会主义者的叛卖等等因素,使得本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西方一次次错过机会;而经济落后的东方却由于有坚强的革命党和正确的纲领策略而克服困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解释方式初看是合理的,用于考察具体事件的直接原因有时也是有用的,但运用于如此广泛深刻的历史过程,立刻便显示出其肤浅和极大的不彻底性。因为它势必会引出下面的问题:既然“主观条件”足够强大便能改变“客观条件”,那么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一致性还存在吗?而且,这些与“客观条件”无关的“主观条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对这样的问题不能给出合理的答案,就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带进神秘的境地。当年著名的德国共产党人克拉拉·蔡特金显然是处在俄国革命的强烈印象下,困惑地解释说,革命不仅有赖于经济条件,还有赖于意志,而这些意志是由“一些不能加以统

^① 列如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牛津克莱伦登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 卷第 526 页。

计的、不可捉摸的、不能计算和衡量的因素”决定的^①。这样的解释在理论上能算是解释么？它并没有使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前进半步，反而使我们转弯抹角地回到了我们刚刚引证过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不幸的是，蔡特金所遇到的困难，正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理论传统的必然归宿。

与此密切相联系的另一种情况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无论在东方和西方，其实质内容也都大大区别于19世纪的理论规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民主社会主义一直占优势地位。尽管历经演变，但它在政治上的最大特点是改良主义，在理论上的突出特征是伦理社会主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正式与马克思主义告别。时至今日，民主社会主义已完全融入西方政党政治框架中，在基本价值上则信奉“自由、公正和互助”。这与从历史规律性出发，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根本改造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毫不相干了。而在苏联这样的“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布哈林当年的说法）里，尽管马克思主义被抬举到国家学说的地位，但由斯大林在30年代最终确立了的社会体制，却在一系列根本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它那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方面高度一体化的中央集权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在实质上迥然不同。《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里变形为领袖代管制。

①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册第320页；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2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之大的差距呢？

在过去几十年的尖锐对立中，苏联方面无数次地抨击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而社会民主党人反唇相讥，指责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为党的“精英”专政。处在这两大队伍之外的托派思潮和独立左翼知识分子则往往两面出击，既批判民主社会主义，也批判苏联的“官僚社会主义”。远者如托洛茨基，把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称做叛徒，近者如芒德尔，认为“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以及“包括改良主义渐进论的各个变种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都犯下了违反“正确的理论”的罪行。^①

这些指责都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简单地把现实与理论对立起来，用违背、“背叛”之类的概念去否定你所不同意的现实，痛快则痛快矣，可惜并不深刻。它至多只陈述了一种现象，却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而弄清“为什么”而不只满足于“是什么”，正是任何一种科学的基本要求。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总结过去的历史，不能仅限于政治或价值判断，而是需要客观的分析。我们认为，只有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即运用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恩格斯在分析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说过：“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② 这句话完全适用于我

① 参见芒德尔：《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载《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4 页。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3 页。

们这里的情况。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东方和西方形成巨大差异的原因,不应当满足于从运动参加者的主观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深入向下,从世界物质生产力总体发展高度之上的种种复杂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的总和中去寻找,也就是说,应当善于把“主观条件”归结为一定的“客观条件”,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本身中去挖掘其规律性。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才能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力,才能对我们这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进程达到规律性的认识,也才能对激动着、搅扰着人们的许多当代问题获得一个明晰的理论—历史的认识基础。

从这个角度着眼,本世纪初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分野便格外引人注意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欧洲社会主义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各国劳工运动蓬勃展开,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建立起了社会民主党或类似的政治组织;马克思主义已由先前众多社会主义派别中的一支,上升为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学说。1889年第二国际的成立,则进一步把正在发展中的各国工人运动联合为一个整体,构建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更值得重视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越出了自己的发祥地——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西欧,扩展到了工业化程度远为落后的东欧地区,甚至还向欧美以外的非资本主义地区进军,从而开始形成成为一种世界性力量。总而言之,理论和实践的成功交相辉映,呈现出一片缤纷绚丽的图景,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如此辉煌的进步却以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剧烈分化为结局。在第二国际时期,就整体倾向而

言,这种分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趋势:西欧社会主义的主流逐渐趋向于改良渐进式的道路,俄国社会主义的主流却日益激进和革命化,这种差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相当深刻,但似乎还未引起普遍注意。大战则使之显示出了先前潜藏着的严重意义。在西欧的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那里,革命的信念立即让位给民族的情感和对现存制度的认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却利用战争带来的灾难,在1917年抓住时机一举夺得了政权,把落后的俄国引进了苏维埃时代。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为契机,曾经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20年代最终一分为二,从此形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地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东方广阔落后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对峙与冲突。正是由此奠定了本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格局,铸成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历程中的种种复杂困难和全新问题。这种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90年代苏联东欧大崩溃时;但即使在今天,它的影响仍在发挥作用,仍然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

这样,抓住本世纪初西欧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的地区性分化,从那一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中深入挖掘其经济和社会的根源,进而在各种政治、思想、理论、实践的表现及其相互关系中找出客观的发展线索,把这一影响巨大的分化当作一个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去对待,便很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我们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性。而这,也就是本文为自己规定的任务。

目 录

引 言	问题的提出	(1)
第一章	西欧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地区性分化的背景	(1)
一	世界的整体化特征	(1)
二	西欧资本主义	(4)
三	俄国资本主义	(10)
第二章	渐进式道路：西欧社会主义	(16)
一	改良与改良主义	(16)
二	革命与改良之争	(35)
三	历史观领域中的理论成就与困难	(54)
第三章	超越式行程：俄国社会主义	(65)
一	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65)
二	列宁的建党理论、革命策略及其反对意见	(83)
三	帝国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战略	(104)

第四章	关于俄国社会主义与西欧社会主义的关系 ·····	(115)
一	从隔绝到汇合·····	(115)
二	从“仿效”回到“互相补充”·····	(122)
三	西欧看俄国社会主义·····	(129)
四	俄国看西欧社会主义·····	(136)
第五章	大分野:革命在俄国和西欧 ·····	(141)
一	革命在俄国·····	(141)
二	革命在西欧·····	(151)
三	从分化到对立·····	(162)
第六章	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各自的发展 ·····	(171)
一	从社会民主主义到“社会的民主主义”·····	(171)
二	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	(178)
结束语	几点看法 ·····	(184)
	主要参考书目 ·····	(193)
	后 记 ·····	(203)
	附 录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	(205)

|| 第一章 ||

西欧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 地区性分化的背景

一、世界的整体化特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科技、工业、社会直至观念都经历急剧革命性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对往后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时代。

那一时代的一个首要特征就是,历史已经最终转变为世界史。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 世界史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推动下逐渐形成的。“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 卷第 28 页。

生活条件”，^①因此，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世界性的动态力量，它必然地在自身内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不断向外开拓扩展，把先前彼此分隔的各地区各民族一批批地卷进普遍联系之中，从而使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特征的统一的世界历史，逐步取代先前以孤立发展为特征的民族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借以实现的特定形式，也是全球工业化、现代化展开自身的历史手段。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这个伟大的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真正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结构，使世界历史最终形成的，当属 19 世纪晚期展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浪潮的迅速扩大，德国、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相继完成，俄国发生了农奴制改革，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这些事件使得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尾随西欧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紧接着，势头越来越猛的科学和技术进步，把世界推入了新一轮新的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它促使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大举扩展，所到之处无不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在 1870 年以后的 30 年中，世界工业生产几乎增长了四倍，新的生产部门接连建立，新的产品大批问世，新的交通通讯手段神话般地缩短了地球上的距离。生产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必然促使资本、信贷、金融、贸易以更大规模向全球拓展。在这段时间里，英、德、法等国的资本输出增加了几倍乃至几十倍，国际贸易增长了 1~3 倍。资本的国际化成为一种普遍趋势。生产的社会化已经超出个别企业、部门甚至国家，而扩大到世界，它使得资源和劳动力的利用都日益国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26~127 页。

际化了,从而使得完全统一的“世界市场”最后形成。这个过程,同时伴随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对世界广大落后地区的加速扩张和控制。19世纪晚期开始,西方列强通过考察、探险、开发直至军事行动,渗入、吞并和瓜分了亚洲、非洲及拉美的大片地域,把它们也强行纳入“世界市场”。

在这样一场运动中,20世纪初的地球已差不多完全被卷入统一的联系中。闭关自守、孤立自足的状态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相互制约紧密依存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与此相一致,世界在精神领域也日益成了一个整体。科学、文化以至各种社会思潮、理论体系,日益超越自己所由产生的民族地域界限,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总之,世界不论在物质生产活动还是在精神活动中,都已经联接成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体化的整体。

正是在这一整体化发展的前提下,社会主义才能够超出西方资本主义地区的地域界限,成为真正世界性的思潮。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矛盾的理论反映和阶级斗争表现,本来只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相当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因此毫不奇怪,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世界扩张力还十分有限的阶段,社会主义发展主要还只局限于工业化的西欧。然而,19世纪晚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随着工业化运动由西欧向世界的扩展,西欧的经验和理论也日益获得世界性影响。作为西方社会发展最新成果的社会主义,自然到处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切关注,从而在经济落后的地区也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社会主义发展程度大致对应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的状况愈益成为过去,它愈益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剥削的运动和理论表现,扩大为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先进

政治力量解决自己社会矛盾的斗争手段。因此,当两个世纪交替时,尽管以易北河为界,东西欧的经济发展程度大不相同,^①社会主义却无可阻挡地席卷了欧洲所有国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

但问题的另一面同样不容忽视。各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状况、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们在世界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吸纳并利用世界成果于自身时,必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选择态度和目标取向的差异,从而使同一运动在不同地区可以出现大异其趣的面貌,甚至导致全然不同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说,西欧和俄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在共同旗帜下走上迥然相异的道路,原因正在于它们分属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由此,社会主义在这两类地区必定要在与各自的物质条件、人力资源与思维方式的相互作用中,发生适应性的变化。

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考察西欧和俄国的各自特点。

二、西欧资本主义

先看西欧。

西欧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祥地和先行者,其特有的历史优势使它能够充分利用工业革命的成果,促进自身的发展。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洗礼中,西欧资本主义依靠其发达雄

^①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厚的物质力量,于世纪之交时已初步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在工业革命狂涛巨澜的推动下,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已经成为显著的经济发展趋势。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各种联合组织形式越来越普遍,规模越来越大,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力越来越加强。随着生产社会化的扩大,国家资本主义也已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对这些经济现象,不能像以往那样简单用资本垄断—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革命的公式去概括,而应该看到,它们其实是产生于并适应了生产高度社会化的需要。它们固然有时会造成技术的封锁、发展的停滞,但就总体而言,却是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正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

不难理解,资本固然从生产的突飞猛进中获得更丰厚的利润,但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也得以在此基础上实行全面的改善和改革。我们在此没有必要对这些事实详加论述,而只来谈谈它们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首先一个事实是,工人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的改善。蒸汽革命曾给人留下丑恶的印象:西欧曾经到处是滚滚的烟尘,污浊的城镇,劳累过度的劳动者。而现在,这种状况开始发生了改变。各国先后通过了缩短工作日、实行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的立法。据库钦斯基统计,资本主义世界工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从1870—1879年的74小时减到1900—1909年的61小时。^①保护女工和童工,对工资实行监督,实行卫生安全条例以及工伤疾病保险等措施,也都先后提出

^① 参见波诺马廖夫主编:《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2卷第42页。

了。^① 先前恶劣的居住条件有了较大改观。特别在英国,许多工人到 19 世纪末都有了自己的小型单独住宅。而当恩格斯于 1893 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德国时,他惊奇地发现,工人住宅的门面,许多同以前相比竟然装饰得“像宫殿一样”。^② 一般说来,《资本论》中所描写的工人的“可怕的使人堕落的”^③ 居住方式,在西欧各国正在逐渐成为过去。

与此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有较大增长。增长的幅度,在各种著作中估计不等。根据苏联学者库钦斯基等人的统计,19 世纪最后 30 年中,西方主要国家实际工资提高 30—50%;^④ 英国学者克拉潘认为,英国工人在 1900 年的实际工资比 1850 年高出 50—75% 左右;^⑤ 社会主义史学者 G·D·H·柯尔则认为,1850—1890 年间,英国工人平均工资提高 70—80%。^⑥ 这一时期,主要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价格均呈下降趋势。在英国,面粉、土豆和糖的零售价在 1877—1900 年间下降了一半,面包和肉的零售价下降了 1/3; 西欧其余各国价格也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⑦ 因此,普通工人可享用的食物、衣服等消费品远较以前为多。

与上述改善相伴随的是工人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政治权利的

① 参见《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第 2 卷第 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131—132 页。

③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99 页。

④ 参见《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第 2 卷第 43、44 页。

⑤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三联书店 1971 年版下卷第 568 页。

⑥ 见他所著《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简史》,伦敦 1960 年修订版第 266 页;又见该书的第 10 章后所附表 7。

⑦ 《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卷第 568 页。

扩大。英、法、意等国到 19 世纪晚期都相继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英国始于 1870 年，意大利始于 1877 年，法国则从 1882 年起实行儿童义务世俗教育。^① 从上世纪下半期起，经过一系列政治改革，西欧工人的政治地位有明显提高。到 20 世纪初，绝大多数西欧国家都已经实现或接近于实现普选制。工人运动在各国先后取得了合法地位。其中，英国工会组织在 1871 年得到法律承认，1875 年，议会废除主仆法，代之以《企业主和工人条例》，以法律形式承认劳资双方享有平等权利；法国工会于 1884 年最终取得合法地位；在德国，1869 年北德邦联通过“工商业条例”，承认了自由联合的原则，但加以严格限制，然而，特别从 90 年代起，工会运动蓬勃发展起来。^② 到 20 世纪初，英、法、德等西欧主要国家的工人组织和政党都为法律所承认，它们参加议会，拥有强大的议会党团，发行数量可观的报刊，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

对于上述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不能简单地用资产阶级欺骗收买之类的政治概念去说明。应该看到，这是生产力提高和工人阶级长期斗争双重合力的结果。生产力的提高造成财富的增长和道德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劳动力必要生活消费资料的范围；^③ 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劳动力有更高的文化素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保证资本获得丰厚利润之余，也使工人提高工资成为可能。以上这些，构成了工人阶级状况改善的

① 《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卷第 43 页。

② 《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第 2 卷第 39~41 页。

③ “和别的商品不同，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包含有一个历史的道德的要素”（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62 页）。

客观物质条件。然而,对本地奉行“积累啊,最大限度地积累”的资本家个人来说,是不可能自觉主动地把这些客观可能性变成现实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强制性的政治压力。工人阶级对资本的斗争正是在这里面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推动作用。柯尔便颇有见地地指出,如果没有有利的经济条件,工会运动无论如何不能使工资提高;但如没有工会运动,则再有利的经济条件也不能自动带来较优的工资。^①

上述社会进步,特别是与工人阶级直接有关的改善和进步,必然在这一阶级的一般心理上引起深刻的变化,培养起他们争取自身条件改善的斗争与社会改革间的利益一致感,使之对社会本身产生认同。这是一个社会心理适应于社会存在的突出例子,而且可以从大量的历史材料中得到实际证明。关于有关的历史材料,我们将在后面详细列举,此处暂置不论。这里只需指出,正是在当时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前列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心理适应过程开始得最早。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西欧各国的后来居上,同样的过程又在许多地方以惊人的精确性重演了。这是毫不奇怪的,它使我们想起恩格斯的一段极富启发意义的话:

“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以致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

^① 《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简史》第 267 页。

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①

以上所述各种变化,若从总的历史联系中看,便更加耐人寻味。它们不是局部、偶然、人为的变化,^②而是资本主义在新的高度上发挥其“一体化”功能的自然结果。这种功能在于,资本主义以保证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为前提,通过经济、政治、法制、文化心理等各个领域的综合作用,对自身的固有矛盾实行经常性的随机调节。这种随机调节并不足以根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但却能够通过疏通、协调去减缓矛盾破坏性的一面,发挥、利用其建设性的一面,对矛盾实行转化、包容,使之成为社会组织平衡和发展的必要环节。它一方面恰好是通过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去达到社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又能够把工人阶级的反抗心理潜移默化地保持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以致使这个“掘墓人”在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危机到来时,也由于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而难以走向革命,从而使资本主义赢得重建的时间。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网络中,西欧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492页。

② 但若尊重事实起见,这里也应补充指出,特别在起初,统治者的有意的“怀柔”政策确曾存在过。例如俾斯麦就明白道出了他的计划:“工人健康时,给以劳动权,当他有病时,给以照顾,当他年老时,给予救济……这时唯登纲领的保卫者们(按:指社会主义者)的大吹大擂就是枉费心机——云集在他们周围的追随者将会因而大减……”(参见M.M.舍英曼:《梵蒂冈史——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167页。)

资本主义建立起了适应性极强的、如葛兰西后来所说的“坚强的结构”。^①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在这一地区已进入成熟时期，获得了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宽广余地。而马克思说得好，“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②

三、俄国资本主义

再看俄国。

俄国资本主义与西欧资本主义大不相同。西欧资本主义是中世纪晚期以来封建社会内部一系列经济变革的自然结果，俄国资本主义就其直接形式而言，却是由政府从外部“移植”过来的。^③在历史上，俄国社会具有显而易见的东方色彩。分散孤立、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和至高无上的专制国家长期互为条件，形成了坚固的“亚细亚式”的社会结构，使得任何重大的变革都极为困难。当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已经横扫西欧时，农奴制和闭塞、愚昧、盲从仍统治着俄国。所有这一切，使得俄国与正在大步前进的西欧相比，不只是严重落后，简直是停滞不前，形

① 参见《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③ 强调这一特点，应当说是民粹派的功劳。但民粹派不懂得，这和“移植”并不证明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前途；他们不懂得，“外生型”的资本主义，本身就具有其深刻的世界历史背景，如具备必要条件是完全可能发展起来的。

成了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假如俄国是孤立存在的,它的这种停滞恐怕还会长期延续下去。然而,近代以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使得孤立状态愈来愈不可能,俄国和西欧在地理、文化以及国际往来上的接近更使得它无法抗拒西欧的影响。“十六世纪以后,它同欧洲各国的每次冲突都使它痛感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无论是否愿意,它都得想想要从欧洲学点东西。”^①这种学习起初还是时断时续,在彼得一世时期便加快扩宽,到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后,外力的逼迫终于把俄国推上了资本主义道路。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在资本主义方向上奔跑得异常迅速,到世纪之交,在一系列工业进步的指标上已可与最先进国家比肩,例如钢、机械动力使用、纺织品生产等,便是如此。^②

但是,这种输入的资本主义,不仅在时间上大大晚于西欧,而且在结构上也大不同于西欧。它是由专制政府出于财政的需要,以维持加强专制制度为目的培植起来的,因此不仅带有幼年资本主义的一切弱点,还兼具先前东方专制主义的种种令人憎恶的弊病。1861年改革后,沙皇政府首先是把工业化的负担强行压到农民身上,通过巨额赎金和高额税收,拼命剥夺农民以满足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在“解放”后的15年里,农民缴给

① 普列汉诺夫:《俄国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4页。

② 参见T.山宁:《作为一个“发展中社会”的俄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3页。

国库的款项至少比自己土地的收入多 20%，有时甚至超过 1—2 倍。^① 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由于国内积累不足，技术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农业而发展的。在改革后的最初年代里，农业急剧地衰落了。^② 农民大批破产、迁移，流入城镇而无产阶级化。在工业体系内部，资本是靠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时间，尽量压低工人工资甚至欺诈勒索来获取利润的。俄国是欧洲各国中工作日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的国家之一。80 年代莫斯科省大多数工厂的工作日在 12 小时以上，其中有 44% 的工厂的工作日是 13—13 小时半，11.6% 的工厂是 14—14 小时半，5.4% 的工厂在 15 小时以上。直到 1897 年才通过一个工厂法，把工作日限制为 11 小时半。俄国的实际工资仅及西欧主要工业国家的 1/2 到 1/3，而粮食价格经常在上涨中。^③ 工厂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缺少必要的劳动保护手段，因而工伤事故不绝。工厂纪律可怜如其分地称为“棍棒纪律”。政府对这些都不加干预，却只是命令它的警察们随时镇压工人的闹事骚动。^④

沙皇专制的严酷是世界闻名的。俄国政治的腐败、颞预、效率低下、为所欲为，举世皆知。农奴“解放”后，颁布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似乎给人带来过一缕清风。然而事实上，这些改革不仅规定得十分片面，而且推行得相当缓慢，对许多偏远地区来说，

① 参见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三联书店 1978 年版上册第 152 页。

② 参见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85 页。

③ 《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第 2 卷第 70 页。

④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93 页。

它根本就不曾存在过,无法无天的拷打、监禁、迫害、流放,仍然层出不穷。俄国的警察制度是高度完备的。自上而下的一张监视控制网,笼罩着全国,随时准备惩治每一个敢于抗命的人。在这里,工人的罢工、集会、结社是非法的,随时会遭到镇压,争取政治自由和对沙皇制度的批评都被视为犯罪,受到的制裁从警察局监视、逮捕,到流放、驱逐出境不等。^①

一位目睹过 20 世纪初日内瓦“五一”节工人游行的俄国人,把西欧同俄国的政治差别最形象不过地描述出来了:

“……游行队伍安静而又规矩地行进。换上了整齐的服装,阵容也确实稍有加强的警察和宪兵对着红旗举手行礼,而阳台上 and 开着的窗户旁站着脑满肠肥的资产者,他们看着工人的游行示威,时而得意洋洋地、悠闲地露出一丝笑容。

我脑海里浮现出在那里,遥远的俄国,庆祝这个日子的情景来……难道我们那里的资产者和官吏们有胆量如此无忧无虑地来观看工人的游行示威吗?不,他们会胆怯地把窗户关上,把大门二门也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哥萨克和宪兵会挥舞起出鞘的军刀,举着皮鞭从埋伏的地点跳出来,于是石块飞舞,枪声大作!血呵,热乎乎的工人的血呵,就如注地喷溅出来!”^②

这样,俄国工人阶级的心理状态在许多方面恰与西欧工人相反,就不足为奇了。当西欧工人可以指望用合法手段争得自己地位的改善,从而逐渐淡漠了革命时,俄国工人却愈益强烈地

① 可参见 A. ① 沃夫奇克:《革命前时期沙皇政府的工人政策, 1895—1904 年》,里沃夫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62 页。

② 米·伊·瓦西里也夫—尤任:《在第一次革命的烈火中》,《回忆列宁》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5 页。

倾向于革命。一般说来,当他们尚处于闭塞状态时,沙皇政府还可以指望用“慈父沙皇”之类的传统愚民政策来欺骗控制他们,而一旦西方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涌入,欺骗便如冰融一样迅速瓦解了。1905年“流血星期日”以前,工人中的一大部分还抱有对沙皇的传统迷信,从那以后,革命情绪便开始迅疾占据他们心灵,以至沙皇在1917年革命之前许久,在民众意识中便已视同独夫民贼了。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不能简单理解为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缺少统治经验,而在于俄国资本主义薄弱所决定的生产力落后。尽管如前所说,到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某些单项指标方面可与先进的西欧并驾齐驱,但在整体经济实力上仍不能与西欧同日而语。由此决定,俄国尚不具备建立西欧式社会组织物质条件。俄国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于发展不足,它不得不与前资本主义关系新旧杂陈、彼此渗透、内在互补,借助于专制制度、农奴制残余、赤裸裸的强制手段、无节制的欺诈勒索……去维持和促进自己的发展。这是外生型资本主义在其早期阶段上必然经历的过程。它的脆弱之处在于,不是运用内在的随机调节机制使矛盾疏通、分散、转化,而是靠外在的强制力量把矛盾打入地下,使之处于压抑状态。这又是一种独特的过渡中的资本主义,即依靠前资本主义关系的营养液和专制制度的襁褓生长的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规定了俄国社会的两个特点。第一,矛盾的异常尖锐。专制制度的暴力、欺骗、迫害是一种坏的社会自我调节方式,它不是使矛盾的破坏性分流减缓,而是使矛盾在压抑中积聚,一旦在适宜条件下施放出来便必然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第二,一旦发生革命,必然兼有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性质。在具备了社会

主义领导力量的条件下,这便可能使得历史上两次性质不同、时间相隔的革命大大接近,甚至合而为一。

※

※

※

在上述背景下,西欧这个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发祥地,由于自身社会结构的变化已难以直接实现马克思的预测;而在俄国,它却意外地变成了针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武器”。在世界高度整体化趋势与不同地区社会组织特点的相互作用中,隐藏着本世纪初欧洲社会主义分化的根本秘密。

|| 第二章 ||

渐进式道路：西欧社会主义

一、改良与改良主义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本世纪初亦即第二国际时期的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以合法斗争为主。在这方面，它取得的成就是无法否认的。然而与此同时，在运动中又大面积出现改良主义。这两者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长期以来似乎没有人讲得很清楚。人们往往天真地把运动的成就归功于马克思主义者，把错误分派给改良主义者，截然二分，泾渭分明。^① 与此相联系，对第二国

^① 例如有较大影响的克利沃古兹的《第二国际》就明白宣布了这一点（见该书莫斯科1964年版第485页）。祖波克主编的两卷本《第二国际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译本）事实上也持同样看法。

际的分期也经常有在革命与改良主义之间纠缠不清，难于找到一个公允的分界线。^① 改良主义出现的原因，据说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它的大面积泛滥，则是由于运动的领导者们放松警惕，缺乏戒备所致云云。

从前述历史背景出发，上述说法便毫不足取了。应当寻找另外的原因。实际上，西欧社会主义的成就和改良主义化是二者并进、互为因果，有如一个钱币的两面。所以问题不在于根据某种先定的抽象原则两者必择其一，而是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去认真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转换。

〔一〕

总括起来，可以把当时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归纳为四。

1. 社会主义政党普遍发展，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大为加强。在第二国际时期，社会民主党遍及欧洲几乎所有国家，总人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近 340 万人，出版的杂志报刊达数百种。^②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大量印行，他们的学说得到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以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按科拉科夫

① 分期问题上的观点演变是很有意思的。斯大林时期，当人们拼命诅咒第二国际时，就把“改良主义阶段”尽力朝前推，如《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2 版第 18 卷第 289 页，把这个起点定在恩格斯逝世后（显然，这个上限已无法逾越了）；后来当人们试图改变态度公正对待第二国际时，又把改良主义阶段不断往后移。祖波克主编的《第二国际史》把时间移到 1904 年（见中译本第 1 卷第 4 页）；在国内，这十几年来先后出现了 1910 年、1914 年等分期法。

② 祖波克主编：《第二国际史》第 1 卷第 10 页。

斯基的说法)。也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定期召开代表大会,建立联络机构,加强相互联系,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结成了一个密切的整体,协调合作成为主流。在上述成就中,合法活动实在与力不少。

2. 团结组织工人阶级,极大地促进了工会、合作社、妇女及青年运动。从历史上看,这些运动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工人阶级在抵制资本的剥削时自发形成的斗争方式。当上世纪末西欧社会主义迅速发展起来时,给这些运动带来有力影响,不仅使它们的宗旨更为明确,还使它们的活动更有组织,规模更加扩大,运动方式更为丰富多样。在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第二国际时期先后建立了国际工会组织、国际妇女组织和青年国际组织。一次大战前,国际工会有一千万以上会员,合作社组织也达到七百万人。^①

3. 争取劳动立法,促进工人阶级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在这方面,世纪之交的西欧社会主义运动投入极大力量,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在第二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争取劳动立法都是重大的讨论课题;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都运用罢工、请愿等形式,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运动,使工作日的缩短、劳动保护、安全卫生条例的确立、残疾老弱保险等等,开始法律化、程序化,为往后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处境好转的斗争,开辟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4. 从事议会斗争。议会斗争在这一时期被肯定为主要的活动手段。西欧各社会民主党通过不断努力,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议会党团,扩大了选票和议席,使议会成为自己的重要活动场

^① 祖波克主编:《第二国际史》第1卷第10页。

所。在议会中,社会主义者们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对政治民主运动的支持、对工人及其他劳动群众利益的维护,对军国主义的尖锐谴责和抵制,不仅直接有益于工人阶级,而且也大有助于推动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日后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组阁,也正是由此而来。

以上这些成就,在第三国际和斯大林观点占统治的时期,均遭贬损,不是被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提,就是干脆跟机会主义等同起来。其理由很简单,就是它们都不是革命。这当然是极不公平的。列宁当年曾称这些成就为“历史性的功绩”和“觉悟的工人永远不会抛弃的不朽成果”,^①近十余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已对这些成就给予了越来越多的肯定。这确实是十分必要的,那种不问实际情况,不考虑具体条件,一味放言空论的“唯革命论”,应当彻底抛弃。

然而,仅此还不够,还应进一步看到,这些成就既然都是依靠合法斗争取得的,而且它们主要并不在于为革命做准备,而是具有在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秩序下谋取进步的独立价值,那就是说,它们都是属于改良的范畴。改良不等同于改良主义,前者是一种活动方式,后者则是一种情绪或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它们两者间又确有某种联系:如果改良不是一种收效微薄的短期行为,而是可行性和收益很大的长期活动,从中便会合乎逻辑地生长出改良主义。而因此,当西欧资本主义进入成熟时期,合法—改良活动成为客观上唯一可行而又成效显著的长期实践时,恰恰是与成就一起大量地出现改良主义,这是毫不足奇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93页。

(二)

大量资料表明,西欧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在19世纪晚期以后普遍倾向于改良主义心理。

如前所说,这个过程首先始于19世纪的“世界工厂”英国。在这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开始得比大陆各国为早。工会是工人组织的主要形式。从60年代起,工会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争取改革选举法以扩大选民范围、促使工人组织合法化、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工会人数亦大有增加。到1892年,英国工会会员达到1502358人,占当时全国成年工人的20%。^①他们分布在各个地区和各个大行业中(机械、五金及造船业;建筑及家具业;矿工及采石业;纺织业;制衣及皮革业;造纸及印刷业;运输业以及其他职业如制桶、雪茄、陶器、面包工等),其中,有些地区和行业吸收了大半甚至全部成年合格工人。例如,采煤业的80%工人都是工会会员,郎卡郡棉纺工会包括了该行业所有合格工人。不仅如此,工会运动对工人生活及心理的实际影响力,更过于它的会员数目,因为工会主要是集中在大规模产业中,其成员大致上包括了该行业中的熟练程度高、工资待遇优厚、素质较高的工人,他们对于其余工人自然具有道德和理智上的有力影响。^②可见,工会到19世纪末已经是英国工人运动中决定性的领导力量了。

然而,正如维伯夫妇所描述的,这批团结在工会中的工人却

① 见卫素(今译维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81,427页。

② 同上,第399页。

大都沉湎于一般的杂务和单纯经济活动，对革命甚至政治本身都漠不关心。在基层工会中，会员们的日常活动主要是，聚集在俱乐部中，边饮酒边谈论当地琐事和个人的生活际遇等等。组织活动主要限于吸收新会员（做得十分严肃刻板，带有英国人特有的庄重认真、一丝不苟）、收取会费、讨论共济事务如疾病扶助金、养老金、失业津贴之类。罢工被视为一件至为重大的事情，须经会众反复讨论甚至热烈争论才能决定，为的是要防止新人会的年轻工人们利用罢工期间白白领取津贴去逍遥自在逃避劳动。各级工会领导人通常是在能力见识上高于一般工人的出众人物，确能发挥中坚作用，但当他们与中产阶级、雇主打交道日久，并从对比中发现了自己的智力优势时，每每会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方式都发生变化，对中产阶级暗生羡慕、仿效之心，渐渐脱离拥护他们的一般工人。^① 在这样一种平静琐碎、陈陈相因、了无新意的生活氛围中，对一般基层工人来说，不但社会主义革命与他们毫无关系，就连工会上层领导的事务和活动也显得十分遥远，捉摸不定。可以想见，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些概念，在这里会是多么陌生。

无怪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早就注意到上述现象，都对英国工人的“贵族化”感到厌恶和忧虑。早在 1858 年，恩格斯就以激烈的口吻说道，“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② 他在晚年更进一步对这种现象作了分析，并力图上升到客观经

① 所有这些，在维伯夫妇的名著中都有丰富材料；还可参见塔晋：《19 世纪英国的工人贵族》，伦敦 1981 年版。

② 恩格斯 1858 年 10 月 7 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52 页。

济运动的高度去解释。恩格斯认为,工人“贵族化”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的结果;“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作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这样,就组织在工联中的工人而言,“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由此,“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①

这里对英国工人“贵族化”的分析是极其深刻透彻的。当恩格斯写这些话时,他还只是把上述情况限于英国一国,并寄望于世界垄断地位的丧失会导致英国工业生产的衰落,引起工人生活恶化,从而改变工人的心理状态。然而事实上,英国的状况只不过是西欧其余各国的先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大陆,几乎是以同样精确的程度重复着英国的历程。

拿德国来看。德国工业发展在时间上落后于英国远甚,但这个小弟一旦起步速度却大大超过兄长。上世纪晚期开始,

^① 以上引文均出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德国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就业机会大增,失业率维持在1—3%之间;工资有上升趋势,特别是1881年之后,工资直线增加。1850年,一个普通普鲁士工人家庭的食物支出占工资收入的58%,到1913年仅占33%。^①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工立法的颁布等等,已如前述,此处不再重复。所有这些,当然是工人运动斗争的直接结果,首先与工会运动的努力关系密切。德国工会在19世纪晚期获得了很大发展。1877年,工会会员仅4.9万人,1891年增至27.8万人,1904年更达100万人,到1914年拥有250万人。^②德国工会运动与英国工会运动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明确引导下成长起来的,其成员虽不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一人会使受到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熏陶。因此,如此壮观的人数团结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实在是一股惊人的力量。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是,自90年代起,从工会的基层到上层,却弥漫起注重日常琐事、蔑视社会主义革命宣传的情绪。工会事实上是把互助、济贫、促成社会发展保险事业等等放在首位的。它把钱越来越多地用于互助、救济,并正是以比对工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③至于罢工,工会领导人愈益倾向于慎重态度,因为他们担心罢工会淘空工会的金钱储备,影响其救济工作。他们对于争得提高工资或缩短工时,比对于任何政治经济学原则更为关心。^④

① 米勒等:《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② 同上,第48页。

③ 同上,第57页。

④ 参见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68页。

当然,工资较优、满足于现状的工人毕竟并非全体,而只是当时工人中的一小部分,即熟练工人和一部分半熟练工人,正是因此,他们被讥称为“工人贵族”。但是,他们决非被资产阶级所收买,在利益上与其余工人相对立、相敌对的部分,而是工人阶级中最有影响、最具号召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事实上不过是在生产力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中以自己的熟练技能首先得益的那一部分工人,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余工人是在不断地上升到这一部分中来,而不是每况愈下,落人赤贫。^①

工会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剥削的日常斗争中的主要手段。因此,工会中熟练工人心态的改良主义化便足以深刻地影响到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个面貌。

这一过程的突出例证仍是德国。

如前所说,德国工会运动一开始就是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之下。但是,工会中的各级干部从 90 年代起便愈益不重视谈论革命理论,并想方设法逃脱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制约。在 1892 年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总委员会主席卡尔·列金宣称:工会应当在党派政治中保持中立立场。^② 他的态度是颇有代表性的,工会活动家们在那时和以后确是把党的革命政治看作自己事业的累赘,从而尽力规避社会主义宣传,一心一意地去专注工

① 按苏联学者米哈列夫斯基的统计,1898 年时德国“工人贵族”有 14 万人,到 1910 年时便增至 70 万人(Б.Н.米哈列夫斯基:《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工人贵族》,《苏联历史问题》1955 年第 1 期第 107~108 页;转引自祖波克前揭书,第 2 卷第 23 页。

② 肖斯克:《1905-1917 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1 页。

人的当下经济利益了。随着工会成就的扩大,它对工人的吸引力也愈来愈大;它的各种机构愈是完备,它对现存经济制度的认同也愈来愈增强。终于,它开始以自己的权力威逼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了。

1899年在法兰克福工会代表大会上,列金针对党的关于资本主义崩溃必然性的学说,宣称:“恰恰是我们,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不希望所谓的崩溃来临,它将迫使我们在社会的废墟上进行建设,无论这个新制度比我们现在的制度是好还是坏,反正都一样。我们希望的是平静的发展。”^①但总的说来,在1905年之前,工会还能与党的领导相安共处。到1905年发生关于总罢工问题的争论时,工会便显示出它是一种强大到足以改变党的态度的改良主义力量了。当时,俄国如火如荼的事变进程向世界显示了总罢工的威力和意义,激起了全欧洲范围的社会主义者的极大热情。此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不仅倍倍尔、考茨基,甚至伯恩斯坦,都一致支持把“最广泛地运用群众性罢工”^②写入党的耶拿代表大会决议。然而与此相反,工会却对总罢工持坚决的拒斥态度,因为它担心总罢工会引发同统治者的流血决战,使自己长期辛辛苦苦争取到的成果毁于一旦。党的著名领导人、历来倾向于改良主义的奥艾尔粗鲁地表达了这种态度:

① 转引自米夏埃尔·施奈德:《德国工会简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② 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关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决议,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页。

“总罢工等于总胡闹。”^①

在党与工会的立场明显抵牾的情势下,工会向党施加了巨大压力。1906年2月,工会委员会与党的执委会在秘密会谈中迫使后者同意放弃总罢工的宣传。随后不久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大会对这一点予以肯定,并承认了工会与党具有平等地位,保证今后“一旦党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它必须同工会的总委员会取得联系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进行富有成效的活动”。^②

有人会说,西欧工人及其工会组织的改良主义化是社会民主党放弃思想教育和政治领导的结果。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实际情况是,象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党,始终是重视把社会主义思想大力灌输给党员和工会群众的。它通过各种会议、夜校、俱乐部等形式,努力使工人们理解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在工会要求“中立”时,它也表示过要坚持党对工会的政治思想领导的立场。^③直到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期间,党的最重要理论家考茨基还针对倍倍尔的决议提出一项补充提案,宣布党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最高和最普遍形式”,主张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工会是“绝对必要的”。^④然而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说于事无补,工人下层的改良主义化终于无可抗拒地

① 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从工业革命到希特勒攫取政权》,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卷369页。又参见商务印书馆1994年中译本,上卷第489页。

② 曼海姆代表大会关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决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二卷第295页。

③ 参见前引肖斯克书,第18~19页。

④ 同上书第50页。

战胜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领导。

(三)

现在我们来考察议会活动。

议会斗争是“第二国际策略的中心问题”^①，始终在当时西欧社会主义政治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基本原则看，第二国际时期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对议会斗争的看法与马克思、恩格斯大体一致。正如人们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批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片面性、虚伪性，另一方面又从不拒绝利用议会民主制去达到革命的目的。特别是恩格斯在晚年，对社会主义政党运用议会斗争方式做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合法斗争、普选权证明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②它的作用在于：衡量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增强工人阶级的信心和加深敌人的恐惧，提供向人民进行宣传的机会，用作组织人民的手段。因此，恩格斯主张，社会民主党当前的策略应当是认真运用合法斗争方式，以议会活动去为最后的流血斗争做好准备。恩格斯在 90 年代坚决反对冒险发动的策略，认为“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③恩格斯甚至乐观地预言：“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

① 殷叙彝：《议会斗争与第二国际的策略》，《世界历史》1989 年第 4 期第 2 页。

② 《卡·马克思〈1848—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603 页。

③ 《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92 页。

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不能复原。”^①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所遵循的是一种合法斗争——最后决战的思路,即一方面充分肯定和重视运用议会斗争方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仍把它当作夺取政权的预备手段。西欧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在 90 年代也正是按照这一思路行事的。1891 年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一段话颇能代表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思想:

“对于我们来说,整个议会活动、选举权、投票权、劳工保护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是使人们头脑革命化,从而争取到要求实行革命的贫苦人民的好手段。我们永远不要只看见这种手段面看不见目的。”^②

这是一种简捷明快的思路,对于运用不同手段达到既定目标的能力充满自信,而极少考虑到在这种运用中环境对自身的影响。然而,随着议会斗争的成功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显著,活动范围和形式越来越复杂,先前的思路便必然遇到一系列新的问题的尖锐挑战,使人们陷入困惑和两难处境中。

首先,议会斗争取得的成就之大,超出了人们先前的预测,势必在人们观念上造成深刻影响。即使晚年的恩格斯在为议会斗争的胜利而欢呼时,他也仍是把议会斗争从属于革命的最终目的之下,而没有赋予它独立的意义。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在恩格斯看来,统治阶级一定会在社会主义者的议会成功面前涵

① 《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98 页。

② 参见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第 13-14 页。

羞成怒、孤注一掷，从而使争夺政权的决战提上日程。然而，后来的现实情况却是，社会主义者在议会里普遍取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席位，统治阶级却并没有像斗牛场上的公牛那样被挑逗得暴躁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说，议会胜利没有革命之外的独立意义么？在理论上当然还可以坚持这一点，但在实践上事情却复杂得多。对于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代表来说，更多的选票和席位意味着他们可以有更多机会来贯彻自己的意图，实施（哪怕只是局部地）自己的改造计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不列颠到西欧大陆，凡是议会斗争取得持久成功的地方，首先都是从社会主义议会实践家那里产生出“议会主义”的情绪。在英国，推翻资产阶级现存制度的思想从来就没有被正式接受过。无论社会民主联盟、费边社，还是后来的独立工党乃至工党，其主流都是议会主义。这一特点突出地体现在费边社的“市政社会主义”中。该社为了达到它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把自己的实现途径规定为，“1. 民主主义的变革；2. 渐进的变革；3. 被人民大众认为是合乎道理的变革；4. 合乎宪法的与和平的变革”。^① 在法国，当 90 年代社会主义者取得不小成功后，米勒兰在有盖得、瓦扬、饶勒斯等著名领袖参加的一次宴会上宣布：“谁也不会指责我们想用革命手段来对付参议院……为了在客观情况所决定的条件下开始实现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社会党必须和只须通过普选争取国家权力。”^② 在德国，“反社会党人法”取消

① 参见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33 页。

② 亚历山大·泽瓦埃斯：《1871 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191、192 页。

后,首先从南德社会主义者中生长出议会主义思潮来。福尔马尔这个先前曾支持激烈革命立场的人物很快改变了态度,宣布“社会主义者反对任何暴力行动,他只能希望把这个难题当作文化问题来解决,使必要的社会变革平静地、逐渐地进行……”^①以上这些事实表明一点:一旦议会斗争表现出比理论预测所赋予它的更多的价值,它就会成为议会改良主义的温床,革命就会渐渐被视为累赘。

其次,议会斗争日益显示其重要性,也就必然使议会党团的地位不断上升,并最终使议会活动家们的意见占支配地位。就一般原则来说,议会党团是从属于社会民主党中央领导机关和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党应当能够以自己的基本纲领精神指导议会党团。但实际上远非如此简单。既然客观上议会活动成为西欧各党的活动的主要阵地,它们就不能不接受议会党团日益增强的影响,不论它们主观上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在法国,坚持革命主张的盖得派其实内心里并不同意议会改良主义的主张,但数目可观的议席使他们不可能不顾一切地同统一的社会主义党团闹翻,而只能经常持一种退让容忍态度。德国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纲领上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但它既以长期议会斗争为主,就只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主要组织力量和成员放在议会中。从地方到中央的议会党团集中了党的重要活动家,议会党团之于德国党犹如躯干之于人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求党的头脑不断地与自己的躯干做斗争吗?不,显然不可能。事实上,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

^① 《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福尔马尔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许多领导人物一身兼二任，既是党执委会的成员，又是议会党的成员，因此他们不仅在组织上受到党团的制约，而且其思维方式也愈益受到党团的影响，恐怕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那种责备社会民主党放弃思想政治领导，向议会党团“机会主义”让步的意见，看来只是缺少认真分析的想当然之论而已。

第三，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中的角色的加强，显然会使它们愈益深入于复杂的国家政治法律事务和程序之中，从而使自己保持理论和纲领的纯洁性的努力日益变得困难。按照先前的理论，社会主义政党之进入议会，其意旨仅在于用敌人的阵地去宣传自己的主张，与敌人争夺群众，社会主义政党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投票去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负责，更别说以自己的议案去加强资产阶级国家的建设了。然而在实践中，一旦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中展开大规模长时期活动，它们必然发现，自己要不同青红皂白地永远做一个“不先生”是多么不切实际。首先，必然要遇到在议会中同资产阶级各政党派别结盟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这种结盟即使允许，也最多只能是为了反对主要敌人而暂时同次要敌人达成的暂时利害关系。但正如殷叙彝教授所说，“一涉及联盟问题就很难划清必要的妥协和丧失原则的界线，对于同一行动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截然相反的解释”。^①其次，是复杂的投票问题。按照先前的原则来说，社会主义议员应该无条件地对国家预算投反对票，以此来表明自己反政府的革命立场。但问题在于，政府的预算不是用于加强军事力量和警察机构，而是用于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时该怎么

① 《议会斗争与第二国际的策略》，《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第8页。

办？这是社会主义政党所不可避免地遇到的实际情况。1894年德国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团在议会中对政府预算投下赞成票，所持理由正在于此。在当年10月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大会上，这一行动自然遭到了批评，但福尔马尔尖刻地反驳说：“据说我们赞同政府预算就是对政府投信任票！……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另一种行动，那么任何一个笨蛋都能把我们说成是人民的敌人。”^① 再次，“如果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发展的趋势继续下去，人阁或组织联合政府将是社会党议会斗争的逻辑的必然后果之一”。^② 这时又该怎么办？当1899年米勒兰人阁触动了这个敏感问题时，引发一场国际性大争论就势在不免。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为1900年国际巴黎大会所通过的著名的考茨基决议（即所谓“橡皮决议”）采取模棱两可的问答，一方面委婉地批评米勒兰的个人行动，另一方面又拒绝从原则上对人阁问题做出决断（“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③）。许多人把这种模棱两可看作是考茨基的机会主义动摇，而在本文看来，它其实反映了理论信条在新的现实面前的两难处境。

第四，以议会活动为中心的合法斗争的步步深入节节向前，使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机构日趋复杂，职能日益繁琐，规模日益庞大。这一点，仍以德国社会民主党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个党

① 福尔马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福尔马尔文选》第219、221页。

② 前引殷叙彝文，《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第9页。

③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米勒兰事件》，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4页。

拥有强大的组织、巨额的资产、众多的新闻出版机关，有各式各样的群众性社会团体和合作社围绕在它周围。这样一个巨大的网络状组织如同一个大公司，需要由一整套从上至下按分工协作原则精心配置起来的管理和执行班子去推动。其结果，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事业的本来目标反倒退居后位，维持这个大公司的存在和运转本身显得愈益重要了，党的各级组织机关中，平庸琐碎、沉溺实务的风气不断增长，党还在取得政权之前便开始丧失进取性并变得官僚化了。这自然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但却又是无法扭转的过程。考茨基作为相对超然于琐务之上的党的理论家，对这种状况看来有着痛切的感受。1909年9月25日，他在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的信中抱怨说，他的同志们“如此醉心于庞大机构的管理事务，以致除了关心自己的官僚作风外丧失了任何向前看的能力，丧失了对一切事务的兴趣。我们以前在工会中看到了这一点，现在，从政治组织不断增加的时刻起，我们在其中也正在看到这一点”。^①这种尖刻的意见无疑是反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现实的。布劳恩塔关于这个党的官僚化写道：“随着运动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部运动的‘机器’——一个服从自己的准则，服从发展要求 and 自我保存的准则的实体，运动本身变成了目的。由于运动的需要而形成的机器，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固有的发展本能和保存自己的本能，产生了某种保守的精神状态。为组织机构的安全和发展的可能性而忧虑，影响着它的负责干部的政治态度。工人运动组织的原来目的是准备社会革命——挖墙脚，最终推

^① 转引自切尔涅佐夫斯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翻现有阶级国家,但随着力量的增长和组织的强大,运动的革命活力就悄悄地消失了。”^① 这显然又是一种两难处境。

(四)

综上所述,第二国际时期日益弥漫于西欧的改良主义,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由实践行动而心理变化,由“存在”而“观念”的过程,其现实基础在于新的历史运动超出了理论预测,以致使本应与革命相联系的合法斗争出乎意料地与拒斥革命的改良主义联系起来。这使改良主义成为一种强大的有深厚“社会存在”背景的历史性思潮。正因此,尽管改良主义一再遭到批评抵制,它还是迂回曲折地发展起来。这也是一个由隐晦到公开的过程。最早的改良主义者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大卫、福尔马尔、列金、奥艾尔等,尽量不公开否认正式的意识形态,而是在实践中悄悄地把天平砝码移向改良一边。他们的行动准则是“别公开说,但实际去做”。^② 随着改良主义的成长壮大,它最后不可避免地要以占据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领导机构为终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西欧社会民主党几乎普遍为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者所掌握。归根结底,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这全部过程不是由于少数“叛徒”兴风作浪和革命者对他们斗争不力(史实表明,他们曾奋力抗争抵制过),而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区深刻复杂的社会现实运动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① 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55页。

② 奥艾尔给伯恩施坦的劝告,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67页。

二、革命与改良之争

(一)

如前面所显示的,资本主义现实的变化使革命与改良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起来:一方面,合法改良活动是当时现实条件下所许可的主要斗争方式;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中却又不断地产生出改良主义情绪。这种二律背反式的矛盾必然向理论提出尖锐问题:改良与革命是互不相容的吗?抑或能够联接起来?这种联接的条件和方式是什么?怎样来避免改良实践中所产生的改良主义的侵害……这样一些问题,很自然地成为当时理论活动据以围绕的轴心,以种种方式搅动着几乎所有重要理论家的思考。他们对问题的各种解答无不深刻反映出时代的特点。

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1 年爱尔福特纲领是最早阐述革命与改良关系的著名文件之一。这个纲领以其明确无误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赢得了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赞颂,成为第二国际各党制定纲领时公认的范本。众所周知,这个纲领包括理论原理和实际政治要求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言简意赅地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分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指出无产阶级由客观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必然历史使命,整个叙述可说是洗练地概括了马克思学说基础。第二部分则明确地提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治要求,例如普选制、人民直接立法、教育世俗化、

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征收累进税、八小时工作日等等^①。前一部分的基本精神是坚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后一部分的基本精神是肯定在现存秩序下从事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能采取的唯一正确态度,但我们进一步设问:联结工人阶级当前的合法改良活动与社会主义者的未来革命目标的现实中介是什么?换句话说,现实经济运动能否提供一种坚实的客观保证,使合法改良活动必然地过渡到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爱尔福特纲领对此未作明确回答。这倒不是由于纲领的疏忽,而是由于在它看来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因为,按照纲领的逻辑思路,资本主义内在经济矛盾的不断积累和尖锐化,不可挽救地使无产阶级的地位每况愈下,从而不断培养着他们的革命意识,合法斗争不但不妨碍而且只会有助于促进这一革命化进程。对此,纲领的主要起草人卡尔·考茨基后来有一段详细阐述,可以看作是对纲领的恰如其分的注释:

“比如说,如果个别手工业者想要安装小发动机来改善自己的境况,或如果工人创立自己的组织并争取实行可以使他们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和得到其他改善的立法措施,那么,这是当时情况证明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如果认为这些改良措施可以阻止社会革命,那就错了。好象承认某些社会改良的效用,就得同时承认有可能把现社会维持在它的现有基础上似的。这也同样是错误的想法。恰恰相反,我们甚至可

① 纲领全文收入恩格斯《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附录。两个草案收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二卷。

以从革命的观点,来支持这种改良。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改良会加速事态的发展,远不是消除我们在前面几章里说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杀趋势,而是加速这种趋势。

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全部资本集中到统治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的少数几个人手里,经济危机,物质生活状况的动荡不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切令人难忍的和引起愤慨的后果的不断加剧,不是建立在现存所有制形式上面的任何改良所能制止的,无论这种改良是如何广泛。”^①

考茨基的观点是鲜明的,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这种回答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资本主义固有经济矛盾的一般发展趋势,远非任何改良行为所能阻止,改良仅能减缓矛盾的某些局部有害后果,而不能消除经济矛盾和社会对抗本身。这些矛盾和对抗必然把资本主义引导到自己的极限,那时它将无法在既定秩序内容纳生产力的继续提高,于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时代就到来了。然而今天我们知道,这些都应看作是大跨度、“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展望,不能等同于对各个具体经济时期的实际分析。通过前面章节的论述我们已经看到,正是在爱尔福特纲领制订的那个时期,走向成熟的西欧资本主义依靠其日趋完备的自调节机制,使它那不可避免的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渐渐转化为自我完善的动力,从而在工人阶级的合法改良斗争与社会主义者的革命目标之间造成了断裂。爱尔福特纲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甚至没有发现这一严重问题,正因此它的两大部分不能不是缺少有机联系的。这一点早已为许

^①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7页,着重点原有。

多国外学者所指出^①。重申一遍,不能把这个弱点归咎于纲领本身。爱尔福特纲领按其表述的准确性、思想的深刻性和所制定策略的可行性,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问题只在于时代的变化提出了纲领无法解决的新矛盾。但不论如何,由于事实上不能在革命与改良二者间建立真正有效的联系,爱尔福特纲领为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都留下了可资利用的余地。

在社会主义运动高奏凯歌一路向前的第二国际早期,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上述矛盾。他们从自信的心情出发,确信只要有了正确的革命目标和有力的政治领导,便可以放心放手地去实施改良活动,而不必担心其“腐蚀”作用。但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很快便向人们敲警钟了。如前面一节所叙述的,改良主义情绪迅速滋蔓开来,并在德国的福尔马尔、康普夫麦尔、施米特、法国的米勒兰、饶勒斯、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等人物和派别身上得到了最初的理论表现。而当时像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这样的著名社会主义领导人,对上述人物和派别的言论不以为忤,仅视为偶而冒出的“蠢话”而已。倒是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看出了改良主义情绪正在蔓延的情况。可是他们的对策实在糟糕,只不过是干脆要工人阶级拒斥一切政治活动!如此幼稚简单、脱离实际的主张,遇上热情大胆地号召工人阶级投身合法斗争去谋求自身处境改善的主张,显然只能被驳得体无完肤。无政府主义果然在第二国际初期就被打败了。然而在驳斥无政府主义时,象李卜克内西这样的人物所表现出的自满心理同样幼稚简单。这在 1893 年国际苏黎世

^① 例如参见前引米勒《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第 45 页。又拉贝兹编:《修正主义》文集,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18 页。

大会上李卜克内西反驳荷兰代表关于德国党正在离开革命立场的批评时,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我要满意地向荷兰人表明,在我们的纲领中已清楚而明确地表达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思想。在国际的纲领中,在1868年于纽伦堡举行的我们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中,已经接受了这一段。……在兄弟党的所有纲领中,我们的纲领是最激进的纲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像我们那样清楚。攻击我们的那些人是先向我们学习的。关于策略问题也阐述过。策略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革命的策略和反动的策略,而只有达到革命目的或达到反动目的的策略。策略是随机应变的。如果一天之内情况发生了24次变化,我们的策略也要改变24次。我们的策略视敌人的态度而定。……引起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的根本原因是混淆了因果关系。关键在于目标!”^①

从这段富于激情的话中可以看出,在李卜克内西头脑中,改良向革命的过渡,仅是一种可以由当事者随时决定的主观选择,而不需要有深厚物质条件的客观保证。因此他一味相信,只要有了一个“最激进的纲领”,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革命与改良间海阔天空、出人自由;他不懂得由党的理论家所制订的“最激进的纲领”,并不足以左右主要是从实际生活中汲取经验的普通工人劳动群众的心理;他没想到,仅仅理解“阶级斗争的基本思想”是远远不够的,对立着的两个敌对阶级,事实上又都是立足于客观经济运动的同一基地上。经济条件的变化,完全可能

^① 《第二国际第二、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397页。

筑起一条错综迷人的政治盘陀路,使其中一方接近既定目标的主观努力湮没于千折百转的旅途中。所有这些,对李卜克内西都是不存在的,而且一般地说,在当时几乎所有站在爱尔福特纲领基础上的正统社会主义者头脑中都是很少出现的。如后来帕尔乌斯回忆的那样,这一时期人们天真地相信社会主义政党“对改良主义具有免疫力”。^①

(二)

然而,矛盾却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向前迈进,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把问题再次暴露了出来,逼迫人们去面对它们。

按照不少国外学者的看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只是为爱尔福特纲领中已包藏着的改良主义选择提供了公开的理论形式而已^②。此说有失准确:爱尔福特纲领允许的是改良而不是改良主义。但伯恩施坦的主张倒确实是伴随着爱尔福特纲领所肯定的改良实践的成就而出现的,是与这些成就一起生长起来的改良主义普遍情绪的理论总结。^③ 伯恩施坦本人曾声言,他“一点不想去改变党的实际政策”,而只是想“努力追求理论和实际、言语和行动的一致”。^④ 这意思是明白的:他认为德国党只在理论上、言语上是革命的,在实践中却是改良主义的,既如此,何不

① 帕尔乌斯:《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86页。

② 例如前引肖斯克《1905—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9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20页;又见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99~100页。

④ 伯恩施坦1898年10月20日给倍倍尔的信,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64页。

干脆放弃革命言辞，一心一意、表里如一地去搞改良主义？此说固然也是犯了把改良与改良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但却表现出一个事实：爱尔福特纲领之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就要遇到公开的挑战了。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一个内容庞杂的体系，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理论。但这个体系并非纯思辨活动的结果，而是一如伯恩施坦本人所说——是“实际的发展”动摇了他先前的理论信念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用他所理解的“实际”来反对理论。^①因此，要准确评价伯恩施坦，就要首先来看看他眼中的“实际的发展”。

综合伯恩施坦的言论，可把他的意见大致归纳如下：

1. 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并不符合《资本论》的分析。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固然“就趋势来说是正确的”，^②但同时还存在“起限制作用的诸因素”。^③在大企业发展的同时，还有许多中小企业，在大农场之旁还并存着许多中小农场。而股份公司则“容许已经积累的资本进行广泛的分裂”，从而对集中的趋势“在很显著的程度起着对抗作用”。^④

2. 在大工业发展的同时，现代信用制度、卡特尔、托拉斯等企业联合组织的出现，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的日益完善化，世界

① 伯恩施坦 1898 年 10 月 20 日给倍倍尔的信，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 64 页以下。

②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99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 100 页。

市场的不断扩大等等,使得资本主义产生了适应性。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先前定期发生的经济危机“至少在较长时期内可以……看成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了”。^①

3. 社会阶级结构同以前相比并没有简化,而是高度地分化和复杂化了。财产并不是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寡头手里,中产阶级并未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趋于消失,而是继续增长,无产阶级内部也由于其工作方式和收入水平的差距而分化为许多个等级,总之,“再也没有比说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是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地主这句话更加骗人的了”。^②

4. 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并不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激化,而是相反。由于经济发展和道德文化水平的提高,阶级斗争越来越采取了缓和的形式。以致“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③

5. 在欧美各先进国家里,“民主已证明自己是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杠杆”。^④ 普选制、人民立法、议会活动等等会促使“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特权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⑤ 由此,民主制度能保证社会主义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而不需要再经

①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 129 页。

② 《阶级斗争的教条和阶级斗争的真实》,《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 1966 年版第 242 页。

③ 伯恩斯坦在 1898 年 10 月 20 日的声明,《伯恩斯坦言论》第 78~79 页。

④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 192 页。

⑤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伯恩斯坦言论》第 72~73 页。

过政治上的“大灾变”。

根据以上“实际的发展”，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许多重大方面都已暴露出错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危机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理论都是不正确的。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便不能再指望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伯恩斯坦说得很明白：“按照我的意见，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我认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赋予它以纯粹物质的基础。”^①那么，它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对剥削的不公正性之道德上的厌恶，取决于工人阶级的道德文化的提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不是必然的而是应然的，不是突然到来的而是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放弃对革命目标的迷恋，放弃把日常的合法改良活动仅仅看作是革命鼓动的做法，全心全意地转到改良工作上来。这种转变在伯恩斯坦看来不是实践的转变，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在他看来已经是“民主主义改良”的了；毋宁说是一种心理上的转变，是把心理调整到与“民主主义改良”实践一致的位置。伯恩斯坦说：“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②

不难想见，在那个仍然存在着炽烈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年代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会引起革命者队伍中多么强烈的反感。今天看来，他的这套主张也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若干基础理论的粗暴的全盘否定。当然，应该承认，伯恩斯坦确实不避烦难地

①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31页。

② 同上，第239页。

搜寻和分析了不少经济资料,并得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正确结论。例如资本主义的持续适应性、阶级结构的复杂化、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化趋势等等,这些不能说是胡编乱造,而确乎是事实。但是,仅凭这些事实却不足以支持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全面攻击和修正。因为这些事实,总的看来,只是部分改变马克思所分析过的资本主义矛盾的形式和结果,而不是消除它们。例如,中小企业、中小农场的大量存在、中产阶级数目的增长固然是事实不谬,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制约、支配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方向。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高度集中的大资本。而这,便不能改变《资本论》的主要结论,因为我们知道,全部《资本论》三大卷的宗旨正在于运用高度抽象的方法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一般趋势,而把许多次要的影响因素暂时忽略不计^①。至于股份公司使资本分散的情况,只能证明资本的使用与所有权分离,却不能证明资本主义不是走向集中而是走向分化。事实恰好相反,股份公司正是把大量分散资本汇集起来使用,而使资本的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了的。再如伯恩斯坦根据资本主义联合组织的出现等等便断言经济危机不会再发生,则已为历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总之,尽管伯恩斯坦掌握了一部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但他不懂得运用和扩展马克思主义方法去分析它们,而是仅凭他自己狭隘的理解便大胆宣布马克思主义为过时,于是只能把自己弄到荒谬的地

① 谈到农业中的小地产,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已出色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大地产确实没有消灭小地产。但这只说明“小地产已不是大经营的竞争者”。见该书三联书店1955年中译本第199页。

步。由此,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和修正,不仅在当时和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是错误的,就是在相当一部分有理论修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也是不成功的。例如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后来就评价说,伯恩斯坦“是一个卓越的人,但在智力上不足以匹敌马克思”,“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在经济史观和经济力量的集中这些问题上,他的论点是特别浅薄的”。^①

然而,理论上浅薄的东西在历史上却可能有其地位。从这个角度看,伯恩斯坦主义便值得严重注意。首先,他确实抓住、反映、感觉到和突出了某些正在发生的重大历史变化,尽管其表现形式是肤浅、混乱和歪曲的;第二,他的主张并非个别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如卢森堡所说)的“动摇”或“背叛”,而是依据着有强大社会背景的改良主义心理和思潮;第三,伯恩斯坦主义实质上是提出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西欧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而尖锐地揭出了先前还只是潜存着的矛盾。由于以上原因,真正克服伯恩斯坦主义的有效途径,只能是在批判其形式的同时,对它所反映出的真实矛盾予以正面回答,舍此无他。

由此观之,伯恩斯坦当时的批判者们就都未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他们所做的主要是揭露伯恩斯坦的自相矛盾,嘲笑他的浅薄孤陋和狂妄自大,并援引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对照批判伯恩斯坦的背离等等。这些固然重要,却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独立分析新的社会现实,以事实回答伯恩

^①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34页;以及他的《经济分析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1页。

施坦方面,他们显得相对贫弱。

在同伯恩施坦主义的争论中,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阵容是强大的。帕尔乌斯首先揭起了战斗之旗,普列汉诺夫在一系列出色论文中驳斥了伯恩施坦在哲学上对马克思学说的攻击;罗莎·卢森堡的尖锐批判直指伯恩施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分歧;考茨基在短期沉默后投身于论战,写出了一批具有权威性的反修正主义著作;倍倍尔在1899年汉诺威大会和1903年德累斯顿大会上的长篇讲话,成为反伯恩施坦主义的纲领性文件……然而所有这些都,在浩大声势之中总使人感到缺点什么。到底缺什么?关键在于缺少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新变化的足够理解。于是,对伯恩施坦的驳斥尽管不乏博学、尖锐和机智,却未能在革命与改良这个致命问题上作出决定性反应。

考茨基曾在一系列著作中(例如《土地问题》和反伯恩施坦的若干文章)承认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他甚至表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验和修正我们的观点”。^①帕尔乌斯也承认,现实发展正在使工人阶级的状况得到提高和好转,“可以认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剥夺权利和受到监督的时代一般说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②但他们又都认为这些变化不但无关宏旨,甚至还会激起资本主义新的、更大的紧张状态,那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化时代一定会到来。这显然又是缺少缜密分析的简单化估计。因此,考茨基们虽然都列举了经济发展的新材料,却未能从历史总体角

① 《私人声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99页。

② 《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389页。

度认真估价资本主义变化的严重意义。当帕尔乌斯批评伯恩斯坦一伙“没有力量把党的当前工作同党的社会革命目标有机地结合成一体”^①时，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自己其实也未能找到这种“结合成一体”的现实途径；一般说来，他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在新的条件下问题的复杂性。他们的头脑还停留在先前的一般抽象原理上，确信资本主义矛盾是在不断尖锐化，因而合法斗争与未来的革命无论如何不会是相互排斥的两极，而只会是同一过程的两个彼此联系密切的环节。

确实，这是一种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是不能战胜修正主义的。^②那么，这种教条主义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一般说来，教条主义产生于僵化的理论自足感，产生于自我封闭。然而，以卢森堡的头脑敏锐、富于创新，普列汉诺夫的学识渊博、聪颖睿智，考茨基的逻辑严谨、涉猎广泛，怎么都没能突破这种不良感觉呢？难道是他们的能力、学识不够吗？当然不是，而是有更深刻的时代客观原因。弗兰茨基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迄今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创造性的思想，总是以一定的批判性的历史实践为前提的。不论个别思想家的思想、观点和概念在形成时所经历的道路如何复杂，他们总是不仅充分表现理论的传统和经验，而且也充分表现他们的历史实践的生活（或者是停滞不前的历史实践）。”^③那一时代的“历史实践”，未能向马克思主义者提供

① 《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第396页。

② 洪肇龙教授多次强调这一点，对笔者有启发意义。

③ 弗兰茨基：《马克思主义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足够的经济的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使他们能有力地回击伯恩施坦的挑战。从经济方面看,刚刚跨入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还只是把一些表面现象暴露给人们,揭示其内部复杂的自调节机制尚缺少充分的历史条件;从阶级关系方面看,工人阶级之由革命逐渐趋于改良主义也使理论家们无法有力推进革命理论。所有这些,使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处在不利的地位上,只能以既定的理论体系为立足点,而难以进一步发展它。他们对伯恩施坦的批判尽管是正当的,却只限于对自己所信奉的学说的消极“捍卫”。科拉科夫斯基评论说,“这类批判纯属意识形态的,只不过表现出一种有根有据的忧虑,即如果伯恩施坦是正确的,经典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便将完结了”。^① 除去其中的恶意,应当认为此说道出了一些真情。

于是毫不奇怪,伯恩施坦主义并没有被战胜。尽管有大量的批判文章,尽管有好几次代表大会明确批评伯恩施坦的决议,伯恩施坦主义却没有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销声匿迹;相反,它正蔓延扩大,有如一般决堤之水,迅速波及成为国际势力。1909年,伯恩施坦在一次演讲中得意地宣布,修正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被打败了,但在实践中却胜利地得到贯彻。^② 与此同时,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目睹修正主义泛滥的同时,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三)

这一分化的重大标志是 1910 年后考茨基与卢森堡关于策

^① 《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第 2 卷第 111 页。

^② 《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伯恩施坦言论》第 356 页。

略问题的争论。

争论是由普鲁士选举改革问题引起的。普鲁士政府在新提出的选举法草案中拒绝实行普选制，而仍维持不利于下层劳动者的三级选举制。草案一公布，立刻引起普遍的愤慨。在好几个月里，大批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到处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与政府的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游行者以数十万计，局势急剧变得热烈紧张起来。

在这种形势下，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克拉拉·蔡特金等人力主突破传统的议会斗争方法，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卢森堡的《往后怎么办？》一文集中地论述了这一主张。该文先后被《前进报》和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所拒，最后才由《多特蒙德工人报》发表。卢森堡在这文章和随后几篇文章中所持的观点，是她从1905年以来就已形成的立场的自然继续。早在1906年发表的著名小册子《群众罢工、党与工会》中，卢森堡就大胆提出，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已经使昔日属于无政府主义斗争手段的总罢工转变成革命马克思主义斗争的手段了。^①现在，卢森堡再次要求社会民主党在争取民主选举权的斗争中运用群众罢工，她确信群众运动的内在逻辑将会使工人阶级的运动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事实上，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们把群众性罢工不只看作是争取普选权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把它当作促使工人阶级情绪革命化的组织、宣传、鼓动手段。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罢工本身的成败倒在其次^②。

① 参见《罗莎·卢森堡政论文选》，霍华德编，纽约和伦敦1971年版第227页。

② 参见前引肖斯克书，第184~185页。

然而这种策略是考茨基所不能赞同的。考茨基在他对卢森堡的反驳文章中,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如果采纳卢森堡的主张,就一定会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两难处境,要么失去群众,要么孤注一掷去同统治者举行过早的决战,从而使党已经在多年合法斗争稳步前进中取得的胜利成果毁于一旦。考茨基并不反对而是完全承认在未来进行决战的必要性,并称否认这种必要性的人为修正主义者;但他坚持认为这一决战只能在所有条件成熟时再考虑。他主张,正是因为确信这种决战的必要性,才不能让自己丧失耐心,在前哨战中毁掉自己。

正是在这时,考茨基提出了他那著名的“疲劳战略”,与卢森堡的“冲击战略”相对峙:“运用疲劳战略,总指挥起初避免任何决战,他的目的在于使用所有狡计调动敌军,不给敌军取胜以提高部队士气的机会;他尽力用不断的磨损和威胁逐渐让敌人疲惫沮丧,始终如一地削弱其抵抗,使之麻痹。”^①考茨基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过去长时期里的政治斗争中实行的就是这种疲劳战略,党没有理由、没有必要改变战略,让自己按罗莎·卢森堡的急躁主张去冒险。

现在的问题是:考茨基提出的“疲劳战略”,究竟意味着什么?

按照过去不少著作的意见,考茨基的“疲劳战略”是一味迷恋议会合法活动的主张,表明考茨基已离开先前的革命立场,转

^① 《考茨基政治著作选》,帕特里克·古德编译,纽约1983年版第54页。

变成了机会主义中派的首领^①。然而在我看来,此说未必符合事实。考茨基本人并不认为他改变了先前观点,而是认为自己在保卫与党的总战略一致的先前观点。^② 国外一些学者在对比考茨基前后言论后也同意此说^③。从实际内容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长时期中所实行的合法斗争战略,也确实属于考茨基所说的“疲劳战略”。从晚年恩格斯开始,直到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这些党的领袖,始终是把议会合法斗争视为在决战到来之前团结、联合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鼓动、扩大民主基地、积蓄战斗力量的得力武器。考茨基把这总结为“疲劳战略”,与恩格斯 1895 年所写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的观点相对照,是彼此一致的。换句话说,考茨基提出的“疲劳战略”并非如许多人说的那样,是改变了以往的立场,而是对他的一贯主张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既定策略的理论总结而已。它具有很大的现实合理性,因为当党已经在合法斗争道路上节节迈进,而客观条件和群众心理又没有为“决战”提供可靠保证的情况下,象卢森堡那样仅凭相信群众行动的“内在逻辑”便贸然举行总罢

① 例如祖波克主编《第二国际史》、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都持此说。

② 《考茨基政治著作选》,第 62 页。

③ 例如狄克·杰阿里:《卡尔·考茨基》(曼彻斯特 1987 年版第 86 页)。戴维·麦克莱伦认为:考茨基思想至少在 1914 年以前是一致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79 年版第 37 页。)萨尔瓦多里则认为,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考茨基从 1890 年代到 1938 年去世,都是始终如一的。见他所著《卡尔·考茨基和 1880—1938 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纽约 1979 年版第 11~12 页。

上,其结果极有可能是致命的失败^①。进一步,考茨基看到,卢森堡所提策略适用于俄国,而在西欧,自巴黎公社之后,“冲击战略”便已过时了,“疲劳战略”愈益成为唯一可行的战斗方式。这不能不说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观点,它与后来葛兰西所提出,为现代许多西方共产党人所称道的“阵地战”策略,在实质上并无不同。

但问题在于,当考茨基一旦以如此明晰的理论形式规定总战略时,势必进一步突出早已潜藏着的、难以解决的那个改良斗争与革命目标间的矛盾。考茨基说:“从一开始,社会民主党就采用了疲劳战略并使它得到充分发展。它之所以能如此,不只因为已得到的政治权利为这一战略提供了基地,还因为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它提供了保证。不管能否以胜利或新感受来振奋群众,只要它有力地代表着无产者的阶级利益,它就总能指靠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②照这样说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天然地有保证的,不论如何总是倾向于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简单。阶级意识和阶级关系受到经济运动的有力制约。当资产阶级由于建立起有效的自调节机制而能领导社会经济运行,并从而据有“文化领导权”时,无产者在意识上不是完全可能自然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吗?在这种情况下,“疲劳战略”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很可能适得其反吗?托洛茨基后来曾评论说:“考茨基的路线是一条越来越适应现存制度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被‘疲劳’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工

① 有些苏联学者曾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例如切尔涅佐夫斯基: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右派主义的斗争》,第36页。

② 《考茨基政治著作选》,第60~61页。

人大众的革命理想。”^① 这一评论是有道理的。“疲劳战略”助长改良主义心理，革命的目标被不知不觉“疲劳”掉了，于是最后决战的理想只可能停留在理论家对未来远景的模糊展望中。

事实上，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正是有鉴于这种危险，而采取了激进立场的。还在与伯恩斯坦论战时，卢森堡和帕尔乌斯就对议会活动持实际上的否定态度。卢森堡说：“归根结底说来，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际斗争，同社会主义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它使无产阶级的认识和意识社会主义化，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组织起来。”^② 那么，合法斗争怎样才能促进无产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化呢？帕尔乌斯的回答是：“恰恰是在统治者由于其阶级利益或者哪怕只是由于其阶级利己主义而阻止通过立法实现我们提出的要求时，议会的日常工作 and 政治实践才保留着社会革命的鼓动价值。”^③ 这种观点大不同于党的正统主张。在正统主张看来，合法斗争会使工人阶级在自身状况的不断改善中逐步接近社会主义革命；在卢森堡、帕尔乌斯看来，合法斗争却只有在工人阶级的要求经常得不到满足甚至一无所获时，才对促进革命有意义。随着合法主义情绪的不断增长，他们更日益对单纯合法改良活动持怀疑批评态度，要求诉诸大规模罢工，希望用激烈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②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第120页。

③ 《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第397页。

的斗争方式鼓起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这种立场的确使他们与改良主义划清了界线,并成为在动荡时期到来时唯一能够喊出革命声音的力量。然而困难在于,他们却难以真正影响广大的群众,始终只能是孤立的一股支流。“光荣的孤立”虽然光荣,但毕竟是孤立。

可见,情况的变化对于理论家们来说是过于复杂了,他们艰难徘徊在革命与改良的二极对立中。当他们坚持一般意义上正确的以改良向革命过渡的战略时,他们难以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找到结合点;当他们为维护革命的纯洁性而干脆摒弃改良时,他们却又只能脱离现实。

※ ※ ※

在这样的旷日持久而又得不出结果的争论中,“历史实践的生活”悄悄地将砝码移向自己一边。改良主义自下而上、自情绪而组织的得势,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和卢森堡为首的“左派”的分化,中派之客观上适应迁就“右派”和“左派”的失势,都表现了这一点。

三、历史观领域中的理论成就与困难

(一)

按照佩里·安德森的说法,以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那一代理论家,“他们著作的主要方向事实上可以视为恩格斯本人最后时期的继续。换句话说,他们关心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

以系统化”。^①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方法论。但直到马克思去世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仍然散落于他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中,缺少系统连贯的阐述;另一方面,除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近代历史外,大量历史问题还有待于用唯物史观精神去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写了一系列书信,似可看作是全面论述这一历史观的企图,但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远远不够。因此,沿着恩格斯晚年的方向,大规模阐述、发挥和应用唯物史观便成了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关心的主要任务。在这一共同方向下,他们的研究意趣、侧重方向和分析深度各具特点,各有所长。

梅林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去重新解释中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文化史和社会民主党史;考茨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深入研究了基督教早期历史和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并对伦理学问题给予了特殊关注;拉法格对思想起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拉布里奥拉运用其哲学上的深厚修养,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作了全面阐述,在许多细节给以出色的丰富和发挥;普列汉诺夫则以他所特有的深邃思想、渊博学识、严谨逻辑和华美语言,把唯物史观的水平提升到了当时无人企及的高度。更年轻的一代理论家如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奥托·鲍威尔、希法亭等,也都在这一理论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贡献,不过他们所关心的,已不限于阐述唯物史观本身,而是使用这一理论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分析新条件的变化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由此制定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策略了。

^①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第二国际时期在历史观领域中取得的成就,在后世常遭贬斥。但如果认真仔细地研究第二国际时期的主要理论著作,恐怕难以否认,这些成就其实是相当大的。首先,当时的理论家们以极大精力强调历史的决定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着力论证了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变迁对社会生活归根结底的制约作用,这是一项巨大的功绩。它不仅是对马克思历史观基本原理的维护和发挥,而且,考虑到日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层出不穷、盛行不败、给社会主义一再带来严重损失的主要是主观唯意志论,就更应当承认第二国际理论成就的可贵了。其次,当时的理论家在阐述唯物史观时,又都力图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作用考虑在内。这一点对于早已习惯于想当然地把“唯生产力论”、“机械宿命论”之类恶谥强加给第二国际的人们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怪论,然而它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拉法格关于“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的相互作用,关于观念在决定于社会经验的同时也受到传统影响的思想,不是表明他在注意经济运动的决定性时也并未忽略“精神”的重要意义吗?当梅林说“人类并不是一种死板的机械活动的无意志的玩具,人类的进步发展相反地恰恰在于人类精神对自然界的死板机械活动的日渐增长的统治”时,^①你能说他是在否认人类精神的意义的吗?就连毕生深受达尔文主义影响的考茨基在大谈其“社会欲”时,应看到其本来用意也在于企图考虑到精神在历史中的作用。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

然而公认最出色的理论家还是普列汉诺夫。^①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明确地意识到，唯物史观决不是对人类能动活动的限制性理论，而是相反，“第一次切实地论证了人的理性的权利，第一次把理性看做不是偶然性的无力的玩具，而是伟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②他几乎在论及唯物史观的每一著作中，都强调指出这一历史观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统一的特点。与后来斯大林把唯物史观简单二分为“基础”与“上层”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僵硬结构的做法不同，普列汉诺夫在社会结构的每一层面都注意到能动性受动性的内在交融。由于把握住了这一关键特点，在他的笔下，历史是一个始终由人这一“唯一因素”积极推动，同时又始终受到客观物质条件制约的生动过程。下面的话表明了他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深刻理解：“只有马克思才知道如何片刻不放弃‘人的物质性’的学说而使‘理性’和‘必然性’和解，因为他考虑了‘人的实践’。”^③

总之，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学说、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有突出贡献，他们决不像后来人们常常理解的那样庸俗浅薄。相反，后来人们在批判指责他们的“宿命论”、“机械论”时，往往批判的倒正好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但是，唯物史观并非一种纯学术性的历史哲学，而是以运用

① 在讲“西欧社会主义”时谈普列汉诺夫似乎是奇怪的。但如考虑到理论特征和精神气质而不是出生国别，读者便会同意普列汉诺夫完全是个西欧思想家。

②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97页。

③ 《唯物主义史论丛》，《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8页。

于社会主义运动、促进无产阶级解放为目的的实践理论,所以它必须首先接受现实政治运动的检测。但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在自己中心地区所发生的变化给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以深刻影响,从而给历史前进的轨迹造成极大的畸变,这样,势必给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应用也带来一系列新的困难。后来人们常常指责的“伦理社会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就是由这些困难中产生的。它们决非对理论的简单扭曲,而是对现实矛盾的哲学反映。

(二)

伦理社会主义是与马克思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的怀疑否定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经济分析预言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将日趋激化,阶级斗争将不断加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将迅速来临。然而如前面所讲过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在迈入成熟期后,并未出现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之上的矛盾的日趋尖锐化,其社会结构反而呈现出更加稳固的趋势。社会革命的到来似乎不是更加迫近而是显得更加遥远了。正是这样一种尖锐复杂的现象引起了伯恩斯坦等人对马克思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的问难。而既然这些理论都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他们便自然要进一步追究马克思的历史观方法论,对关于历史的规律性、生产力对社会历史运动的决定性等一整套学说发起批评。伦理社会主义正是以此为背景,由新康德主义者提出的伦理社会主义之所以在19世纪晚期的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中风行起来,原因就在于此。

伯恩斯坦是伦理社会主义的公开信奉者。他自称哲学的“门外汉”,对纯哲学问题也同第二国际大多数著作家一样,尤甚兴趣。他之由唯物主义历史观改宗伦理社会主义,并非出于学理的理由,而是出于现实的原因。当伯恩斯坦开始其修正主义

活动时,他是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崩溃论、危机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等等入手的。既然所有这些理论在他看来都已站不住脚,那就意味着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的看法完全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所有这些看法的历史观方法论还能够免遭质疑吗?伯恩施坦是深知方法论在马克思学说中的重要性。因此,到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部修正主义总结性作品中,他这个“门外汉”便把哲学上的修正放到了最前面。

依照伯恩施坦的观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估计之所以不正确,一个重要原因是陷入了黑格尔辩证法“概念自我发展”的圈套,“演绎地面不是实际地构想社会矛盾演变的模式”^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偏颇地只相信“经济因素”而排斥“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从而走入宿命论。伯恩施坦明确认为,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由许多个独立因素组成的,其中不仅“经济因素”发挥作用,“非经济因素”也发挥其影响。因此他主张用多因素相互作用的观点代替马克思的“片面的”“经济因素决定论”。这种主张显然是一种“因素论”,从理论上讲肤浅、空洞,不值一驳。但问题在于,伯恩施坦提出这种主张是与他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性丧失信心密切联系着的。他已经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必然性却又还想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于是他便只有把社会主义的依据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趋势移到道德、正义之类的精神“因素”上来。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根本就无必然性可言,而只是一种更符合道德进步的、追求公正、合理的美好理想,社会主义者不是要寄望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

^①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69页。

盾,而是要依托于对剥削现象的厌恶和对平等尊严的伦理追求。正是在这里,伯恩斯坦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应代替马克思的历史规律,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高准则。

“伦理社会主义”的另一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情况有很大不同。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派和伯恩斯坦主义之间;他们既拥护马克思的学说,又对考茨基的正统派经常持批评态度。他们自认为与考茨基等老的理论家相比,与现代哲学思想的联系更密切,更主张有意识地吸取融合现代思想流派观点;^①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但他们并不同于伯恩斯坦那样用伦理社会主义来“改正”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相反,他们对把康德主义与社会主义联接起来的做法进行批评。例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哲学代表麦克斯·阿德勒就认为,康德与社会主义毫无关联,对于新康德主义者用康德来补充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做法,“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断然拒绝”。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伦理必要性,而是从历史的因果必然性中得出社会主义结论的;尽管这种因果必然性同时也是道德上正义的,但却只应从因果必然性方面来理解。^②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正确的。那么,他们的康德主义倾向在哪里表现出来呢?就在于,他们力图从哲学历史观基础上使马克思与康德“悄悄地”结合起来。按照麦·阿德勒的观点,马克思是从人的关系,社会的人出发的,社会人是马克思学说的中

① 参见奥托·鲍威尔:《什么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博托莫和古德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9页。

② 麦克斯·阿德勒:《康德与马克思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第64页。

心,那么,社会关系便只能是精神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关系,自然的力量才能变成经济的力量。因此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讲的全是人类心灵的活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唯心主义之现实化了的理论。^①

这套理论的康德主义、伦理主义色彩,比起伯恩施坦来精致得多,严谨得多。尽管形式大为不同,来源则有一致处:他们都是在资本主义现实造成的唯物史观的困难面前,或抛弃或修正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三)

与此相反,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尖锐地批判伦理社会主义,真诚地保卫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他们来说,从理论上驳倒伦理社会主义并非难事。早在伯恩施坦提出其修正主义之前,普列汉诺夫和拉布里奥拉都已出色地揭示了折衷主义因素论的肤浅,他们的有关论述完全可以看作是对伯恩施坦的间接批判。因此,当他们起来面对伯恩施坦的挑战时,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提出更新的论据,而只须重复原先的论述就够了。

在历史哲学领域内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回击对唯物史观的挑战不能仅靠历史哲学,而是要有全新的社会经济分析和实际的革命行动。唯物史观不只是一种解释历史的学术方法,更重要的是用于分析当前矛盾、指导政治行动的革命实践理论。因此当现实的形势向它提出新的重大问题时,仅靠在历史哲学本身范围内维护它的正确性就不够了,必须从历史哲学转

^① 麦克斯·阿德勒:《康德与诸马克思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第68页。

入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用实际的论据和实际的革命行动来证明那一靠唯物史观支持的学说的有效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无论怎样出色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都不易使一般人真正信服,相反,还难免受到“经济决定论”之讥。

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这些理论权威的弱点正在于此。以普列汉诺夫为例。他可以在哲学领域中旁征博引,纵横驰骋,有力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但面对现实却无法透彻说明为什么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相联系的不是西欧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而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是工人阶级革命性的增长,而是逐渐消退。这样,便很难从现实生活角度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性。据说,当与伯恩斯坦论战之前,同普列汉诺夫交往密切,对他的才华极为推崇的查苏利奇忧郁地说过:“你可以反对维伯、伯恩斯坦,也可以刺疼他们,但我认为不能真正摧垮他们。”^①事实确是如此。普列汉诺夫以及别的理论家很厉害地刺疼了伯恩斯坦,但却没能实际地证明经济发展与预期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间的联系,这样,就不可能真正摧垮伦理社会主义。

同样,当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们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论战时,他们再一次遇到类似的困难。确实,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般原理出发,无法想象在资本主义经济极端落后的俄国有什么理由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于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从自己的信念出发,理所当然地要起来与布尔什维主义战斗。考茨基后来回忆说,根据马克思主义,革命是自发的事变,其到来既无

^① 塞缪尔·巴伦:《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75页。

法加速,也无法推迟。对照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考茨基发现这是一场违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人为的错误”,因而他“立即就认为有义务出来反对它”。^① 在抽象的历史哲学层面上不能说他的感受全错;俄国革命确乎像是一场由“革命家组织”强行推动的“人为”事变。然而,列宁这样大胆敏锐的革命家从来不是靠历史哲学,而是靠对当下政治形势的有利条件的判断来决定行动的,他的格言是“先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与这种勇敢得近乎鲁莽的革命号召相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式的谨严理论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他们既无法使激奋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接受自己那书斋学者的历史信念,又无法使自己从理论上把握这场革命运动的历史根源,从而在政治上站在支持者一边。因此他们愈是坚持自己坚信不疑的历史信念,便愈加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并蒙受“经济决定论”之讥。这正是所谓历史的悲剧处境:他们所处的地位推动他们必然地向历史提出劝告,历史却必然地使他们的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

※

※

※

总括本章,结论是,西欧社会主义沿着渐进道路演进,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取得重大进步,唯独在实现预期的革命目标上停滞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在这里所遇到的困境,其实是反映出成熟期的资本主义对于针对它的科学批判产生了强大的抑制能力而已。这种情况决定了社会主义在这一地区要走与预期大为不同的道路,尽管当时尚难以揭示这里面的复杂因果联系,但现

^①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1页。

实已迫使人们试图将视野转向别的地区。1902年的考茨基和1905年的帕尔乌斯都模糊地预言俄国将发生某种新的事情。^①历史的发展证实了他们的预感,但却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下面就让我们来转而考察俄国。

① 考茨基:《斯拉夫人与革命》,载《火星报》第18号;帕尔乌斯:《战争与革命,IV:专制与改革》,《火星报》第32号(中央编译局1959年影印本)。

|| 第三章 ||

超越式行程：俄国社会主义

一、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一)

在不同的背景下，俄国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西欧大相径庭。

如前所说，处于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俄国社会有着极大的革命潜能。但这本身并非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劳动群众的自发反抗情绪，并不产生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假设俄国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这种革命潜能只可能造成一次次失败的骚乱或起义，推动俄国在连绵的破坏动荡中一步步迈向西式资本主义。但是，“历史转化为世界史”的伟大转折使俄国不是遵循这种按部就班的历程，而是走上了一条超越式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俄国无须从自己的经济发展

中逐步酿造出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从西欧的先进思想成果中直接吸取社会主义的营养。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始终超前于经济发展,这在斯大林时期以前,似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列宁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① 布哈林说:“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但是,它为无产阶级输送了一大批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件事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文化较高的一些民族,首先是德国人创造了许多思想,我们不必用‘自己的智慧’再去创造它们。在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输入的’。”^② 这两位俄国革命权威人物的话提示我们,不要一味地纠缠于俄国自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是要着意于俄国政治思想史的演进,从俄国与西欧思想的相互关系中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和发展的逻辑来。

纵观俄国近代社会思想史,其主流是一部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求本国走上自由幸福道路的捷径而艰苦探索的历史。俄国的落后与西欧的先进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使俄国知识分子把从西方学习真理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本国社会生活条件的落后又使他们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那些蒙昧贫乏的东西拿出来炫耀。这样的特点在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民粹派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该派别上承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下启“劳动解放社”,构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前史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

① 《怎么办?》,《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卷第 318 页。

② 《列宁和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中册第 336 页。

民粹派本身又划分为好几个派别，彼此矛盾，争论不休。我们在此没有必要详细罗列他们的具体差别，而只限于举出他们的某些共同思想特征。

首先，民粹主义者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猛烈批判者。在这方面，赫尔岑（普列汉诺夫公正地称他为70年代民粹派的鼻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莫立了基础。在经历了1848年革命的失败之后，巨大的失望使赫尔岑确信西欧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它正在日复一日地陷入堕落败坏的深渊。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在某个时期对西欧持轻蔑态度。他认为，西欧的政治民主是一文不值的，民主只是使人民幸福的一种功能，因此西伯利亚平静的人民要比苦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英国工人有更多民主。^①70年代民粹派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上述倾向。他们全力以赴攻击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文明”；他们把“欧洲的机构和欧洲的经济制度”看做“绞索”和“绝境”；他们能够庆幸的是，俄国还没有落到西方的惨境：“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我们不曾有过欧洲式的生活。欧洲的不幸，欧洲的绝境对于我们是一教训。”^②在这些民粹派看来，俄国的落后反倒是俄国的一种福气了。因为正是这种落后，在他们看来是使俄国能够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痛苦，“走另一条路”的有利之处。

为了使俄国“走另一条路”，民粹主义者最珍视的莫过于农村公社了。众所周知，德国人哈克斯特豪森在40年代观察了俄

① 参见A·瓦里斯基：《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页。

② 《致青年一代》（60年代的传单），《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国村社后,认定是它保证了俄国不致出现西欧的“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他的发现立即引起俄国思想界的强烈兴趣。把村社当作防治西方资本主义“溃疮”的灵验药方的想法,自那以后一直激动着俄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民粹派们。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曾就村社的起源发生争论,而在民粹主义者看来,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赫尔岑的挚友奥格廖夫所说,“村社在俄国事实上存在着,问题在于它是否被毁灭”。^①民粹派很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日甚一日地威胁着村社的存在,而他们是决不允许村社毁灭的。在他们心目中,正是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才使落后的俄国比先进的西方更接近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我们的农民已经获得了美国人、英国人以及每一个理解到小土地所有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农民只能为之望洋兴叹的东西”。^②所以,在俄国只要适时地结束专制统治而保留村社,便很容易把俄国引上“另一条路”。

很明白,这些观点充满了对工业化、现代化的恐惧和对传统小生产的怀恋。而这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可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沿途扫除障碍向全世界拓展的进程中,每一步都遇到眷恋旧日生活、诅咒资本主义变革的反现代化思潮的抵抗,越是拥有辉煌的过去的落后民族,抵抗越甚。俄国民粹主义正是属于这一浪漫主义思潮,他们的理论主张,只不过是先前西欧的西斯蒙第、“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的主张的老调重唱而

① 参见T·山宁:《作为一个“发展中社会”的俄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0页。

② 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俄国民粹派文选》第163页。

已。

然而，时代不同了，西方已经高度发展了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必然地给落后国度的思想家们以强烈影响，逼迫着他们把自己那些从贫瘠土壤中酿制出来的陈年老窖，搅拌进大量西方最新的思想调料，使之具有现代的科学色泽。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巴枯宁和 70 年代民粹派，概莫能外。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浸润在俄国农民式的落后甚至反动情感中，但往往对西欧思想又有惊人的广泛涉猎。按照司徒卢威的说法，民粹派可划分为西方主义派和斯拉夫主义派。^① 如果你读“西方主义派”的作品，你会发现这些人不但不认为自己与西欧思想相隔绝，相反，还把自己看作是与西欧社会思想相一致的。他们把自己的俄国发展独特论看作是充分研究了西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的科学结论。在这个意义上，瓦里斯基说“古典民粹主义不仅是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应，也是（特别在起初时）俄国的民主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应”，^② 是颇有见地的。

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者之热心于引进马克思主义，便不是不可理喻的了。

俄国人早就知道马克思。据说，在 40 年代《德法年鉴》时期，别林斯基就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所了解。据说，后来车尔尼

① 参见他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第一章，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② A·瓦里斯基：《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俄国民粹主义者社会哲学之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132 页。

雪夫斯基对马克思也有一定认识^①。这些都还是零敲碎打，然而在60年代中期以后，俄国思想界对马克思愈来愈熟悉，“从7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就愈来愈成为俄国社会思想的巨大课题了”。^②

特卡乔夫是民粹派中最早注意到马克思的人物之一。早在60年代中期，他就宣布自己是马克思的追随者。60~70年代，巴枯宁、洛帕廷、丹尼尔逊、特卡乔夫、拉甫罗夫、米海洛夫斯基等人，都向俄国人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此外，著作界也有不少人从学术角度认真研究马克思，他们中间可举出圣彼得堡大学教授考夫曼和基辅大学教授季别尔，这两人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都曾得到马克思本人的称许。^③通过以上这些活动，马克思对70年代俄国知识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致在当时，引证马克思在很大程度已成为民粹派运动中的风尚。

民粹派于是把自己要求避免资本主义道路的情绪化主张，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性批判奇特地混合在一起了。

当他们历数西方资本主义苦难，让俄国人“以儆效尤”时，他们从《资本论》中发现了大量论据。那里面对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弊病的分析，对资产者残酷贪婪的揭露，对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描写，在民粹派看来，用于证明俄国决不应步西欧后尘是再有用不过了。所以毫不奇怪，民粹派作家们起初大都

① 参见纳尔斯基等：《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第17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另有一种说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中读过《资本论》

② 同上，第317页。

③ 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2版。

对《资本论》持衷心欢迎态度。后来成为马克思学说反对者的米海洛夫斯基，在 70 年代就曾盛赞《资本论》“永远是逻辑体系和巨大博学的纪念碑”^①，并认为该书俄译本的出版对俄国选择自己的路是“再及时也没有了”。^②

有些民粹派人物更前进一步，希望把他们关于在俄国避免资本主义的主张“科学化”，像马克思那样，不是从道德义愤角度去否定资本主义，而是用俄国现实经济条件的分析去否定资本主义。他们不辞辛劳地收集资料，悉心研究 1861 年后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了决不含糊的认真态度。丹尼尔逊（笔名尼古拉一逊）在这方面是突出的代表。他运用《资本论》的范畴、概念，以大量经济材料证实，俄国自改革以来资本主义确实在大踏步前进，而且“资本主义的趋势看来正在占上风”。^③ 然而，他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注定了无法真正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据他说，是俄国的现实条件决定了这一点。俄国资本主义是历史上的迟到者，没有可能找到足够的销售市场，所以它不但不会带来经济繁荣，反而会造成“人民经济的破产”。“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摆脱这种状况”。^④

民粹主义者也力求吸取唯物史观。就连巴枯宁这样的马克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 2 卷第 357 页，转引自《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 204 页。

② 米海洛夫斯基：《论马克思一书俄文版》，《俄国民粹派文选》第 232 页。

③ 丹尼尔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俄国民粹派文选》第 729 页。

④ 同上，第 811 页。

思的死敌,竟也在自己著作中引进了不少类似唯物史观的东西。^①他承认关于物质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决定性条件的观点,他把他那否定政治活动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称为唯物史观的结论。更有趣的是,特卡乔夫这个极端的唯意志论者,在鼓吹他那不受任何客观条件限制的革命时,却也可以满口赞成这样的观点:社会发展有其必然性,文学、科学、宗教、法权等等,都是构成它们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表现。^②由此他得出了一个奇特的结论:要抢在资本主义发展形成必然性之前,加紧发动革命。

在民粹主义的核心问题——农村公社问题上,许多民粹主义者力图把保留村社同西方先进成果结合起来(这一点往往时下被人所忽略了)。一般说来,他们并不怕承认村社的落后性。在这方面,我们只要指出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就够了。但落后的东西又怎能成为先进的现代社会主义制度的起点呢?民粹派们认为,它可以靠吸取西欧先进的技术和其他成果而变成这样的起点。民粹主义的先驱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著名论文《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发表于1858年)中就曾主张,俄国能够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直接利用西方经验,以村社为方便基地,由“低级阶段一跃而进到最高阶段”。^③70年代民粹派把这一思想发展得更具体,甚至宣布只是由于西方已面临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

① 参见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② 《特卡乔夫选集》第5卷第93页,转引自瓦里斯基:《俄国思想史》第429页。

③ 《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23页。

想法才获得了历史依据(如吉荷米洛夫等人)。

上述观点的错误,早已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出来了,我们这里无须赘述。这里只是想指出,尽管马克思学说在民粹派手上往往是以曲解的方式被利用,但一种本质上落后甚至反动的农民社会主义竟然可以借用西方最先进的思想成果来表现,却反映出俄国社会政治思想在先进的世界环境中的发展跳跃性。它不自觉地给俄国马克思主义铺了道路,使之在工人阶级运动实际发展之前便能起步。

(二)

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始于1882年,以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名转变为标志。这一事件是在怎样一些力量的作用下促成的?以往不少著作受机械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夸大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程度,牵强附会地给这个事件找出经济的和阶级的前提。但这种作法很难得到史实的有力证明。相反,经济史指明,尽管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狂潮,但资本主义并未占明显优势,工人阶级也尚未形成一个独立阶级。当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时,俄国不但并无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发展,而且还正处于一个持续多年的工业化相对停滞甚至逆转时期。^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产生的原因,在本文看来,首先不在于经济发展,而在于民粹派运动屡遭挫败所造成的反应。

盛极一时的民粹运动到70年代后期便走了下坡路。革命知识分子们满腔热忱的宣传在民众中应者寥寥,“到民间去”的

^① 参见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有关处。

忘我行动得到的只是农民的冷眼旁观甚至怒目相向。失望之余革命家们走上了恐怖活动道路,却只给运动带来更严重的破坏。组织分裂了,信念破灭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对先前运动的传统做痛苦反思的小小思潮,其文学代表可推乌斯宾斯基,政治理论代表则无可争议地是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人。

普列汉诺夫等人之摒弃民粹学说转向马克思主义,自有其个人的原因。他们思想敏锐,视野开阔,或富有理论头脑,注重思想的彻底性,或善于吸取实践运动的经验与教训。这些品质帮助他们很快地发现了自己信念的致命弱点。^①另一方,若从社会思潮角度着眼,则应认为是民粹派运动所借用的西欧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他们做了准备。在民粹运动大力引进马克思的风气中,普列汉诺夫在还属于民粹派队伍时,便已显示出对西欧哲学与马克思学说的特别关注。在他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1879年)等论文中,尽管仍牵强地使马克思主义屈从于民粹派目的,但已可看出对科学方法论之彻底性、一致性的努力追求。阿克雪里罗得在还是民粹主义者时,便已开始熟悉了西欧工人运动的策略与经验。把这些方法和经验进一步运用到彻底的地步,就一定会导致民粹派自身原则的崩溃。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方法和经验,民粹运动已再

① 可以把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里罗得比较一下。前者是从理论反思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后者则是从民粹运动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对比中得出结论而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参见A·阿谢尔:《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与孟什维主义的发展》,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64-65页。

衰三竭走入困境，它仍然不会如此迅速地遇到如此深刻的反省和批判，而只会在长期英勇而徒劳的斗争之后，直到俄国资本主义完全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充分成熟壮大的那个时期才由事实去证明。但是先进的世界影响大大提前了这个过程，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世界思想史和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式发展。

以上所述历史背景，使我们能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作一番新的考察，指出一些以往注意不够或分析不足的特点。

1. 为历史所决定，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证明，是侧重于哲学而非经济学。

那一时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的事实，迫使普列汉诺夫首先不是从实证的而是从理论的角度去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从一般现象看，资本主义在俄国确实步履蹒跚，困难重重。资金短缺、市场匮乏、自然经济及其观念的层层阻滞，使资本主义路途上荆棘丛生，以致它仍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沙皇专制扶持。但 1881 年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是个思想反动、本能地敌视社会改革的人物，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父的政策，给资本主义带来更大的阻碍。这一切，使俄国资本主义确乎显得一波三折，前途未卜。有限的经济材料，似乎既可证实也可证伪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前景。既然现实如此，要想仿效《资本论》，以大量经济事实揭橥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性，便殊非易事。如此扑朔迷离的时势，大约会使一般人陷入困惑，而普列汉诺夫却能从中脱颖而出，完全是得力于他那过人的哲学思维能力。

不能说普列汉诺夫没有经济分析。例如在《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 年)、《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的民粹主义理论》(1896

年)等著作中,他都尽可能运用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在经济学领域提出的一系列见解,也都具有新颖独到的性质。但相对而言,经济学在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活动中始终是弱项,这早已为许多学者所确认。^①其原因,固然与他个人的特长、偏好等有关,更重要的则在于,这正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难以充分占有材料的表现。于是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在与民粹派进行论战时,总是避免与他们纠缠在具体经济资料和数据上,而是尽力把争论焦点提升到更高的层面,强调观察问题和做出结论的方法论意义。这样便超出了相对狭窄、拉扯不清的纯事实领域,使问题获得了广阔的哲学基础。按照普列汉诺夫的主张,研究俄国社会发展前途问题的关键是作方法上的转变;应当首先从空洞地谈论“俄国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转向认真地研究人民的经济,应当扎扎实实地估计农奴制改革以来促进着农村公社瓦解的那些条件,尽可能精确地确定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瓦解公社的速度和力量;然后还应当进而研究是否有能够阻止这些“个人原则”的胜利和给村社以新的生命力的力量,弄清这些力量是外部还是内部的,是现实的还是抽象的;如果这些力量是外部的,应当自问,单凭外部力量就能够改变一整个阶级的经济和社会的生活吗?还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应当在哪里运用这一力量,是在我们农民的生活条件

① 远者如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称普列汉诺夫为享有很高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但认为他却不是“了不起的经济学家”。见该书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卷第194页。近者如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亦持相近看法。见该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的范围内,还是在他们的思想习惯的范围内?”^① 归根结底,这种方法的转变要求运用辩证法,“所应注意的不是我们社会关系的静态而是其动态,‘看待’人民不是看‘他现在的情况’而是看他将变成什么情况,所考察的不是俄国生活的不动的情景,而是其依照一定规律进行的过程”。^②

方法的转变是异常重要的,它会使人同样的经济资料里面作出全不相同的结论。“动态”的方法使普列汉诺夫眼光远大,敏锐地指出了目前尚不强大的资本主义在运动发展中会逐步强大起来的前景。在这方面,他对民粹主义观点的驳斥是异常有力的。举一个例子。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都看到,俄国资本主义是在国家庇护下发展的。按民粹派的意见,这意味着俄国资本主义是“人为”的,缺少生命力的,无前途的,只要失去国家的扶持,它便会萎缩消失。普列汉诺夫则以“动态”方法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每一新的社会的或哲学的原则都是在旧的和它对立的原则内部——因此也是靠了旧原则的营养液——诞生的。由此而得出新原则的前途是‘无希望的’这种结论,是等于不懂得历史。”^③ 这就是说,与西欧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类似,俄国资本主义也将是在国家的保护下成长壮大,最后使专制国家本身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将它抛弃。于是这里所看到的,便不是“人为的”而恰恰是“必然的”历史现象。

仅靠正面的论述尚不足以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普列汉诺夫更提出一种“反证法”。他问:不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

① 《我们的意见分歧》,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66 页。

② 同上,第 67 页。

③ 同上,第 127 页。

展还不充分,然而有什么力量足以阻挡资本主义吗?民粹派回答,有的,有知识分子的“理想”和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但普列汉诺夫却不能满足于这种回答。他还要问,这些“理想”和“本能”属于哪些阶级的,这些阶级的一般生存条件与目前的发展趋势的关系如何。于是便发现,民粹派寄予厚望的“理想”和“本能”,都不过是其生活基础已经在经济发展面前严重动摇、面临瓦解的农民的可怜“理想”而已。用这种将要崩溃的理想去制止正在上升的经济潮流,是注定无望的,因为,“我们认为,愿望的东西是从必然的东西里面生长出来的,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议论中不等于必然的东西”。^①而由于在现实中不存在能够阻挡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东西”,资本主义在俄国的逐步壮大便只能是“不可避免的”。

2. 立足于必然性范畴的基地上,普列汉诺夫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定,始终是从经济和社会物质条件的根本变革角度着眼的。这使得他对于民粹派所热衷的不受客观经济条件制约的“社会主义革命”,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

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它不是由一小批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物夺取政权的权力更替;它是一场由经济基础到观念形态的全面的、社会大变革,目的在于由社会生产者来全面地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从这种信念出发,普列汉诺夫坚定地认为,现时俄国根本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政府。仅凭“理想”和“本能”都不足以支持这样一场大变革,仅仅剥夺大地主、资本家,也不能提供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基础,因为,这种基础要以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水平为前

① 《我们的意见分歧》第25页。

提。普列汉诺夫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生产的客观社会诸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有社会主义组织的程度，因此在生产者们自身中还没有建立这一组织的意图和能力，我国农民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解决这一任务。”^①

但是，假设如果少数“社会主义者”确实靠密谋夺得了政权，又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普列汉诺夫断言，只会有两种结局。第一种，建立起来的革命的“临时政府”尊重人民自己的意愿，放手让他们去安排自己的经济关系，那时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社会主义，只会有村社的进一步瓦解、商品经济的更大发展和贫富的继续分化，于是“理想”就成了空话；第二种，革命“临时政府”对不觉悟的人民不抱指望，而径直由自己去担负起组织社会生产的任务。那时它只会因不断要采用强制手段而“把自己变成经常性的政府”，其结果是，它将在“家长制的有威权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想中寻找出路。在这些理想中只是作这样的一种改变：使得管理国民生产的不是秘鲁的‘太阳之子’们及他们的官吏们而是社会主义的阔阔”。^② 这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专制主义。普列汉诺夫明确宣布：“假如‘工人的解放必然是工人自己的事业’，那末在‘城市的和乡村的’工人阶级没有准备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方，任何专政都作不出任何事情来。而这样的准备普通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组织的发展相并行的。”^③

3. 在全力证明资本主义必然性的同时，普列汉诺夫主张先

①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08页。

② 同上，第110页。

③ 《我们的意见分歧》第230页。

期建立工人政党,进行理论准备,以缩短历史的自然行程。

资本主义是必然的,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只能坐待历史发展,或者干脆自己也去“开起小酒馆,”加入资产者行列去促进历史发展呢?普列汉诺夫的回答是,不。他指出,根据历史辩证法,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确信资本主义必然性但不需要向资产阶级调情,而是要从历史发展之必将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方向着眼,在现时就为未来的无产阶级斗争进行准备。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呢?综合起来,有如下列:

A. 一方面,同其他主张政治自由的政党一起对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另一方面,“维护自己作为特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①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能把自己的原则同其他党混淆起来。

B. 认清眼下尚未成长壮大,但注定要成为“强有力的小伙子”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普列汉诺夫大力呼吁:“俄国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一种必要条件下才能维持自己作为一个特别政党的存在,那就是依靠工人阶级自觉的政治运动的支持,除了这一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就毫无指望。”^②阿克雪里罗得也主张:“在这个国家中,所谓‘知识分子’的力量是远不足以同政府作斗争的。这已为70年代革命者的经验所充分证实了……没有工人的援

① 《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任务》、《普列汉诺夫全集》,莫斯科-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1923年版第3卷第95页。

② 同上。

助，知识分子是决然不能推翻延续长久的沙皇专制大厦的。”^①

C. 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先进工人中间去，培养其自觉意识，以便“培育一些准备未来的俄国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的分子”。^② 当面向先进工人说话时，普列汉诺夫把任务规定为：“1)在你们的同志中间发展自觉性；2)组织和团结他们的力量；3)集中这些力量去争取一些政治权利，这些政治权利在现时期有可能使你们获得某些经济改革，而主要的是使你们容易在未来进行决定性斗争。”^③ 这样做的意图，在于“争取在俄国宪政生活的初期，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特殊的政党而出现”。^④

试设想，如果按照这种规划，工人阶级政党就将不是在资本主义较充分发展了的阶段上，而是会在资产阶级刚推翻专制制度之时出现。那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很有可能，历史将会大不同于西欧的“一般历史行程”。对此普列汉诺夫已有某种估计。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像以前在英国发展的那样慢，而且它本身的存在也不会像在‘西欧各国’那样久。我们的资本主义的花，还来不及完全盛开，就

① 《致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信》，《马克思主义在俄国：1879—1906年间重要文献》，内尔·哈丁编，理查德·泰勒译，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②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111页。

③ 《俄国工人的当前任务（给彼得堡工人小组的信）》，《普列汉诺夫全集》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5年版第2卷第372页。

④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13~114页。

要萎落,这是国际关系的强有力的影响向我们保证的”。^①“有权希望,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会很快跟在专制制度垮台后面发生”。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合而为一固不可能,“但是这两个时刻的接近是取决于我们的”。^②

可见,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理论主张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他们主张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客观性、不可违逆性,反对民粹派的俄国社会发展特殊论和不顾客观物质条件的“夺取政权”,要求社会主义者的战略设想必须顺应历史的必然趋势。这对于俄国革命政治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在资本主义刚刚迈步、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势力时便肩负起组织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结果就一定会使往后的历史进程大为缩短。在历史上,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思潮一经产生并落实为实际运动,本身就成为既定的社会力量,它必定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和理想去积极塑造历史,而不可能坐待资本主义自然而然的“成熟”。普列汉诺夫等人促成了这一历史超越力量的兴起和发展并开始觉察到它的未来意义,但他们对它的深度和广度却远未估计到,以致到后来这种发展危及他们的必然性信念时,他们便起来与之战斗,并因此落到悲剧境地。但无论如何,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在理论上和历史上为后来的布尔什维主义超越战略铺设了道路,这一点却是

① 《我们的意见分歧》第 278 页。

②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1 卷第 115~116 页。

必须给以充分估价的。^①

二、列宁的建党理论、革命策略及其反对意见

(一)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②那么,90年代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如列宁所说的“先进工人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结合”。列宁称“这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即90年代俄国深刻的社会运动汇合的结果:一个是工人阶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另一个是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的社会思想运动”。^③

“工人阶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的高涨,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促成的。在经历了农奴“解放”之初的摇摆蹒跚和80年代的相对停滞之后,俄国资本主义终于在90年代迎来了一个繁荣期。苏联著名经济史家梁士琴科详细叙述了当时重工业和商业的高涨、新技术的广泛采用、企业数目和工人人数的增加等等,指出:“九十年代的这个工业高涨,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全

① 苏联较早的历史著作在这方面比较客观,例如尼·尼·波波夫《苏联共产党(布)历史概要》(见该书第一卷第22页,中共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6年版)。但后来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下,“劳动解放社”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被大大贬低了。

②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455页。

③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15~216页。

部国民经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就在这一时期,最后形成了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①

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迅速成长起来了。他们开始通过运动提出自己的要求。90年代开始,罢工成为普遍现象。顿河流域、罗兹、华沙、里加等地区的犹太手工业者罢工首开其端,1895年雅罗斯拉维尔的纺织工罢工和1896年彼得堡的工人大罢工,引起了许多工业城市的响应,在罢工中提出了十小时半工作日的要求。这可以说是俄国工人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

与此同时,90年代前半期又是马克思主义思潮广泛传播开来的时期。在此之前,亡命国外的“劳动解放社”三名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几乎是孤军苦战,从者寥寥,然而到了90年代,马克思主义小组在国内却如雨后春笋,遍地丛生。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以及司徒卢威等人,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无例外都深受“劳动解放社”理论家们的影响。他们后来不论采取了何种政治立场,都以感奋的心情谈论普列汉诺夫在他们一生中的引导作用。^②由于这种作用,新一代的革命青年们在步入政治运动之初很快便认清了民粹主义的错误,迅速地汇集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来。上述这批20多岁的年轻人表现出了罕见的成熟,差不多同时都写出了几部有份量的著作,担负起了由“劳动解放社”开创的反对民粹主义思潮的工作。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

① 《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第197页。

② 他们的有关言论,可参见前引塞·巴伦:《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第142-143页。

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就是其中的代表作。^① 这些年轻人比起“劳动解放社”的老理论家来,还有一个明显的长处:对国内情况有直接的了解感受,与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保持着远为密切的联系,因而在鼓动工作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殊非“劳动解放社”可比。他们在工人中进行了初步的启蒙宣传之后,很快就把自己的小组扩大联合为协会。以1895年成立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为开端,莫斯科、基辅、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城市的类似协会相继成立。这些协会和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一起在1898年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了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正式诞生。

我们简略描述以上史实,意在指出“俄国两个深刻的社会运动汇合”的一大特点。与西欧先有工人自发运动,尔后才产生社会主义自觉理论的一般情况不同,在俄国这里,工人运动刚刚走上前台提出其模糊的初步阶级要求时,便已遇到了手持相当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上十分成熟的社会主义领导骨干,他们以西欧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在短短几年内迅速组织了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高度成熟的“社会思想运动”担负起幼嫩的“自发的群众运动”的领导,这种情况完全突破了一般历史行程,它使得俄国资本主义还未能跨入其成熟期时,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就已经猛烈地撞击它的大门了。这是一种莫大的历史超越

① 尽管司徒卢威的这本书已表现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倾向,但当时它作为“马克思派”著作的影响却是相当大的,以至在一般知识分子心目中,只知司徒卢威却不知普列汉诺夫。参见前引瓦里斯基《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第166页。

性,对往后的进程起了巨大影响。试设想,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按照“一般历史顺序”,在1895年后才逐渐从工人运动的自发经验中积累、酝酿和提炼出社会主义理论,那么也许要使历史后推数十年。很可能在此期间俄国资本主义就已度过了其不稳定的早期阶段——如果那样,俄国社会发展就可能大为改观。

从上述的历史形势中,必定会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更为激进的革命思潮,要求利用社会阶级矛盾紧张和社会主义政党超前发展的有利条件,促使历史跳跃式地发展。这一思潮果然产生了,它的代表人物便是列宁。

列宁在开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生涯时,似乎同其他人并无重大区别。他也是把重点放在批评民粹主义和证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进步性上面。然而,即使在这时期,也可发现一些构成列宁后来思想和实践特点的萌芽:在承认资本主义发展进步性的同时,对资产阶级自由派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着力强调工人阶级的独立性等等。当司徒卢威主张“一定得承认我们还不够文明,还要向资本主义学习”^①时,列宁讲的却是由“俄国工人”而不是资产阶级“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②当列宁于1895年初次出国去会见“劳动解放社”成员时,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都认为现时期应“面向自由派”,列宁却与他们不同,主张“背对着自由派”。^③此后,在被捕入狱和流放期间,列宁系统地思考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今后的道路,制

①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第228页。

②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

③ 参见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第108页。

订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组织计划，并在流放期满后立刻付诸实行。这便是那一著名的计划：在国外建立机关报，通过大力的宣传、联络、组织，把涣散分离的运动联合起来，形成坚强的、随时能在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革命家集团。这全部计划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如下判断上：俄国软弱落后的资本主义与专制制度并存并容，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和组织程度不足，但却自发地具备反对现存秩序的意识，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已得到高度发展。因此象列宁这样的革命家既不愿意，也不可能等待资本主义的自行发展在遥远的未来去造就社会主义斗争的物质条件，而要求在现存的专制制度下便建立起社会革命的“主观条件”，以便把俄国的落后变成对革命有利的“客观条件”，从而把俄国引上一条大为简捷的历史前进之路。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列宁已经提纲挈领地表述了自己的主要思路，随后多年的政治斗争，则使这些思路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一套影响至为深远的思想体系，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或列宁主义。

(二)

一般说来，列宁主义包括在长期布尔什维克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列宁的理论，其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从上世纪末直至本世纪20年代。但早在《火星报》创刊前后到1905年革命时期，列宁提出了一些构成他的思想本质基本特征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在当时就已得到列宁主义的名称，尽管是由它的反对者在贬义上使用的。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列宁这些主张的几个重要方面。

1. 关于“灌输”的理论。

众所周知，列宁高度重视具有“自觉性”的少数革命家对多

数只有“自发性”的劳动群众的理论灌输工作。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并非自列宁始。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十分重视理论宣传的巨大作用。马克思的一句人所共知的名言便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后来,普列汉诺夫在同民粹派激烈论战时更大力高扬理论的先导作用,响亮地喊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名符其实的革命运动”的口号。列宁对这些思想是十分赞许的。但是,他的“灌输”理论更多地得益于考茨基。考茨基曾经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并非从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自然产生出来,而是与阶级斗争“并列地产生的”,“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也就是说,从掌握科学知识的资产阶级阶层的个别人物头脑中产生出来,然后才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的。^②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直接继承了考茨基,但却赋予了几乎全新的意义。

首先,在考茨基那里,社会主义意识对无产阶级斗争的关系虽然没有从属关系,但毕竟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共同的产物,因而尽管彼此独立地发展,但毕竟是“并列地产生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思想尽管需要由知识分子来提出,但却有赖于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然而对列宁来说,社会主义意识和无产阶级斗争甚至也不是如考茨基所说的“并列地产生的”,而是“完全不依赖的”。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只能形成工联主义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② 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版)和《列宁选集》第1卷第326页。

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①而这种工联主义意识,在列宁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自觉意识的加入,工人阶级运动只不过是受资产阶级思想支配的活动而已。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②这样一来,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自然产生出由知识分子从外面把社会主义学说灌输给工人运动的绝对必要性。与考茨基不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灌输”事业赋有了全部运动之至关重要的动力的意义。

其次,还应看到,“灌输”工作之于列宁,比在考茨基那里具有远为重大的实际意义。考茨基重视“灌输”,意在强调理论宣传的地位,但他和大多数人一样,确信理论毕竟只能充当实际运动的催化剂,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并非取决于“意识”,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列宁则不同,他把“灌输”已经不仅仅看作促进工人运动自觉性的手段,而是使之成为一个现实具体的革命运动计划的重要一环。列宁的《火星报》计划,正是要从“灌输”工作开始,造就一个思想一致、紧凑精干的革命行动组织,而不只是通过合法报刊去培养一般工人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这一点,是考茨基的思路远不能及的。

2. 关于“革命家组织”的理论。

列宁显然是从他 90 年代中期的短暂实践经历中深切感到,

①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317 页。

② 同上,第 317~318 页。

在一个专制制度横行,秘密警察肆虐的国度里,革命者仅凭借在工人日常斗争中从事鼓动的小组的力量,是无法进行有效斗争的。因此,从创办《火星报》开始,他就力陈建立一个高度集中、分工细密、步调一致的革命政党的绝对必要性,把编织一张“领导者组织”与基层党员、“先锋队”与外围群众组织相结合的广泛组织之网的意义提到至上地位。列宁认为,既然掌握社会主义自觉意识、负有工人群众领导者职责的职业革命家结成了组织,“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①全部权力归根到底要集中到中央机关,即由一批富有理论素养和实际斗争经验以及组织能力、忠诚于革命事业的职业革命家手中。他们负有执掌运动航向、制定行动纲领和策略的责任,下面的层层组织网络则有效地执行他们制定的路线,以保证公开合法斗争与秘密非法斗争、平时活动与革命时期活动等等的联系和转换。列宁名著《怎么办?》的中心思想,便是反复不懈地阐明这一高度集中的“革命家组织”的优越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马尔托夫的决裂,随后的《进一步,退两步》,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中与“取消派”的尖锐争论则更证明列宁把这一革命家组织的存在视为生命线,视为俄国革命成败的最重要环节。列宁为强调这一点,甚至套用阿基米德的名言,大胆宣布:“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②这句惊世骇俗之语,遂成为表明列宁政党理论特点的著名口号。

与此相联系,列宁高度突出这一政党的密谋性质而轻视它

①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8卷第366页。

②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406页。

的“民主形式”，甚至称“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义而且有害的儿戏”。^① 他坚决反对马尔托夫倡导的知识分子自由争论的松散组织，更反对后来“取消派”把党溶化在一般工人运动中的要求，而只主张“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但是，在排斥“广泛民主制”这种“儿戏”的情况下怎样保证组织的纯洁，与工人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及它的成员不致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呢？列宁说，“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本身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这种“同志信任”加上革命家组织成员“非常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以及“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相当普遍的舆论”，^② 就能成功地提供比民主制有效得多的监督。显然，这些主张与 70 年代民粹派的主张颇有契合之处。列宁本人不但不隐讳，而且公开地承认这一点。他多次称颂“70 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楷模的出色的组织”。^③ 完全可以说，列宁的组织主张是在马克思主义纲领基础上移用了民粹派的密谋组织原则。^④

列宁的上述全部主张，以其大胆独到使人震惊，从一开始便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在当时的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眼中，列宁的这一整套观点与他们的素来信念扞格不入。在党内，

①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418 页。

② 同上，第 420 页。

③ 同上，第 413 页。

④ 奇怪的是，与列宁相反，我们的不少论者却对此讳莫如深，甚至把谈论列宁与民粹派的联系视为褻渎。实际上，列宁不但研究过民粹派革命家的著作，而且始终对他们深怀敬意。

从普列汉诺夫到马尔托夫等一批著名人物都持强烈否定态度。1903年二大期间及其后,首先是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托洛茨基等坚决反对列宁,随后,普列汉诺夫在一段时间的犹疑徘徊后,也加入了反对者行列。在国际上,不仅考茨基这样的公认理论权威不同意列宁^①,罗莎·卢森堡这样的激进左派也对列宁主张提出了尖锐批评。

对列宁的“灌输”理论,普列汉诺夫起初从内心里就不同意,但出于共同反对“经济派”的需要,他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了沉默。^②在1903年后与列宁决裂之后,他很快便对“灌输”论从“‘历史哲学’的根本问题”的高度展开批判。他尖刻地称列宁观点为布鲁诺·鲍威尔关于“批判者”与“群众”关系的观点的“新变种”,是“新版本的英雄和群众的理论”。^③在他看来,列宁由于宣称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完全不依赖于工人阶级斗争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固然要有赖于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思维,但其现实来源则存在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之中。工人的自发运动也不是像列宁所说的只会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而是完全能够达到社会主义意识的高度。革命知识分

① 考茨基曾表示,如果要他在列宁和马尔托夫之间必择其一,他宁择马尔托夫(《火星报》第66号)。

② 戴维·麦克莱伦把事情说成是,“列宁的观点代表了包括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内的整个劳动解放社”,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参见该作者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6年译本,第110页)。作者对历史显然缺乏了解,该书中史实错误不少。

③ 《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三联书店1964年版上册第103页。

子能够加速这一过程的运动，“使之更自觉和更能达到目的”，^①但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看成“惰性”力量和唯有依靠知识分子去指挥的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消极物质”。普列汉诺夫说，列宁是在宣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救世主”思想。^②

对列宁的批评，更多地集中在与“灌输”论密切联系的革命家组织理论上。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全都认为列宁的组织计划是“盲目崇拜集中制”，是用中央委员会代替党员的独立思考，把党员变成“齿轮、螺帽和螺栓”。^③罗莎·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则以更加尖锐、系统的形式集中代表了针对列宁的反对意见：

“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

① 《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三联书店1964年版上册第98页。

② 同上，第105页。

③ 参见阿克雪里罗得：《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载亚·阿谢尔编：《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年版第53页。

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①

一般地说,卢森堡并不反对集中制,而且她看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面对的特殊历史环境十分自然地把人引向集中主义。但所有这些都,在卢森堡看来都不能为列宁的主张辩护。为什么?因为在她看来,社会主义只能是无产阶级群众自己的事业,离开无产阶级自己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活动,任何社会主义都只会徒具虚名。正是这一认识使她对她所称的列宁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充满忧虑。在她看来,这将从根本上损害社会主义的事业。她的强烈信念促使她公开宣布:“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 error,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②

对于以上反对意见,简单地扣上反马克思主义帽子(如以往苏联著作中所做的那样),殊不足取,因为稍稍切近一些观察,便可看出列宁的政党理论同马克思的主张并不能直接划等号。今天,应当把双方的争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不同意见的交锋,并从当时及往后的历史发展中绘以评价。

近年来,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列宁反对者们的主张反映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照搬到俄国来,便忽略了俄国国情,构成了政治错误。此说有一定道理。确实,在罗莎·卢森堡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对列宁主张的评判在颇大程度上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为基础。例如她断言真正具有首创精神的活力

①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2 页。

② 同上,第 58 页。

只能来自无产阶级下层，而党的策略总是事后对群众运动的总结，具有保守的性质。这一观点正是来自于她对德国党的策略日益僵化、缺少革故鼎新能力的不满。再如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们对党员资格问题的不同意见，也正是建基于西欧式合法斗争的经验之上。

但在本文看来，此说对于真正把握分歧的实质来说，仍然不够。马尔托夫们作为理论家，对于落后反动的俄国与西欧资本主义各国现实条件的不同，并非懵然无知。难道有谁真地相信，这些大名鼎鼎的理论家竟然不懂得在俄国不存在合法斗争条件的常识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反对列宁的政党主张呢？

回答是，在这些反对者心目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般抽象原则始终是占据首位的，任何关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的策略考虑在它们面前都要让位。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矛盾发展进程中进行的无产者阶级的事业，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个由无产阶级自己去管理的社会。而因此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就必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首创性为基础，否则将会使社会主义历史事业从根本上遭到损害。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并无错误，而且还确实具有相当的远见，但落实到当时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却无可避免地要流于无所作为。因为它是为了抽象的最高原则，宁愿置具体的有利条件（社会主义“自觉意识”及其组织载体已经具备）和不利条件（工人虽有反抗情绪但“自觉意识”匮乏；缺少合法活动条件）于不顾，一心指望“事物的客观进程”。从这点来说，以革命为最高原则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的反对者称为“组织上的机会主义者”，自有其道理。

列宁制定他的独到的建党理论,是因为他着眼于俄国专制制度条件下革命运动的残酷性和制度本身的脆弱性。首先,俄国没有西欧式的民主制可利用。如果革命家为了同一般工人群众保持联系而公开活动,组织就会经常被宪兵警察们破坏;只有尽量“缩小”组织成员的数量,使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其次,列宁充分地估计到,在俄国这个貌似强大的专制国家中,矛盾的潜伏积聚却使革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由“和平”到“暴力革命”的交替往往在旬日之间,“这种交替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非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① 那时只有一个预先组织得非常完善的革命家集团,才能有效地利用形势。

总结以上,正如李景治教授所指出的,列宁“在确定这个党的具体组织形式时,比较多的是从俄国当时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之下,无产阶级面临直接夺取政权的艰巨任务出发的”。^② 也就是说,列宁建党理论的特点在于,要求这个政党的组织结构、力量配置及其运作方式都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直接夺取政权”;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列宁为什么断然视民主制为“儿戏”。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宣布“革命利益是无产阶级的最高法律”,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宣言给列宁留下了极深印象,以致到十月革命后解散立宪会议时,列

^①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453页。

^② 李景治:《论列宁建党学说的历史地位》,《世界共运研究》1995年第1期第48页。

宁还重提普列汉诺夫当年的这一名言。^① 确实，列宁作为革命家，始终是从革命夺取政权的直接需要看问题的，这与他的反对者们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在历史上，从来都是抽象的原则必须为具体的任务让位，不论它们有多么严谨的逻辑和完整的理由。列宁的主张之所以强而有力，就在于他依据着现实并把握住了由此产生的切实政治任务。这现实就是前面一再指出的，由俄国落后的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尖锐阶级矛盾和超前发展的社会主义“自觉意识”；这任务就是，把这彼此独立的两种因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自觉意识和落后而充满革命潜能的俄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使之转换成一种提前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力量。在这一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列宁的主张已证明了是高度有效的。

(三)

在围绕组织问题的激烈争论中，迎来了激动人心的1905年俄国革命。1905年革命不仅以其广度，而且以其深度向国际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问题。这次革命的特点在于，它虽然是由沙皇统治下聚集的矛盾所引发的民主革命，其直接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但与1789年甚至1848年相比，却多出了一个全新的重大历史因素，这就是无产阶级和代表它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做些什么？怎样制定自己的任务？这一课题吸引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派别的注意力，不单俄国，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者亦如是。

^① 参见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7页。

列宁在这次革命中所提出的一整套政治策略,实际上是他的政党理论的进一步延伸。对于列宁来说,既然有了掌握社会发展未来方向、通晓历史规律,又凭藉严密纪律组织起来的革命政党,下一个理所当然的提法当然就是:这样一个政党不但不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袖手旁观,而且也不应当心甘情愿地去帮助自己未来的敌人取得对专制制度的胜利。它需要在这场按历史内容而言本不属于自己的革命中,以积极的行动为自己争得有利的地位。正是沿着这种逻辑,列宁在1905年革命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迅速实行革命转变的策略。

列宁毫无保留地承认1905年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跳过这一必然阶段而径直去搞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列宁和自己的政敌孟什维克并无分歧,都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然而这种一致只停留在对现阶段性质的抽象估计上,并不妨碍他们在制定实际任务时大异其趣。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列宁开宗明义便提出了如下问题:

“革命将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对一个战斗着的政党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西?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把革命引导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不彻底性和叛卖性?”^①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528页。

回答是肯定的。列宁认为,即使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俄国资产阶级也是不中用的。它软弱、自私、无能、不彻底,总是倾向于妥协而不是斗争;惟有无产阶级才有能力把革命推向彻底胜利。尽管现阶段革命具有明白无误的资产阶级性质,无产阶级却比资产阶级更需要革命的胜利。为什么?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①由这种判断出发,列宁对民主革命中各阶级关系、地位及其力量配置的估计便都是独特的。他认为,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也要把资产阶级当作危险的异己去“进行严格的监视”;^②要想办法孤立它,排斥它,使之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应尽一切努力使无产阶级成为运动的领导者,由它领导广大受压迫的农民去独立地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是要通过起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样一来,便出现如下情况,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这个本来的主角将成为完全不可信赖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所结成的新的联盟却要构成革命的真正推动力量。从一般逻辑看这似乎是奇怪的,普列汉诺夫便曾挖苦说这是“越俎代庖”,是让无产阶级去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列宁却有其全然不同的思路。他决不想让革命胜利之后有一个资产阶级掌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繁花盛开的长期过程。他的规划

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56页。

② 同上,第592页。

完全是集中在民主革命后尽快展开下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上：

“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①

这段话把观点说得清楚无误。列宁的“越俎代庖”，原来并不是想要替资产阶级烹调出一席民主革命的盛宴，然后再拱手把它交给资产阶级去享用，而是要由无产阶级自己在“代庖”时就准备好随后夺取这席盛宴。换句话说，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制定，完全是从它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中去考虑的。

列宁的上述策略，再次遇到强烈反对。如所周知，他的主要对手是孟什维克。

孟什维克此时已经由于许多分歧而进一步分化，派中有派。他们对待这次革命的态度，连同情他们的亚·阿谢尔也认为，是“举棋不定”，“难以说清楚”。^② 他们一忽儿主张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一忽儿又因自由派表现不出他们所希望的革命态度而提出猛烈的谴责；他们拒绝由社会民主党人自己去夺取政权，担

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93-594页。

② 亚·阿谢尔为《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一书所写的导言，中译本第9页。

心那样将会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但又提出,“假如革命扩展到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才会尽力去夺取政权,并尽可能长时期地掌握政权”。^①这种“举棋不定”反映着思想上的犹豫不决:孟什维克已经意识到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却又由于重重顾虑而难以在策略上迈出决定性步伐。因而许多孟什维克领袖(如马尔托夫)经常在激进和保守之间摇摆脚踟。

但在孟什维克思想中,毕竟有一些固定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历史阶段不可逾越的顽强信念。由于这种信念,他们对革命性质的判断与布尔什维克虽然相同,却从中引出了全然不同的策略。在他们同布尔什维克的种种分歧中,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具有决定意义。孟什维克认为,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就决不应该把资产阶级自由派排除在外,而应尽可能地推动、逼迫自由派去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应当看到,孟什维克并非像以往漫画式了解的那样一味与资产阶级调情妥协,事实上,他们经常尖锐地揭露、抨击资产阶级的怯懦、自私和反无产阶级的本性,同时他们也主张要保持无产阶级自己的独立性,甚至还谈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他们仍坚持认为这些揭露、抨击、斗争都不应把资产阶级排斥在革命之外,而仍需要有它的参与。这就是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的一大区别。

持这种主张的根本原因仍在于孟什维克的历史观念。他们确信,不论有了怎样先进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及其组织载体,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须以较高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前提的事实。一个或长或短的资产阶级统治时期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他们这

^① 1905年孟什维克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见上书第62页。

样推论：如果把资产阶级排除掉而由无产阶级去领导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胜利之后必定陷入两难处境中。要么无产阶级以少数派身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那时就会“背叛”自己的信念；要么无产阶级自己去组织政府，那时他们将面对不可能进行的任务，根本推行不下去预定要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以，避免这种困境的办法，在孟什维克看来只能是，让资产阶级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作用，无产阶级则应“分开走，一起打”，然后以极端反对派的身份出现在资产阶级宪政统治时期，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

两相对照，孟什维克的策略是“立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顺序之上，强调落后的俄国经济条件与社会主义过渡之间的巨大困难。但由此却拒绝承认革命中的新特点，甚至在有能力行动时也拒绝行动，这是为了抽象的预期理由而牺牲现在的有利机会，在政治上无异于自我否定。对他们的批评，最好让他们的同情者阿谢尔来说：

“孟什维克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们的信仰，这种品格确实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品质。但是，他们的学说有严重缺陷。孟什维克运动因此而衰落下去，终于消声匿迹。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可以在不发达的俄国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而自己不想去夺取政权，这种见解在理论上似乎有道理，但在实际上是非常不现实的。要是没有工人阶级大规模地参加的话，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那么期望无产阶级把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愿望压在心底，难道合理吗？可曾有过什么阶级为革命出了力，然后自愿退让，让别的阶级去获取革命的大部分果实？”^①

^① 亚·阿谢尔：《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导言，中译本第40页。

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则着眼于大跨度地缩短两次革命的间隔,促使历史加速迈步。这一策略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有异于以往的理论,在实施过程中的未来也确实会遇到严重困难。但是,它却是政治上高度现实的:它把现实的阶级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放在首位,力图把各种现实存在的革命力量动员起来,汇集起来,把社会跳跃式地引向社会主义。我们看到,这正符合前此俄国革命史一直努力接近的趋势。列宁策略的力量就在于此。

然而问题到此并未结束。列宁的革命转变策略是依据于俄国特定政治条件(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的组合等等)所造成的有利形势。但这还不是问题的最后答案。因为,政治形势的有利可以帮助社会主义者尽早夺得政权,但夺得政权却不能解决经济文化落后的困难。这样,问题便在于,如果专制制度倒台了,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革命民主专政”也建立起来了,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仍不具备,那时“革命民主专政”将怎样规定自己的任务呢?列宁作为一位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深知这一问题的沉甸甸的历史份量。从唯物史观出发,他决不会在对社会主义变革的物质前提确有把握之前,便贸然允许“革命民主专政”向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所以他十分谨慎地回答说:“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①但是,“革命民主专政”按其政权性质来说必然不能长久局限于资产阶级改革,更不可能去鼓励大搞资本主义,那时事情的自身逻辑必定要求尽快向社会主义转变。那时又将提出什么样的任务呢?以“先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为准则的列宁对这个未来的问题未予过多考虑。但

^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563页。

他勾画出了一个粗略的轮廓：“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① 这就是说，指望西欧来补足“我们”物质条件的不足。可是如果欧洲没有“发动起来”，那时情况又会怎样呢？在1906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上，列宁作出了一种有意思的回答。当时普列汉诺夫反对将土地收归国有的主张，担心实施这一主张会导致俄国根深蒂固的“亚细亚式”制度复辟。列宁回答说，“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②

所以，解决困难的根本途径在于“先从俄国开始，然后在西欧结束”的世界革命战略设想。否则一切都将白费。问题的核心于是归结为：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在近期是可能的吗？这需要有关西欧社会矛盾发展的专门研究才能做出回答。这一时期，列宁尚未进行这种研究，但思想发展的方向已经大致明确了：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成熟性进行论证。

三、帝国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战略

(一)

这一研究是在大战中进行的。它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直

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589页。

② 列宁在该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列宁全集》第12卷第327页。

接联系着,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又与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颇多类似,因此可以把他们两人的成果结合起来考察。^① 系统评述他们的理论并非本文的任务,这里主要关注那些与革命问题直接关联的内容。

首先,无论布哈林,无论列宁,都明确地把他们时代的资本主义当作一个世界体系去研究。在这方面,他们的出发点与罗莎·卢森堡相似,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世界性结构。^② 布哈林称“现代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③ 认为资本主义一开始按其本质就是国际性的,帝国主义只是使这一本质充分显露而已;列宁则更具体更实在地把帝国主义世界经济看作是资本发展规模超出了民族界限而形成的。但这些差别并不

① 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于1915年,但直到1918年才出版。列宁在1915年较晚时候曾读过该书手稿并写了一篇序言。列宁从1916年1月起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到1916年7月写完,1917年初出版。据此,看来斯蒂芬·科恩说布哈林的书“是布尔什维克对帝国主义的第一次系统的理论性阐述”是可信的(见他的《布哈林政治传记》,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书的影响后来无疑大大超过布哈林的书。

② 参见海恩斯:《布哈林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伦敦和悉尼1985年版第10~11页;又马健行等:《垄断资本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但这不妨碍他们在其他问题上与卢森堡有严重分歧。列宁曾说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是“胡说八道”(《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262页);布哈林则公开与卢森堡进行论战(见《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一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页。

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两个都共同“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①在这个阶段上,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它们与殖民地,落后国家之间,都已经由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紧紧地组织在一起了,以致使全球形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结构。

事实证明,这一论点在政治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把帝国主义当作一个世界整体而不是各“民族国家”的实体,意味着强调经济物质条件的世界性,意味着把唯物史观所讲的无产阶级革命物质前提由民族界限扩大到世界规模,从而只要能够确认世界范围中资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性,便可以在此基础上肯定单个国家——不管它的经济先进还是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权利。^②布尔什维克党 1917 年及其后几年的理论和实践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第二,布哈林和列宁都认定,帝国主义必不可免地导致战争灾难。

布哈林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国际性决不等同于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在于资本主义的国际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国际分工愈益使经济具有世界性;另一方面,资本家追求利润的狭隘利害关系又使资本的“民族化”趋势加强。从争夺世界市场,获取超额利润的需

① 列宁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序言,见该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 页。

② “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今后的存在问题,不过是相互斗争的各阶级的力量的对比而已”。(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 105 页)

要出发,各资本家集团日益聚集在“民族国家”周围,彼此间展开剧烈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帝国主义大战。

列宁把这一论点提得更加鲜明突出。在布哈林那里,帝国主义还只被规定为金融资本的必然政策;^① 列宁则用帝国主义这个通常用于表示扩张的政治性词汇直接称呼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这一事实表明了列宁的思想: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与扩张和战争是不可分的。列宁认为,金融资本时代使各资本主义集团瓜分世界的斗争无比加剧,当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后,实力对比的变化的矛盾便只能由重新瓜分去解决,于是斗争愈益激烈,各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军国主义化,战争乃成为必不可免的结果。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观点出发,列宁坚决反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之间尖锐的矛盾决不可能用联盟协议去解决,“超帝国主义”阶段是不可能出现的。

按英国学者安东尼·布鲁厄的意见,列宁和布哈林如此强调问题,是“把情况说过了头”。^② 此说不无道理。但是不能抹去这一强调的重大实践意义,它实际上是为论证帝国主义矛盾与社会主义革命间的直接联系提供了基础。

第三,列宁和布哈林都确信,帝国主义大战使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空前尖锐化,从而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到处成熟了。在这方面,他们两人都注意到战前很久就开始了的西欧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问题。他们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帝国主义在落后地区攫取超额利润所带来的结果,这些超额利润中的一小部分,用列宁的话说,足以收买一个“工人贵族阶层”。在他们两人看来,

① 参见《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8章。

②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这是使资本主义迟迟未能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而现在帝国主义大战所带来的空前苦难,最后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欧洲工人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中得到的几文钱,与几百万被屠杀的工人,战争吞噬的无数财富,猖狂的军国主义骇人听闻的镇压,恣意破坏生产力的暴行,高昂的生活费用和饥谨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① 同样,列宁坚称,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顶点,使改良主义丧失影响,使“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② “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然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③ 列宁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爆发。”^④

按照斯蒂芬·科恩的说法,布哈林和列宁以这种方式建立了“一个连续的、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方程式,即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⑤ 今天回头看,这个方程式显然是有些过于简单和僵硬了,但当时它却具有极大的鼓动人心的作用,它使人们对世界革命即将爆发的前景获得了信心。

①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34页。

②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687页。

③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列宁选集》第2卷第579页。

④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71页。

⑤ 《布哈林政治传记》第41页。

(二)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世界革命的思想久已有之。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世界革命理论的基础是近年来人们所说的“世界历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近代资本主义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不停地向外拓展，造就了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所有方面的联系都具有了世界性，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推动力。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②

从上述原理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具有世界性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世界性，由于相互作用所造成的事件的连锁反应，革命一旦在某处发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② 《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页。这些思想长期不为人所知（《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得很晚）。第二国际时期，人们大都习惯于“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系列的民族形态”（见前引海恩斯《布哈林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第9页）。在这种情况下，卢森堡、列宁、布哈林等人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世界性结构去理解，显然是对马、恩思想的深刻把握。

生,将可能很快从一国波及他国,汇成一种普遍的浪潮,造成世界规模的革命,使相互作用链条上的一系列国家同时走上社会主义变革之路。这就是世界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世界革命理论的要点有二:第一,由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单个国家的革命不必都等到经济高度发展时再发生;第二,但整个进展归根结底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最充分的国度的革命进程。因此马克思曾说:“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德国,但是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①

终其一生,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运用这一理论考察革命问题的。

在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化地区,问题显得比较简单。在这里,“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② 这意思不是说,革命会在某一个早上到处“同时发生”,而是说,将在相互影响下形成“同时期发生”的局面。依照这种思想,马、恩先后设想由德国、法国开始革命,在英国“结束战斗”的可能性。

非资本主义地区如发生革命,情况又会怎样呢?

事情显然复杂得多。在这类地区显然缺少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但却会发生其他类型的革命,例如农民革命,反对殖民宗主国的民族革命等等。按照相互影响的法则,它们会对欧美资

① 《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72页。

②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

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对它们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答这类问题时是相当谨慎的，例如在谈及爱尔兰、波兰、中国等处的人民运动时都是如此。但在19世纪70、80年代初考察俄国社会发展前途时，他们把问题提得比较鲜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谈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当时他们认为，俄国如果能“适时地”发生革命（他们指的是民粹派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便有可能使俄国利用其现存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并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变革的道路。但要做到这些，有一个重要条件：“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

显而易见，马、恩在落后国家的革命的问题上，远非一味机械僵硬地搬弄“经济条件”，而是提出了相当灵活的思路；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严格，坚持认为落后国家的这种“跨越”必须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补充，否则只会是有始无终的政权更替，决然达不到社会主义的变革。这是把落后国家的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统一系列中去考虑了。

这一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随着后来情况的变化，恩格斯逐渐认识到俄国和西欧都缺少革命的条件，乃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放弃了他和马克思先前的意见，转而确信俄国只能和西方一样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于是，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似乎过去了。在第二国际时期，人们都相信俄国将走与西欧一样

①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的道路,先推翻专制,随后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时期,然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1905年革命再次把问题提了出来,而且这次是以更加鲜明有力的形式提出的。革命的新特点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各种条件的彼此结合,有可能使俄国在无产阶级参与的影响下走出一条新路。问题在于,这条新路是什么?怎样保证它向社会主义发展?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思考的理论家再次求助于世界革命。

前而我们看到,列宁当时大略地提出了一个以俄国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方式去促进西欧革命,然后反转来加速自身发展的思想。但他毕竟没有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直接摆出来。托洛茨基则大胆地构建了一个“不断革命论”,以发现新的规律必然性的自信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之上。

“不断革命”的思想直接源于帕尔乌斯,^①但在托洛茨基手中大大完备和系统化了。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宣布落后的俄国能够比先进的西方更早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同时又要使这一主张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协调。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无产阶级的强大,决定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角。而因此革命就必然地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托洛茨基很清楚,俄国物质条件的落后不能够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以他辩称,掌握政权后的无产阶级为解决愈益尖锐的矛盾,必须把革命推向国际范围,“必须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也就是必须打破社

^① 有一种说法: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还借用了社会革命党人郭茨的观点。待考。参见特奥多尔·山宁:《1905—1907年的俄国,一场关键时刻的革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54页。

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向愈来愈激进的社会改革过渡，并从西欧革命寻求直接及时的支持”。^①

这样，国际革命就被提到至关重要的地位，俄国革命的命运全赖于它。于是问题的关键便归结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有及时响应俄国“信号”的确凿保证吗？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未做专门研究，他只是声明：“无可怀疑的是，在最近几年中所有欧洲国家的阶级矛盾都发展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②“欧洲的战爭必然意味着欧洲的革命。”^③

此处不拟评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但很显然，他当时对欧洲革命的希望缺少扎实的事实依据，很大程度上系出下一般性理论推测，这对“不断革命论”是一个致命缺陷。然而，列宁和布哈林在大战期间的帝国主义研究，则用大量经济资料分析论证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正在逼近的“必然性”，这样一来可以说支持了在俄国这种落后国家不必等待西欧国家“引路”，而率先在本国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主张。列宁直到1917年《四月提纲》前都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但他早已在心理上确认了这种合理性。1915年8月他写道：“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

① 《总结与展望》1919年重印本序言，见托洛茨基《不断革命》，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9页。

② 《总结与展望》，《不断革命》第72页。

③ 同上，第71页。

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① 这里所讲的,正是“互相补充”模式的世界革命。在本文看来,由这个意义上理解列宁的上述引语才是正确的。

至此,俄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也得到了证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革命条件普遍“成熟”的广阔背景上,由组织严整的政党领导,利用特殊的形势夺取政权,借以引发世界革命,用西欧成熟的“客观条件”来补充俄国不成熟的“客观条件”。这就是1917年前俄国社会主义思潮主流所达到的信念。

^① 《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554页。

|| 第四章 ||

关于俄国社会主义与 西欧社会主义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在分别考察西欧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各自的发展道路及其特点。在本章中,我们要转变一个角度,从两者的相互联系中作些分析。

一、从隔绝到汇合

在“劳动解放社”之前,西欧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虽然早有联系,但就基本精神而言,它们是彼此隔绝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前提、实现的手段和道路等问题的看法,都是大相径庭的。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从第一国际时期起,就在马克思学说的有力影响下树立了一个牢固信念: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由工人阶级自己管理的、向保证每个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迈进的社会,唯其如此,它要以高

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工人阶级数量、质量上的足够准备为前提,通过由觉悟的工人阶级大众自己推动的革命去实现。俄国社会主义(从赫尔岑以来直到民粹派)事实上所追求的却是一个植根于村社传统的、个人从属于整体的“集体主义社会”,它不但不应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前提,反而要靠避免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瘟疫的侵害才能实现。正因此,虽然俄国社会主义是对西欧社会主义的“反应”,但它们仅有形式上的类似,实质却根本不同。这种差别,反映出的正是西欧与俄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差别:西欧社会主义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进一步延续和扩大,继承了民主主义的伟大传统;而俄国社会主义却是一个农业的、富有专制主义传统的社会的产物。

这种基本精神上的差别,决定了双方是长期处在对立之中。在俄国社会主义者心目中,他们那落后的祖国,因为拥有他们所珍爱的“集体主义”精神,是要比西欧更接近社会主义的。赫尔岑曾说以文明程度高自傲的西欧应当向俄国学习,^①巴枯宁认为俄国农夫的“人民的理想”要比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理论和科学更可贵,^②就都是这种奇特的俄国优越论的体现。俄国人自己对这一套说法津津乐道,但在西欧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却纯属荒唐的胡说。没有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力的准备,哪里谈得上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长期对俄国人中流行的社会主义嗤之以鼻,对赫尔岑、巴枯宁这类深

① 参见瓦里斯基:《俄国思想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

② 见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7~148页。

受俄国青年爱戴的人物感到厌恶,就连俄国人对马克思本人著作所表现出的热情,起初也被马克思讥称为一种追逐西欧极端事物的“贪食症”。直到1875年,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还与在当时俄国革命青年中影响很大的特卡乔夫打了一场冷嘲热讽、妙趣横生的笔战。恩格斯针对特卡乔夫宣布俄国人民“比西欧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说法,挖苦地认为此人“还需要再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①

近年国内不少论者热心于谈论马克思晚年思想,认为马克思在70年代晚期改变了先前的观点,提出了一个俄国乃至一切非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都可以不经由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有人更称之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宣称它不仅可解释20世纪的东方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提供了中国当代改革的“理论源头”。^②此说十余年来影响极大,几成定论,虽偶有质疑,但至今仍保持着稳固地位。

在笔者看来,此说根本与事实不符。^③的确,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与民粹派关系密切,甚至给该派提供过直接帮助,并从理论上含蓄地支持了民粹派关于在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直接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3页。

② 据我所知,此说的较早表达可见荣剑在8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论文;后来的代表者则首推张奎良。例如参见他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马克思晚年理论上的巨大飞跃》(《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等。

③ 详见拙作《世界革命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1期)、《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并无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靠村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① 他的有关论述确与民粹派观点有不少表面上的类似,起码也可以说对民粹派有利。^② 然而,这个事实还不能证明马克思晚年发生了“转变”;至于他提出一个“东方社会理论”来为后来的东方社会主义革命作论证的事,更属于虚乌有。

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之支持民粹派,完全是从西欧立场出发,从促进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着眼的。他根据自己对1861年以来俄国社会状况的观察,深信这个国家到70年代已接近一场革命,而民粹派很可能担负起发动革命的任务。同时他又确信(和恩格斯一起),俄国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一旦发生革命,定会大大加速西欧革命的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③ 由这种估计出发,马克思利用他对东方土地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吸取融汇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主张,表示了对民粹派的有条件的支持。

马克思的观点可大致归纳如下:农村公社的内部结构包含着向公有制发展的可能性,俄国革命如果及时发生,摧垮沙皇统

① 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9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详细的三份草稿(本来共有四份)。两者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② 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于80年代后期发表后,立刻引起了俄国民粹派的“恶意的欣喜”(普列汉诺夫语),因为民粹派把该信看作是让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即“劳动解放社”成员出丑的最好证据。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直到1924年才发表,当时也曾引来民粹派后裔——社会革命党国外流亡者的一片欢呼。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4页。

治,并从西欧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便有可能使俄国避开“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公社基础上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然而,要想获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仅靠俄国人自己是不行的,必须要有西欧的社会变革为条件。对于这个核心观点,马克思并不是在给俄国革命者的信中,而是在1882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中才明白提出的,因此被时下不少人忽略了。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引用过的那一名言:“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

由此看来,俄国能否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完全取决于它能否唤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换句话说,只有西方革命的成功,才能把俄国带进“共产主义发展”的轨道,否则就是不可能的。最初发起的“信号”固然要寄望于俄国,关键的动力却仍依赖于西欧。这就是马克思晚年和恩格斯一起为俄国——其实是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所设想的发展前景,它可以称之为“互相补充”战略。读者会同意,不论这一战略怎样有利于民粹派,在实质上毕竟还是不可与民粹派主张同日而语,而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世界革命思想有内在联系的。

根据后来的发展看,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设想显然对俄国和西欧革命的可能性都作了过高估计,其实是无法实现的。俄国民粹派并不具有发起一场大革命的能力,这残酷的现实迫使人们只有把希望转向西欧。就在大约同一时期,普列汉诺夫等人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否定了俄国近期革命的前景,从而不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寄望于民粹派的主观意志,而是转向西欧社会主义的理性分析。他们在俄国社会主义和西欧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史上开辟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新时期。

普列汉诺夫等人之转向马克思主义,不仅意味着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策略问题上作重大转变,而且意味着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上作重大转变。他们是全心全意的“西欧主义者”,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规划完全移到了西欧的基地上。他们之所以反对民粹主义传统的“英雄与群氓”理论,反对特卡乔夫式的“少数人”夺取政权计划,首先就因为在他们看来,那决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至多只不过是把劳动者“从一个保护人那里转移到另一个保护人那里”。^①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要由从生活经验中意识到自己使命的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的,而不能依靠任何别人、包括“革命家”的赐予。正因此,他们囑望于西欧式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看作是社会主义到来的必由之路。民粹派眼中视为洪水猛兽、视为社会主义大敌的西欧式贸易自由和议会民主制,现在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却是应当欢迎的一大进步,因为尽管这些东西首先是“使资产阶级获利”,但对工人阶级的解放也是不可缺少的;决不能因为俄国的工业化发展有利于资产阶级而反对这一发展。^②“劳动解放社”成员批驳关于俄国历来有自己独特历史道路的理论,认为俄国与西欧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并无重大区别,只

①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05页,译文有改动。

② 参见《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一文序言》,《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卷第387页。

是发展较迟缓落后而已。因此,他们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是要拼命维护本国的“独特性”,而是要促进本国向西欧的学习,要学习西欧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经验,首先是要“效法德国共产党人的好的榜样”。^① 他们坦率地把自己的主张归纳为“欧化”,看作是对俄国近代以来“欧化”进步潮流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普列汉诺夫说,工人阶级“注定了要在我国完成彼得一世的事业:把俄国欧化的过程进行到底。但是工人阶级将给予这一事业以全新的性质”。^② 阿克雪里罗得也向工人社会主义者呼吁说:“欧洲把俄国看作是一个亚洲国家。你们负有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使俄国人民成为文明国家家族中受尊敬的一员。”^③

这整个主张,对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人来说不算陌生,借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可以把它称做“全盘西化”,不过,这是毫无顾忌的、抛弃了任何狭隘情感和实用考虑的、坚信历史进步必然性的“全盘西化”,是对西欧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经验作了透彻观察之后的理性主张。

起初,这套主张几乎无人接受,不但民粹派反对它,就连西欧社会主义者也持观望态度,因为它毕竟在当时显得太不现实了,把革命前景推得似乎也太远了。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仍持马克思晚年的观点,认为民粹派虽然理论上不

①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15页。

② 《专制主义的新辩护人或列·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烦恼》,同上书第459页。

③ 阿克雪里罗得:《致社会主义工人们的信》,载《马克思主义在俄国:1879—1906年间重要文献》,内尔·哈丁编,理查德·泰勒译,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足取,但却能够承担起摧垮沙皇统治、激发西欧革命的任务。因此在80年代中期,恩格斯大体上与民粹派和“劳动解放社”双方都保持友谊,称赞前者的理论贡献,支持后者的政治主张。这种状况持续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劳动解放社”的预见得到了证实,那时恩格斯放弃了他先前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看法,同意了“劳动解放社”的观点,确信俄国已经失去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在那里必然地经历同西欧一样的道路。^①

这样,俄国社会主义主流与西欧社会主义汇合在一起了。

二、从“仿效”回到“互相补充”

上世纪90年代,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确立了自己的基本方向,那就是向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学习,走西欧之路。如果套用后来列宁的一句话,这可以称做“仿效”战略。

在对西欧的“仿效”热潮中,德国的榜样占据着首要地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的所有地方都受到尊敬,但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这个党当时还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先进,而是一座完美的、必须仰视的高峰。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理论上无比成熟,实践上经验丰富,有严整强大的组织,有明确的近期和近期目标,所有这些都符合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理想

^① 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演变,可参见他在80—90年代给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丹尼尔逊等人的一系列书信以及1894年给《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所写的跋等处。

追求。许多年后,托洛茨基这样描写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俄国人心目中的份量:“对我们俄国人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母亲,是老师,是活的榜样,我们对它毕恭毕敬,把它理想化;我们满怀景仰之情说出倍倍尔和考茨基这两个名字。”^① 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德国社会主义对俄国人来说,差不多就等同于整个西欧社会主义。

德国人首先在理论上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有着巨大的魅力。在介绍、翻译和学习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方面,任何地方都无法与在俄国表现出来的热情相比。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外,倍倍尔、考茨基、梅林等人的著作,都在俄国广为人知,到处引用。特别是考茨基,被视为恩格斯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其著作最是受人欢迎。一般说来,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老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虽与考茨基友情甚笃,但对译介考茨基的著作尚未表现出很大热心,下一代年轻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大为不同,他们以异乎寻常的崇敬和急迫心情搜寻、译介所有能找到的考茨基的文字。1888年和1889年,《北方通报》首次刊载了考茨基关于托玛斯·莫尔的著作的俄译文。^② 自那时起,他的大部分著作相继被译成俄文,而且往往是在原版问世后不久。列宁在1894年夏曾翻译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9年在流放地曾与克鲁普斯卡娅共译考茨基的《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1899年德文版),便是其

①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84页。

② 参见莫依拉·唐纳德:《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卡尔·考茨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00—1924》,耶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中的突出例子。^①到1914年,考茨基著作的俄译本已达254种之多^②。这些著作与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一起,成为俄国革命者的必读教科书。直到1914年大战爆发前,列宁时常在自己著作中在正面意义上引用考茨基,并把他称做“俄国先进工人”的“自己的作家”。^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同样被当做典范。1899年列宁拟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新的纲领草案时,把自己的准则明确规定为“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接近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他承认,“我们决不怕说,我们是想仿效爱尔福特纲领”。^④这种看法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共有的,因为他们认为爱尔福特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最高范本,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使这一纲领的基本原理与俄国实际条件结合起来而已。在策略方面,俄国社会主义者也是时时处处以德国的经验为准,在制定策略和发生有关争论时,“倍倍尔怎样说”、“考茨基怎样说”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论据。一个尽人皆知的事例是,当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他那著名的“灌输”理论时,他是直接从考茨基的论述出发的。

对西欧,首先是对德国社会主义的“仿效”,给俄国革命思想和运动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完全可以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

① 参见莫依拉·唐纳德:《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卡尔·考茨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00—1924》,耶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② 同上,第290—303页附录。

③ 《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第220页。

④ 《我们党的纲领草案》,《列宁全集》第4卷第191页。

动是直接依靠了德国经验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这种经验为先导,落后的俄国决不会达到它在历史上实际达到的思想和运动的高度。这一点,前面已反复指出过,不须赘述。

然而,“仿效”战略却未解决一些在实施中会引起尖锐矛盾的重大问题。这一战略可概括为两个基本方面。第一,“仿效”西欧,对社会历史的进程持客观性的看法,排斥任何不以历史发展规律为依据的政治规划。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承认俄国也需要先经历像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非如此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物质条件的成熟;第二,“仿效”西欧,努力建立起成熟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通过理论宣传和政治活动,培养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借用后来卢卡奇的用语),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这两个基本方面在理论上初看是密切联系、无懈可击的,但细想起来却包含着模糊之处,运用于实践必定会向“仿效战略”自己提出挑战。

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在俄国“仿效者”与他们的西欧范本之间,毕竟存在着一段不小的历史距离。在西欧,社会主义的宣传、建党和对资产阶级统治展开自觉斗争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的阶段上。这样,西欧社会主义者能够自然地使自己争取社会主义的活动与对历史阶段的认识一致起来。而在俄国,如前所说,却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都缺少发展的阶段上便开始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在西欧那里,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阶级发展的结果,在俄国这里,却是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活动的结果。在这里,“阶级意识”先于阶级实体而发展,“主观条件”先于“客观条件”而发展。

在这样的历史差别下,俄国应当怎样仿效西欧呢?很显然,西欧的“客观条件”是无法仿效的,能仿效的只是“主观条件”。

但这样一来,如何使本来在西欧那里是相统一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协调起来,便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让“主观条件”抑制自己,等到“客观条件”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俄国也达到西欧的高度再去行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的全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活动,目的都在于“发展知识,发展人的意识”,使“人类的理性对盲目的必然性高奏凯歌”(普列汉诺夫),“促进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组织”,“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列宁)。又起双手坐待历史自己去“形成”,是与社会主义者的根本方法格格不入的。

让“主观条件”去“适应”资本主义的“客观现实”吗?或者说得更清楚点,社会主义者为了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也都该投身于资本主义活动,像民粹派揶揄“马克思派”时所说的那样,开起“小酒店”,身体力行去促进资本主义经济,以帮助自己所需要的那个“客观条件”加速到来吗?这也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者的理想不允许他把自己先变成剥削者,不管他是出于赚钱目的还是出于“历史信念”。因此俄国社会民主派也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这一选择。然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所采取的却是这一选择。他们把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必然性、阶段性信念,变成了支持资本主义的理论依据;在“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口号下,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了自由主义。因此,他们不久便与社会民主派分道扬镳了。

让“主观条件”尽可能去发展,让它一边在工人阶级中努力培养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建立社会主义的政党组织,开展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同时却又让自己自觉保持在“历史阶段”认识所限定的范围之内,这是否可行呢?事实上这正是“仿效战

略”一开始就规定的、而后来孟什维克又力主坚持的主张。但这一主张看似合理,其实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不好推行了:如果“主观条件”、“阶级意识”高度发展了并且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大影响——例如,参加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那时,能够要求它为“客观条件”不足的历史信念而限制自己吗?显然,这样的政治设计只能为少数理论家所理解,不可能为大多数阶级群众所接受。后面我们还会谈到,1917年孟什维克“社会民主派”失败的原因正在于此。

于是还剩下一种选择:把“主观条件”当做社会运动的决定性力量,用“阶级意识”去统率历史意识,也就是说,把先前视为独立客观运动的历史顺序发展纳入“阶级意识”的需要之下,由“主观条件”按照自己的理论认识去安排各发展时期中的力量配置、发展方式、过渡时间等等。历史的决定论、阶段发展论并没有被抛弃,但其内在联系却应作相应修改和扩大,以适应“主观条件”据以发挥作用的需要。在我看来,暂时撇开政治上的区别和是非对错不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均属这一类选择。列宁对“自觉性”及其政治载体——革命政党的高度强调和他的革命转变策略,其实质都在于确认,由于“主观条件”、“阶级意识”的加入,先前的历史发展方式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历史现在不能再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盲目必然性,而应当是革命政党据以达到自己理想的便捷途径了。各发展阶段仍然要经过,不能人为废除,但现在却都不再有独立的历史意义了,它们只还是达到既定理想的一个个中间站,因而应当把它们改造得尽可能有利于继续前进,以便迅速奔向理想。托洛茨基在对革命政党作用的估计和革命发展阶段的估计上都不同于列宁,但他认为俄国历史由于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便加

人了觉悟无产阶级这个因素,而注定了要在“阶级斗争的规律”支配下,打破先前的历史发展模式,越过资产阶级“形式民主”阶段,径直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在思想方法上确与布尔什维克理论颇有相近之处。^①

这样,俄国由于“主观条件”的发达,不需要把革命安排到经济发达的阶段再进行。但是,为了在进一步发展中获得“客观条件”的保证,仍然需要有西欧的参与。俄国革命必须引发西欧革命,否则就不免中途失败的思想,在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的论述中时时可见,例如:“人民起义的彻底胜利一定会把资产阶级俄国从一切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并且可能开辟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②“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③等等。托洛茨基把世界革命置于自己全部理论的中心,赋予生死攸关的意义,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兹不赘述。

然而这样一来,很明显,“仿效”战略便被完全突破了。俄国革命现在不再尾随于西欧之后,而是要以自己的主动性奋起于前,并点燃西欧革命的火焰。这可以说是重又回到了“互相补充”战略,但现在发起“信号”的已不是民粹派的秘密委员会,而

① 这在国际学术范围内早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打破禁区,真正地研究1903—1917年托洛茨基主张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关系,应当是我国学术界的一项重要课题。

② 《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0页。

③ 《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列宁全集》第12卷第142页。

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了。而且,一系列新的问题现在都提出来了,如对待自由资产阶级、对待议会民主制、对待农民的“民主要求”等等,现在都必须按大不同于西欧的方式去处理。这样,俄国社会的特殊性,重新成为思考问题的主要依据。

三、西欧看俄国社会主义

与俄国人对西欧的广泛了解相比,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革命运动的认识远为淡薄。当1889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俄国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同时出现时,说实话,西欧各国代表中很少有人能对这两派争论的问题下判断。他们只能对两派的报告人——拉甫罗夫和普列汉诺夫——都报以“暴风雨般的欢呼”和“雷鸣般的掌声”。^①然而,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运动只有成为工人运动时才能胜利,否则就永远不会胜利”的结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9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工人运动的成长又都有目共睹,因而在这之后,俄国社会民主派取得了对民粹派的优势,被接纳为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大家族中的一员,他们在理论上取得的成就是更赢得了西欧社会党人的一致尊重和称赞。但转到运动的实践方面时,情况就远非如此了。一般说来,在绝大多数西欧人眼里,俄国毕竟是个半欧半亚的、落后野蛮的专制国家,按西欧标准看,工人运动在那里是幼弱得可怜的,社会主义革命仍是远不可及的未来理想,

^① 《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123页。

并没有特别值得西欧人重视的份量。普列汉诺夫这位西欧化了的
政治流亡者,当考茨基在 90 年代约请他写关于俄国国内工人
运动的文章时,回答是“这个题目几乎没什么可写的”;^① 威廉·
李卜克内西这位有广泛国际联系的重要人物,直到 1896 年还对
俄国工人运动的能力大表怀疑,拒绝对它的罢工行动提供帮助;^②
直到 1905 年革命开始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
阿德勒还不大相信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革命能力。^③ 这些都是很
说明问题的例证。事实上,直到 1905 年之前,西欧社会主义者
大都没有意识到俄国革命的深厚潜力,只有少数曾有某种俄国
背景经历或与俄国联系较多的人,才对情况稍为了解,如考茨
基、卢森堡、帕尔乌斯等。

这样,西欧社会主义者便只能从西欧的一般经验和社会主义
的一般原理——实际上也主要是从西欧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出发,
去观察和评判俄国的运动了。

在组织策略问题上便是如此。

1903 年之后,无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派还是左派,
都不同意列宁的主张。例如极右派的海涅和极左派的卢森堡,
都认为社会民主党如把权力全部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手里,定会
导致党的官僚主义化,使社会主义原则遭到扭曲。这表现了西
欧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与民主
须臾不可分,即使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不能出于实用目的让

① 前引《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卡尔·考茨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1900—1924 年》第 3.2 页。

② 同上。

③ 参见前引,《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 176—177 页。

政党或领袖大权独揽。倍倍尔关于这个问题在 1869 年就说过：“只要一个政党承认某些个人的权威，那末，这个党就会失去民主的基础，因为信仰权威、盲目服从、个人崇拜本身就是不民主的。”^①海涅、卢森堡所依据的也正是这种精神。

但是如果按他们所建议的，屏弃列宁的主张而采取马尔托夫的主张呢？那时就不会有严密有力的俄国党，而因此也就谈不上利用俄国社会内部的革命潜力了。然而，他们的真实想法却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动摇对社会主义之民主核心的坚持；他们宁肯让党松散一些，少一些对运动的“看守”，即使是工人阶级多走一些弯路，多犯一些错误，也不同意接受“中央委员会的托管”制（卢森堡语），因为他们对这样做的后果充满了忧虑，生怕以后会制造出一个“官僚社会主义”。这种意见的动机不能说不真诚，可是他们没有考虑或不愿考虑到，如果按他们的主张办，那时让头脑里已经装着成熟的“阶级意识”的俄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干什么呢？这不等于是让“阶级意识”闲置无用吗？当历史已经造就了因的时候，能够制止果的出现么？当然，这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无法接受的。

在西欧运动中居于正统领导地位的部分人们不像海涅和卢森堡们那样极端，他们从实际经验中懂得，较严格的纪律还是必要的。考茨基这位公认的大理论权威便是如此：凭心而论，考茨基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反对松散的自治制，主张集中和纪律的，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其说接近于孟什维克，不如说较接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但他虽然在原则上倾向于列宁的组

① 倍倍尔在爱森纳赫派 1869 年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和组织章程的报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 2 卷，第 42 页。

织策略,却又认为它不适用于专制主义的俄国,而孟什维克的组织策略虽然在目前较合适,将来却很难免“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简言之,考茨基认为俄国党的两派都谈不上完全正确。更重要的是,考茨基无法理解这两派为什么就这个问题争得不亦乐乎,甚至兄弟反目,分道扬镳,因为在他看来,关键是党的理论纲领要正确,如果在纲领上一致了,组织观点上的差异怎么就不能协调一下呢?① 这里又反映出德国乃至西欧社会主义者的正统观念: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果,任何人和任何政党都不能人为地制造革命。而因此,组织松散一些或严密一些毕竟不是那么重要的。布尔什维克指责那些在组织观点上与自己不同的人为机会主义者,这在考茨基看来是荒唐的,布尔什维克为了这个非原则性问题而不惜分裂,则是对运动有害的。

也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西欧社会主义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充当俄国党内两派的调停人,徒劳无益地想让它们“统一”起来。1904年和1905年,倍倍尔、考茨基、维克多·阿德勒等人都热衷于搞这种调停。倍倍尔认为,引起争论的一切问题与俄国党面临的实际任务相比,都是不值一提的;考茨基认为俄国党内的分裂是领导人之间的个人误会造成的。② 结果他们的努力被布尔什维克拒绝了。1913年,新一轮调停开始了。这次是国际局出面充当俄国党内各派的仲裁与调解人。尽管有布尔什维克的强

① 考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和表现,详可参见前引:《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卡尔·考茨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00—1924年》第2章。

② 参见祖波克主编《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137、138页。

烈反对和抵制,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人都确信俄国党内分裂的各派并无重大分歧,因而完全应当消除分歧,统一起来。1914年7月召开了国际局倡议的“统一”会议,使这次调停达到高潮。世界大战才打断了这一进程。

归根结底,西欧社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主张,他们对布尔什维克表现出的不满和反感,都不只是策略上的不同意见,而且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终于在1917年后发展为阶级与政党、民主与专制等等问题上的尖锐对立。

在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问题上,西欧社会主义者就总体而言,对俄国新特点的感受倒是较为敏感的;尤其是1905年期间,在俄国革命造成的强烈影响下,他们中不少人力图根据新的经验,重新看待俄国革命的前景及其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相互关系。

考茨基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前面已谈到过,他早在1902年便预见到了俄国革命将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当时他在那篇著名文章《斯拉夫人和革命》中大胆地预言,由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后来居上,革命中心正在移向俄国。他还希望俄国革命能给渐入萎靡的西欧注入新的活力,使之重新振起。^①此后,他在一系列文章中不断呼吁人们关心俄国的变化,提请人们注意,这个国度将要成为新的革命的发源地。按照《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卡尔·考茨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00—1924年》一书的观点,考茨基是最早把握了1905年俄国革命性质的理论家,他在事前提出

^① 参见《火星报》第18号(1902年3月10日)。

的若干主要观点,后来都被俄国人这样那样地接受了。^① 这些观点包括:俄国比德国更接近革命;农民将站在革命一边反对沙皇;革命虽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无产阶级将发挥重大作用;俄国革命将可能引发西欧革命,等等。1905年革命期间,他根据事变进程对群众罢工、武装起义、街垒战等都作了新的分析。他在《新时代》上分两期刊载的文章《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更是提出了全新的结论:“我们正面临着旧理论解释不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如果不把俄国革命看成是一般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将其看成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把它看成是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就能极其正确地处理有关俄国革命的问题,就能很好地完成它所赋予我们的任务。”^②

这种观点无疑非常有利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因此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为这些观点而感到欢欣。列宁称考茨基“不仅善于论证和阐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并且善于以熟悉事物、认真分析实际情况的才能运用这一学说来阐明错综复杂的俄国革命问题”,认为“考茨基的所有这些论点最为光辉地论证了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一翼的策略即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③ 托洛茨基在他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大段引用考茨基1904年的话,作为支持自己的重要论据。后来即使在他

① 见前引《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卡尔·考茨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00—1924年》,第73页。

② 转引自塞缪尔·巴伦:《普列汉诺夫、国际社会主义和1905年革命》,《世界历史》1986年第2期第33页。

③ 《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4卷第220、223页。

反对考茨基时,他也说过,考茨基在1905年时期是持“不断革命”的观点的。^①

罗莎·卢森堡以她所特有的激情,也对俄国革命大声欢呼。和考茨基一样,她也认为俄国革命超出了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认为它“恰恰因为是欧洲革命中迟迟到来的落伍者,因此也是完全特殊类型的革命”。不同的是,她比考茨基更为大胆地宣布了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特点:“当前的俄国革命与所有流行的观点背道而驰,具备了迄今为止所有革命中最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② 卢森堡不满足于仅从理论上总结俄国革命的新经验,她还要求把这些新经验直接运用到德国来,运用到西欧来。她的著名小册子《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核心思想,就是重新评价总罢工,并使之成为激发西欧革命的有力武器。卢森堡的思想在1905年后日益激进,应当说与1905年革命有关。

除了卢森堡这样著名的左派人物外,其他不少立场各异的人也都程度不同地认识到俄国革命的特殊新颖之处。1906年10月,普列汉诺夫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而向国际社会主义者发起了有关俄国革命性质和策略的征询,希望以此举找到支持者。没想到在被询问者中,大部分人却作出了不符合普列汉诺夫期望的答复。例如屠拉梯(意大利社会党领袖)认为,不能说这次革命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费利(意大利)认为,这次革命是具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革命;米洛(法国)认为这场革命将不是开辟一个资产阶级统治新纪元,而是将开始一个“迅速导致无产阶级解放的

① 参见《托洛茨基言论》,三联1977年版第142~143、178页。

② 《俄国革命》,《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社会斗争”的新时期,王德威尔得则称这次革命“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更深地打上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烙印”。^①总之,这些人都表示出了认真考虑俄国革命新特点的愿望。

然而,如若以为这些人都是俄国革命的真正理解者和坚定支持者,则又大谬不然。毋宁说,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在一种“错觉”中产生的一时激情。而引发这种激情的,一是俄国 1905 年革命的宏大规模和深度给人的深刻印象,二是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沉闷状态所造成的反应。这些西欧人以为俄国革命是会沿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即沿着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发展的,在这一限度内,他们能够对这一革命大声喝采,但一旦发现情况与他们的理想不符,而是沿着“专政”的方向发展时,他们便会反对这一革命。上述几位除卢森堡外,在 1917 年后大都是俄国革命的反对者。考茨基也由 1905 年期间俄国革命的大胆预言家,转而成为俄国革命的头号批判者。后来他承认自己在 1905 年时错了,当时对俄国革命的强烈和持续程度估计过高,因而也对于它对西方所能产生的影响估计过高了。^②

四、俄国看西欧社会主义

前面已经说过,俄国社会主义者对西欧社会主义、特别是德

① 转引自塞缪尔·巴伦:《普列汉诺夫、国际社会主义和 1905 年革命》,《世界历史》1986 年第 2 期第 33 页。

②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三联书店 1973 年版第 24 页。

国社会主义有极大的尊敬,而且总的说来,把这种尊敬一直保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然而,随着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出现派别分化,对西欧的态度也就开始出现变化了。孟什维克一派的策略基本仍坚持对西欧的“仿效”,布尔什维克则日益走出“仿效”战略,力图从他们对俄国社会特殊性的理解中制定新的战略。这使得他们逐渐从对西欧的全面追随,走到用批评的眼光对待西欧了。

首先,俄国革命者对西欧运动的革命性的信任渐渐动摇了。他们感到在革命的理论 and 宣传下面,改良主义潜流正在西欧不断扩大。其实早在19世纪90年代,侨居西欧的老一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就已接触到这个不祥的事实。1898年2月12日,普列汉诺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承认,伯恩斯坦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许多改良主义者的说法不幸是对的。^①20世纪开始后,俄国的革命浪潮正在来临,相形之下,西欧运动的平静郁闷,让充满激昂精神的俄国革命者更加不快。尤其是,当他们带着对西欧革命的理想化印象观察西欧时,见到的实际情况简直让他们大为吃惊。克鲁普斯卡娅描写过她在慕尼黑目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五一节游行,那情景是如此令人失望:“带着老婆、孩子,衣袋里装着萝卜,沉默地、以很快的步伐穿过了城市,——到郊外的一个餐厅去喝啤酒”。她和列宁当时都努力“抑制那种不由自主地产生的失望心情:我们本来想参加的是战斗性的游行,而不是警察许可的游行。”^②更不可思议的是,

① 参见前引《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卡尔·考茨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00—1924年》一书第11页。

②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页。

英国社会民主党人集会的内容竟是向上帝祈祷：“主啊！请把我们
从资本主义王国引到社会主义王国去吧！”^① 面对这种情景，
托洛茨基说他“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②

其次，对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大人物的尊敬，现在也开始
褪色了。托洛茨基曾叙述他第二次流亡西欧时对德、奥社会
民主党头面人物的感受。他觉得那些人虽然学识渊博、富有教
养，写得出“漂亮的马克思主义文章”，但在气质上却根本不是革
命者，而是充满保守气和庸俗化的“与革命者格格不入的人”。
在列宁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不算多的个人交往中，那些
人给他的印象也不美妙。1910年他同倍倍尔、考茨基的会面都
远不是友好的。^③

列宁对于西欧党对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宽容态度，显
然也很不满。我们知道，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和政治分
歧，不论怎样尖锐，但人们都视之为党内理所当然的现象，不应导
致组织上的分裂。尽管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同“修正主义派”的
斗争激烈异常，但很少有人想到要把伯恩斯坦或福尔马尔们开除
出党。这一态度在俄国革命者看来，却愈益成为影响党的战斗力
的重要祸根。列宁后来写道，“战前对社会主义的内部斗争有两
种不同的理论”，一种是“考茨基、马尔托夫和大多数机会主义者”
的看法，认为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是“一个阶级一个运动中合乎
情理的两派，是不可或缺的两翼”，另一种是“布尔什维克看的

①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59页。

② 前引《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125页。

③ 参见路易斯·费希尔：《神奇的传人——列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9年版第116页。

法”，认为在非革命的形势下，可以作为权宜之计同改良主义者暂时搞点合作，但一旦斗争尖锐，便应同他们决裂或分裂。^①

在列宁的著作中，在1905年之前，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批评很少，相反，在正式场合，他不止一次驳斥过那种认为西欧运动正在改良主义化的看法。然而在1905年后，列宁逐渐开始有节制地批评西欧社会主义了。1907年，他宣布：“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还想帮助俄国社会党人担当起工人运动当前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② 这同以前相比显然表明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为了让俄国“担当起工人运动当前的任务”是要仿效西欧，现在则是要批评西欧了。

我们知道，在1912年前，列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沙文主义倾向作过批评，对倍倍尔、考茨基的某些策略主张作过批评，但总的看来，态度还是比较克制和友好的。他在1910年卢森堡与考茨基争论时甚至希望这两人之间的分歧不要扩大，而应“就此和解”。^③ 但到1912年初时他已谈到德国党内“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分歧日益表面化，党内沸腾了。那里迫切需要当机立断。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④ 这种认识与在俄国党的资金代管问题、“统一”问题等方面与德国党领袖们的争执交织在一起，使得列宁在大战前最

① 《在下房里》，《列宁全集》第37卷第136～137页。

② 《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16卷第18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5卷第358页。

④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7页。

后几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失望。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导致了彻底决裂。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竞相转到“保卫祖国”的立场上,赞助本国政府进行战争。俄国布尔什维克则高举着“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旗帜,对西欧“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背叛自己的信念”的行为展开了猛烈批判。剧裂的分化、尖锐的思想斗争,构成了以后多年中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

|| 第五章 ||

大分野：革命在俄国和西欧

西欧社会主义与俄国社会主义沿着不同的方向演进，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中分化为泾渭分明的两条道路，从而完成了整个第二国际时期一直在酝酿着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性分野。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个具有总结意义的时期。

一、革命在俄国

(一)

1917年俄国革命是本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最富争议的事件之一。这个资本主义发展严重不足，专制统治和农奴制残余相当强大的国度，短短几个月内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变，被一下子带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发展时期，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复杂错综，如美国学者

古尔德纳所说,它是“有关一个大问题的小发问”。^①

前面我们已分析过布尔什维克为革命所作的长期的组织的、策略的和战略的准备。但问题还在于,是什么条件使布尔什维克运用这些准备,在1917年一下子就得到了政权呢?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主观”转到“客观”,对当时俄国的特殊社会需要和由这种需要所推动起来的特定社会心理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1917年的俄国局势是人所共知的:持续了几年的大战带来深重的社会灾难。俄国的落后使它受到比别国更大的摧残。1500万劳动力被送上前线屠宰场,600万人死伤或被俘;近1/4的富庶土地落入敌手,失去土地沦为难民者以百万计;工业、农业和运输几近崩溃,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物价以惊人程度升腾……这种对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巨大破坏使俄国除摆脱战争之外别无他途,而因此就只能诉诸革命。二月革命前人民各个阶层的革命情绪是如此高涨,形势是如此紧迫,以致十分了解政局内情的统治阶层部分成员比革命者更准确地预言了革命。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曾向沙皇提出,不出三个星期将会爆发革命,“革命已经无可避免”。^②结果两个星期后革命来临了。

二月革命是从下层民众到资产阶级甚至部分贵族合力参加的一次自发革命,其根本推动力来自人民对和平的强烈要求。

① A·古尔德纳:《两种马克思主义》,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4页。

② 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原书名《革命领导者们(руководители)目睹的1917年革命》),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页。

但是二月革命的胜利并未完成结束战争,给人民以和平(后来又加上土地和面包)这个头等社会任务。^①因而革命就不顾任何政治派别的主观愿望而必然地继续下去,直到完成它的使命为止。^②这个最简单的事实是理解整个1917年俄国事件进程的根本依据和最高裁判。纵观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政治风云变幻,可以说,这是一部各政治派别轮流走上前台,在这个特殊社会需要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接受社会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多幕剧。其中扮演了主角的是三支政治力量:资产阶级自由派、“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派”和布尔什维克。

应当承认,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二月革命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列宁曾把它称作共同打击沙皇制度的两种力量之一。^③但作为沙皇的反对派,它的目的恰恰是要把沙皇已打不下去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并防止发生社会革命。这个派别的核心人物米留可夫证实:“他们开始准备把政变引人平稳的轨道,他们宁愿接受自上而下的政变,而不希望发生由下而上的革命。”^④所以他们在取得政权后,一方面空口许诺许多改革而实际上拖延时日不予兑现,另一方面照会协约国表白继续打仗的决心不变,就都不是偶然的。德·阿宁认为,立宪民主党和临时政府之迁延改革

① 美国学者约翰·汤普森认为,在引发二月革命四个因素中,只有一个因素得到了解决,其余三个首因为使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的原因。见他所著《1917年的革命俄国》,纽约1981年版第10页。

② 站在自由派立场上的米留可夫后来也看到了这点。参见他的《苏俄革命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页。

③ 参见《远方来信》,《列宁选集》第3卷第4页。

④ 《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第58页。

“原地踏步”，“与其说是受阶级利己主义的驱使，不如说是领导人缺乏经验和教条主义的结果”^①，这是相当肤浅的见解。因为同一个阿宁自己也看到，“自由主义者”推迟召开立宪会议，不愿实行民主和土地改革等等，是由于担心社会主义者占据多数和削弱前线的战争，而这正好是“受阶级利己主义的驱使”，即受与英法协约国在经济、政治上利益相关并本能地敌视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影响。这种阶级私利决定了它既不可能满足1917年俄国的紧迫社会需要，也不可能完成本该由它去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化改革。它很快就陷入孤立并迅速被淘汰掉，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各派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派”，应当承认，其领导人物多是一些忠于自己政治理论信念的革命家。他们在二月革命后的好几个月中对群众的影响大过布尔什维克，因而占据了苏维埃领导地位。但正是这批个人品格无可指摘的人物居然在完全有能力把政权拿到手的情况下自觉地退居后位，甘愿扮演资产阶级政府的批评者的角色，其原因不在别的，正在于他们很早以前就形成的理论信条。这种信条他们在1905年革命中已经再三宣讲过，现在又再次讲出来了。普列汉诺夫说：“我们社会主义者确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框内会容纳不下现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那时候资本主义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社会主义。但是对于俄国说来，这是比较遥远的事情。现在的俄国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苦于它的不够发展，像我们不止一次重复过的那样。”^②

^① 《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第60页。

^② 《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79页。

这在抽象意义上是严谨精确的历史理论,但是应用于1917年的俄国却变成了无人理睬的空洞教条。它没有从实际的政治形势出发抓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阶级利己主义的驱使”已难以担当结束战争、带来和平的任务这个极平常的事实,以致违悖了群众的普遍激昂情绪,陷入了极大的政治被动之中。从上述信条出发,孟什维克活动家们的策略是,首先“把政权奉送给阶级敌人”,逼迫他们去进行社会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以“保证民主派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战胜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评论说,这种策略“是一种微妙的辩证学说”,“但是,这种理论对于事件的进程根本没有任何意义”。^①其结果只是使这些头脑严谨固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客观上正好站到了当时社会任务的对立面、不能成为积极的推动力量。

马尔托夫一派(即孟什维克中的“国际主义派”)不能满足于这种过于僵硬的立场,他们随着局势发展而日趋左转,甚至提出要建立“革命民主主义”政府来代替已丧失治国能力的资产阶级,以便实施人民要求的改革。但该派仍难于从观念上突破既定的信条,所以马尔托夫在提出上述主张后连忙表示说,他们并不想要让革命“跳越资产阶级轨道”。^②而这在1917年秋季同布尔什维克的主张相比,也已不能为群众所接受了。孟什维克如此,社会革命党人的命运也并不更好些。该党在当时拥有百万之众,但却缺少一个首尾一致、逻辑严密的纲领。他们本来的宗旨应当决定他们大力为农民获得土地而斗争,但对战争的态度

① 《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第174页。

② 参见J·布尔班克:《知识分子与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却促使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宗旨。结果在日益尖锐的内部分歧中发生了分裂,使该党更加不能独立发挥政治作用。

归根结底,“苏维埃民主派”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完全为自己的抽象历史观念所累,难以切实考虑当下的人民需要。这是书斋学者式的远见,不是从事政治斗争的政党策略。结果便出现如下尴尬的局面:工人群众渴望让他们这些社会主义者掌权,甚至朝他们怒骂:“掌权吧,狗日的,给你权你就掌。”^①这些人不是伸出手去,却是退缩躲闪,惊惶莫名!连一位孟什维克的后裔和同情者都讥笑这种可悲的策略,尖锐地评论说:“孟什维克证明了无力使用这一革命潜力于任何实际目的。”^②到了这种地步,还能指望“社会主义民主派”们受到群众的拥戴吗?

布尔什维克这些“多数者”实际上长期是少数派。直到二月革命期间,他们的基本主张仍然没有得到广大工人、士兵的接受。在俄国当时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上,无产阶级革命确实似乎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因此二月革命后的最初时期,在彼得格勒负责领导工作的加米涅夫、斯大林、穆拉诺夫等人采取的立场迟疑不定,首鼠两端。加米涅夫要求公开给临时政府以支持,斯大林主张中立,但也认为当政府“满足工人和革命农民的要求时,给以支持”。^③他们的观点其实同孟什维克大同小异,甚至考虑

① 前引阿谢尔编《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中央党校1985年版第25页。

② 维拉·勃洛依多:《列宁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英国高维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4页。

③ 参见E. H. 卡尔:《1917—1923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8年重印版第76页。

过要同孟什维克合并。

当列宁自国外归来提出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纲”时，他不仅遭到从立宪民主党到孟什维克的攻击，而且也遇到自己队伍中大多数人的怀疑乃至反对。“许多人觉得伊里奇(列宁)把问题提得太尖锐了，把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提得太早了”。^① 在有些人看来，列宁现在突然改变了1905年以来的一贯策略。其实他们没能看出，“四月提纲”的基本要点已经包含在1905年策略中了。那时讲的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现在讲的是“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国的共和国”。^② 提法不同，精神则一。当然也有区别，这就是，1905年时，“革命民主专政”的未来性质提得尚不明确，而现在，由于大战以来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加强了世界革命会很快爆发的信心，“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便跃然而出了。尽管列宁自己仍声明，“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③ 但这只不过是策略性的声明而已。因此当时他的同志和敌人都立刻看出了他的真实意图，而对那句话毫不关心。

列宁之所以敢于力排众议坚持己见，除了对世界革命的坚定信念外，还因为他不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抽象认识出发，而是从生动可感的当下形势和任务出发，清楚地估计到了社会需要和群众心理，并把握了无论资产阶级自由派，无论

①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9页。

②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四月提纲)，《列宁选集》第3卷第15页。

③ 同上，第16页。

“社会主义民主派”都不可能适应这种需要和心理的事实。列宁说：“我们现在是少数，群众还不信任我们，我们要善于等待。一旦政府暴露出本来面目，群众就会转到我们这一边来。”^①事态的发展表明他是正确的。在几个月前还对社会主义缺少基本认识的大批工人、士兵以至农民，一旦以切身经验感到其他派别都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和平、土地和面包时，便迅速地转到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旗帜下面，本来看上去极其遥远的夺取政权的目的迅速地接近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平定后，布尔什维克已争取到了两个首都和军队的大多数群众，8月和9月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一跃而居首位。达到了这一步，剩下的就是起义发动的决心和时间、地点、力量配置等技术性问题了。10月10日的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解决了起义决心问题，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则解决了各种技术细节，于是一场令世界震撼的革命，竟是以“换防”式的轻松完成的。

（二）

所以问题不在于1917年俄国所达到的经济水平有多高，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是否充实，而在于由战争这个巨大灾难所造成的特殊社会需要和心理指向，在于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力量的互相对比，使得一场革命被极大地被提前了，我们已经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1917年的特殊环境中不能不暂居后位，以最现实的手段迅速打破当下生产力所受到的巨大障碍被提到首要的日程，能提供这种手段的方案便是最优方案，不

①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所做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5页。

论它在进一步实施中会有怎样的“不相适应的毛病”(列宁语)。谁提出这种方案,谁就获得人民拥戴支持和把历史引向自己目标的权利。约翰·里德说:“布尔什维克代表了工人、士兵和农民那种纯真而简单的愿望,并且据此来制定他们当前的纲领。”^①这可说是以一个记者的敏锐直观地抓住了十月革命成功的秘诀。

然而,1917年的俄国之所以一方面具备了一经生活教育和思想引导便迅速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广大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具备了敢于夺取政权的领导力量,则又不能满足于简单用战争的破坏来解释。它们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长期历史准备的结果。前者是早期资本主义阶级矛盾尖锐的产物,后者是俄国社会思想运动演进的结晶。1917年俄国政治令人头晕目眩的突飞猛进,不过是使这两个必要条件在特殊形势下迅速结合的历史面已,这种结合使得俄国不可能再等待资本主义的自然成熟,而是“抢先”打断其进程,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

夺取政权只是开始,真正展开社会主义的全面变革,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这条道路上,立刻就感受到了俄国的经济文化落后所造成的层层困难。公开敌人的威胁还在其次,无产阶级数量的微小及其管理能力的不足;传统小农经济及其观念的严重存在;专制主义、农奴制残余在大众心理中的浓厚沉积;社会主义运动中各个政治派别的尖锐分歧……逼迫着布尔什维克把它的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不断推广加强,于是并未出现从《共产党宣言》到《国家与革命》所预言的国家的迅速消亡,而是出现苏维埃国家机器的高度强化。解散立宪会议,取缔反对党派,布

^① 《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页。

尔什维克独掌政权,党内实行高度集中,取消自由讨论等等,在那些严酷岁月的尖锐政治斗争中虽然带来过暂时的好处,但它怎样才能导向先前预定的理想目标,却仍旧是一个复杂问题。

解决这一切症结的手段何在?布尔什维克的既定计划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世界革命。当时无论托洛茨基,无论布哈林,无论列宁,还有在远方密切关注着俄国革命的罗莎·卢森堡^①……几乎所有左派理论家提供的答案都是如此。^②列宁后来谈道:“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③但是列宁同时也看到了任务的艰巨性:“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④

的确如此。西欧革命的进展,远非俄国革命那样顺畅流利。

① “……这种国际行动是一个基本条件。如果缺乏它,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哪怕具有最伟大的才能和作出最崇高的牺牲,也不可避免要陷入一团混乱的矛盾和错误之中。”(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② 斯大林这时似已对世界革命不甚关心,而更关心“东方”了。他的《不要忘记东方》,《光明来自东方》等文便可部分说明问题,两文均收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

③ 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所做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列宁全集》第42卷第40页。

④ 在俄共(布)七大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第439页。

二、革命在西欧

(一)

在西欧，大战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俄国革命也确实唤起了广泛的同情。这两者加在一起，推动着大批下层劳动者的情绪急剧左转，形成了普遍的不满和愤懑情绪。在一片民怨沸腾中，政府不断遭到谴责，各种集会、罢工、抗议直至兵变此起彼伏，给社会带来极大动荡，可以说，对资本主义形成了 20 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大冲击。

然而，这里终究没有走上俄国式的道路，其原因远比我们现在通行的解释复杂，至今仍然值得认真研究。

先看战胜国。

这里的群众运动不像战败国那样高涨，但也相当可观。在法国，1918—1919 年出现多次罢工，1919 年 4—6 月，巴黎出现好几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达数十万人，同军警、骑兵发生了激烈冲突。1921 年，铁路工人发动了有 100 万人参加的大罢工，要求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早日从国外撤军。1917 年塞松的兵变和 1919 年黑海舰队的哗变，则直接支援了俄国革命。工人中自发的高昂情绪也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运动，促使其迅速激进化。列诺得尔为首的社会党多数派支持战争的政策受到了有力挑战。1917 年 11 月，社会党代表大会决定召回它在政府中的代表；1918 年 7 月，总委员会提出了对列诺得尔政策的谴责，并通过决议要求政府接受苏俄宣布的和平目标，停止对苏俄的干涉；大会还要求党的议员投票反对军事预算。

在英国,1918年和1919年都爆发了人数众多的罢工,并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英国工人表现出对苏俄革命的深深同情。在独立工党、工联、社会党等组织的参与下组织了声援俄国革命的集会,人们称颂俄国革命是“迄今为止被剥夺继承权的阶级掌握政权”,甚至决定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①在1918年2月召开的伦敦非常代表会议上,工党通过的党章宣布以实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新社会制度为目标。^②

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意味着革命。尽管多数工人和社会党人对苏俄革命表现出明显同情,但他们并无步俄国后尘去推翻本国资本统治的愿望。他们从一般人到领导者,大都对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感兴趣甚至畏惧,宁愿满足于以抗议活动迫使政府去实行改革措施。而且他们在这方而确实取得了成效,因此也就仍然认为改良方式才是真正有效的。这种心情在法国工会领导人梅尔黑姆的一段话里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同志们,不论是什么情感促使你们采取了行动,请掌握并深入了解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两者之间的区别。前者可以通过起义,通过暴力获得成功,因为在一次政治革命中,由一个政党的成员取代执掌国家政权的另一个政党的成员就行了。可是,这样做并没有使任何事情得到真正的改变,而经济剥削的特权却仍继续存在。……但是,(另一种革命)却不能仅仅通过暴力

① 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② 同上,第131页。

而加以实现,因为必须改变社会环境,必须稳定经济生活。”^①

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决不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所希望的那种状态。它决定了工人的抗议活动在取得若干成效后,便会自然地在政府的安抚和压力下趋于低落。季诺维也夫后来在共产国际五大上也看到了这点。他说,当时西欧“群众中自发的不满很强烈,而我们把它当成了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力量。但是我们错了”。^②然而对西欧的真实状况的进一步的探索,却是季诺维也夫既未进行也未意识到的。

(二)

战败国情况又怎样呢?

在这里,确实发生了若干次革命。这里通常保留着较浓厚的贵族封建残余,加上战争失败所引起的军事崩溃、经济崩溃、政治混乱、民族危机,使得革命的冲击远比在英法等国来得强劲。

1918年1月,奥地利首先对俄国革命做出了反应。当时维也纳举行了大规模罢工和群众集会,要求同苏俄缔结不割地不索赔的和平。社会民主党发表声明,号召拒绝“对俄国进行战争”。这次行动还感染了奥匈帝国舰队,水兵们发动哗变,选出了水兵代表苏维埃。结果,这些行动都在政府军队的压力和社

① 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317页。

② 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页。

会民主党的决定下中止了。^① 奥地利的事件却马上在德国造成连锁反应。1月的最后几天,从柏林开始,罢工波及到好几个重要城市,工人们成立了不受工会控制的工厂代表组织。保守的社会民主党右派恐怕运动被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更激进的“斯巴达克派”控制,而勉强出来领导了罢工。这次发动很快就被政府压了下去,但却“为一场革命制造了心理上的前提”。奥地利和德国的1月行动大大坚定了正在热切盼望着西欧工人阶级支援的俄国革命者们的信心。列宁当时预言:“我们很快就不会孤军作战了,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一定会加强我们这支军队。”^②

这种盼望没有落空,它由1918年11月的德国革命和1919年匈牙利革命得到了证实。但充满希望的开始却是以悲惨的结局告终的。德国革命推翻了德皇统治,使这个国家变成了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把政治进程向前推了一步;但它并未象俄国那样由二月革命发展到十月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又是失败的。1919年3月的匈牙利革命则是在民族命运存亡继绝的关头,由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接管政权,但不久同样归于失败。历史发展的结果与预期大不相同,对俄国革命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世界革命战略蒙受了决定性的打击。今天,对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必须予以重新研究,特别是德国革命以其在世界革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值得认真分析。

①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担心行动会导致德国军队的大举入侵,使“奥地利变成战场”。见前引《国际史》,第118页。

② 《在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1页。

当布劳恩塔尔认为,德国革命的起源与俄国革命的起源全然不同,“不是无产阶级群众性起义的结果”,而是“由革命的死敌引出来的”时,他是既片面又肤浅的。德国1918年革命与俄国1917年革命在起因上十分相似,都是由战争的破坏和统治者的残暴引发的,也就是说,都是“由革命的死敌引出来的”,同时,又都是“无产阶级群众性起义的结果”。德国经济实力远胜过俄国,但好几年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它接近衰竭。所不同的是,1918年的德国尚能勉强支撑危局,尚未出现前方的全线崩溃和后方的大面积饥馑而已。但这一切是在一般人民不了解形势险恶的情况下维持的。鲁登道夫将军的下台(1918年9月)是一个信号,它和随后成立的马克斯亲王政府之进退无度、举措失当一起,正如俄国二月革命前拉斯普廷被刺一样,表明上层也已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革命形势在迅速成熟。11月初基尔港水兵拒绝出海作战并发动起义,并非偶然。在控制最严密且生活待遇较优厚的海军中出现暴动,此举完全突破了德国人固有的严格服从的传统,可见矛盾积累之深。所有这些,同二月革命时的俄国并无二致。

毫无疑问,这都是以德国工人及一般劳动大众情绪的革命化为前提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破坏了一般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食品、煤以及其他必需品的短缺、通货膨胀、工作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加大等等因素,推动了工人中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一方面促进了革命工厂代表组织的发展,同时又在斯

巴达克派这样的社会主义左派的政治主张中得到了表达。^①这两种力量构成了十一月革命的重要动力,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他们的逼迫下,保守的社会民主党才不得不勉强出来领导革命,并宣布共和国成立的。

但往后的发展便与俄国二月革命之后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工人和士兵不仅不再允许专制帝制存在,而且对取而代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深具敌意,因而一遇到举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旗帜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便“山鸣谷应,风起云涌”,很快团结到布尔什维克周围。在德国,当斯巴达克派力图把革命引向更高阶段时,却遇到难以克服的层层障碍。最关键的是,工会工人中的多数并没有要把革命一直进行到社会主义的愿望,他们实际上希望的是尽快建立议会民主制,恢复经济,保证工人阶级在合法活动中争得自己的权益。这一事实可以部分地从1919年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结果中看出。当时代表右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得11509048票,代表中派和部分左派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仅得2317290票。^②

在这种条件下,左派要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努力无疑困难重重,同样条件对于抱定相反目的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却是极其有利的。

右派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是十分丑恶的。它不

① 参见戴维·莫尔根:《社会主义左派和德国革命,1917—1922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史》,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5页以下。

② 参见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写:《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卷第47页。

但不希望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对推翻君主制的民主革命也感到畏惧。艾伯特这个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的领袖,竟然可以对本应是自己敌人的马克斯亲王表白:“我决不想要革命,我对它深恶痛绝。”^①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想尽办法制止革命。先是派诺斯克去安抚平息基尔水兵起义,继而又想把事变引到君主立宪轨道上去;最后当谢德曼不得已喊出了“德意志共和国万岁”时,艾伯特还对他大发雷霆:“你没有权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变成什么样子,是变成共和国还是变成别的什么,这要由国民会议决定。”^②而共和国刚一成立,这些人便马上致力于遏制革命的继续发展了。在他们看来,真正可怕的不是充满保皇情绪的反动军官,而是斯巴达克派这些“狂热分子”。诺斯克就对谢德曼说,他“宁肯要即使在今天也毫不隐瞒自己忠君思想的军官,而不要以共和派自诩的军官”。^③于是一当他们认定社会主义左派破坏了“安定和秩序”时,他们便毫不踌躇地利用军官们对自己先前的同志大开杀戒。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外,它们是社会民主党极右翼改良主义立场的合逻辑的结果:他们宁择君主立宪而反对革命,正是要维护“安定和秩序”,好让他们有机会去制定其社会福利措施。

然而问题在于,如此狰狞的行为,如果在1917年夏秋的俄国,早就该被群情激奋的工人和士兵一扫而光了,在德国却能安然地大行其道,则表现了某种深刻的社会差别。德国社会民主

① 参见曹长盛主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② 《国际史》第2卷第144页。

③ 同上,第151页。

党长期的改良主义实践，对工人群众——首先是工会会员——的影响太深重了，他们信赖这一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实践及其领导力量，即使到了革命时期，他们仍然乐于听从其指挥。当诺斯克带着“压倒革命红旗”的任务奔赴基尔港时，水兵们听从了他，还选他为苏维埃主席；当艾伯特主张“全体社会主义者的统一”，以维持“安定和秩序”时，士兵们支持了他；而当卡尔·李卜克内西指斥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背叛”时，却遭到了许多士兵的反对。^①所有这些，都表明社会民主党拥有多数工人群众及其他下层劳动者的支持。

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有多种声音的混合体，内部有各种派别和各种倾向。仅看它的主要领袖的名单就可以了解其色彩的含混了：伯恩斯坦、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希法亭、迪特曼、“斯巴达克”派（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蔡特金等）等等。他们带着不同理论、不同宗旨加入同一党，例如考茨基之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纯属勉强；^② 斯巴达克派之加入这个党则以保持自己独立性为条件。因此，独立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个各派栖身的公共团体。它的温和派固然反对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露骨背叛，但对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也没有兴趣。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作为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策抗议者而不是左派革命政策的支持者出现的。当他们与艾伯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组织政府时，它无法在关键问题上抑制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当他们从政府中辞职以示抗议时，却又把权力留给了右派们。他

① 参见前引曹长盛主编《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51页。

② 见前引莫尔根《社会主义左派和德国革命》第60页。

们中有的领导人有时可以相当激进(如累德堡曾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一起领导1919年1月的柏林举事),但总起来看,他们并不愿用苏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

斯巴达克派—德国共产党人是激进的革命派,但也是少数派。他们认为11月革命仅是德国革命的开始,而下一步的任务是把革命推向更高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他们要做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已经做过的事。但是,他们从未取得过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工人、农民、士兵们中取得的那种支持。早在1918年10月,斯巴达克联盟就号召工人和士兵成立苏维埃,夺取政权,但却未能引起任何反响,甚至革命工厂代表委员会也以多数票否决了李卜克内西关于起义的提议。^①11月革命后,斯巴达克派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单独组建共产党,固然是摆脱了中派的掣肘,但另一方面也更加势孤力单了,正因此,罗莎·卢森堡就曾不同意马上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她的明智意见却被多数人否决了。

然而,德国共产党人似乎仍有成功的机会。按照兰道尔的观点,由于1918年1月5日那时柏林政府力量单薄,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如果具有列宁、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气,是能够发动起义者拿下总理府的。但他们却缩手缩脚,把时间耗在讨论中,以致失去了拿到政权的良机,反而让诺斯克的国防军打了回来。^②此说似有些道理。但试设想,柏林起义即使成功,就能像彼得格勒的起义者那样登高一呼举国响应么?德国的国防军能够像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那样倒戈么?恐怕只能

① 参见前引《国际史》第141页。

② 参见前引《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卷第1070~1071页。

说,很难。再者,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这些坚强的革命领袖们怎么会如此迟疑不决呢?关键在于他们对革命道路的看法仍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大不相同。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些俄国革命的领袖们对暴力夺取政权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对捕捉有利时机极为敏锐,不怕为此在后来付出重大牺牲。而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却要夺取政权的前因后果反复思忖,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考虑在多数人未能支持他们时夺取政权的不利后果。卢森堡在德共成立大会上说过:“推翻官方中央权力而代之以另外的几十个人,那是不够的。认为只需推翻政府和通过命令推行社会主义,那是毫无头脑的人的想法。”^①可以认为,是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深思熟虑影响了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行动。而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最激进一翼也不打算完全按俄国方式组织革命。

综上所述,尽管有了与俄国1917年大致相同的政治境况,但社会的一般心理、力量配置都不利于一举夺取政权。其结果便是,德国革命恰好是循着与俄国革命相反的方向行进。俄国革命是沿上升路线突进,在每一个阶段之初曾担任主角的派别,总是很快在形势逼迫下向比它更激进的派别求助,以致自己不久就被驱赶下台了。这样的进程一直达到顶点,迎来了震撼人心的十月二十五日起义。而在德国革命中,却是沿着下降轨道,革命浪潮由高而低,终于平息。克伦斯基在1917年8月为抵御反动军官而不得不求助于布尔什维克,艾伯特在1919年1月为抵御斯巴达克派而不得不求助于反动军官,这一极富启示的对比,正显示了两国革命命运的不同。

^① 前引《国际史》第147页。

(三)

总结西欧的动荡和革命,从政治层面看,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政策确实对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无怪乎共产国际对西欧社会民主党大表愤怒,无怪乎多少年后,美共领导人福斯特在他那本有名的《三个国际的历史》中犹以愤慨的笔调写道:“如果不是右派社会民主党的罪大恶极的叛逆行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个东欧和中欧也都会被摧毁。”^① 这种观点自有其道理。然而从历史研究出发,愤怒却不能代替分析。“右派社会民主党的罪大恶极的叛逆行为”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畅行无阻,不能不认为与工人阶级中普遍的情绪有关。工人群众之所以在危机到来时未能有所作为,又与他们在长期改良实践中形成的心理定势密切相关,而培养这种心理定势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结底在于葛兰西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坚强的结构”。

笔者一篇旧作中的一段话,似仍站得住脚,可为总结:

“尽管有周期性的动荡,包括第一次大战之后和 1929—1933 年的大动荡,但这个‘坚强的结构’却不会马上土崩瓦解。它的重要功效之一就是通过平时的自我调节使工人阶级的意识不能相应地上升到革命的高度,以致动荡破坏的结果总是导致资本主义秩序的重建。从今天的高度去审视以往的历史,如果不想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恐怕就很难说资本主义中心地区至今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原因仅是资产阶级的‘老奸巨猾’的欺骗收买和机会主义的叛卖等等,在所谓‘主观条件不具备’的背后,更深刻的是‘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它使得这片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先

^① 《三个国际的历史》,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81 页。

进地区反而难以真正运用这个人类的伟大思想成果,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迈进。”^①

三、从分化到对立

(一)

以 1917 年革命及其后的一连串反应为契机,俄国社会主义和西欧社会主义在思想、政策、道路规划上的分歧暴露无遗,它们在两个不同地区的运动之间划了一条深深的鸿沟,造成了彼此间深刻的对立和最终分裂。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从世界革命理论出发,坚信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甚至已经“熟透了”;西欧应当步俄国后尘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一个“决战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革命之所以在西欧仍未发生,决定性原因在于“主观条件”不具备;也就是说,在西欧,少了俄国式的革命政党却多了“叛卖”性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政党,它们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工人阶级甚至屠戮革命。因此,“要取得斗争的胜利,一个先决条件是,不仅要同资本的公开走狗和绞杀共产主义革命的刽子手右翼社会民主党决裂,而且要同在危急关头背叛无产阶级而讨好无产阶级公开敌人的‘中派’(考茨基分子)决裂”。^②

^① 拙作:《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国际共运史研究》第7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② 《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页。

这种认识支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革命领袖们的思想和行动，全力以赴摧毁西欧改良主义政党，建立革命的“主观条件”，便成为所有战略任务中最紧迫的任务。

完成这一任务的实际步骤是：

1)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切地方发现、支持和培植左派力量，鼓动他们从先前的第二国际组织中分裂出来，组建自己的政党。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深信，机会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正在失去影响，新的革命政党只要建立起来并把“这群资产阶级走狗”(共产国际一大“关于对伯尔尼会议的态度决议”语)驱逐出去，“主观条件”便会迅速成熟。

2)成立一个统一的“世界革命党”来促进、推动、有时是直接组织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便抓住有利的、有时是转瞬即逝的时机，发动革命。这个任务是如此紧急，以致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从召集到召开，只用了极短时间。尽管第一次代表大会缺少广泛的代表性，尽管遇到了德国共产党人的反对，共产国际还是宣布成立了。

3)在共产国际中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以严密的组织纪律来防止改良主义的侵入。这本是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著作中为俄国政党规定的原则，现在认为应该扩大到国际范围了。共产国际应当完全不同于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应当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保证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各国支部绝对服从莫斯科执委会的统一机构，它要能够确保共产国际执委会从纲领、路线、策略到组织成员都实行对各国运动的无条件领导。从“二十一条”开始的一系列措施、规定，都旨在使这些要求不断加强。

4)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领袖

们”，认为他们已不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错误思潮的问题，而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专门从事诽谤和中伤共产主义的告密者”（季诺维也夫语），是最危险的敌人，而“中派”又是比“右派”更为阴险的死敌。因此所有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的政策完全决裂”，^① 必须无条件地把希法亭、屠拉梯、考茨基等一批领袖们开除出去。在俄国革命的领袖们看来，这些机会主义领袖已经在工人中没有影响，如果说他们也赶来向共产国际表示同情时，那只是表示他们走投无路了。因此不但不能向他们伸出手去欢迎，而且要用尖锐的语言把他们赶走，用季诺维也夫的话说，“必须给共产国际的大门上锁，必须牢牢地、把守共产国际的大门”。^②

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都是极左的，缺少实际依据的，给共产国际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影响。它们反映出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缺少了解，反映出对那里工人阶级所受改良主义影响的程度严重估计不足。克劳丁评论说，这些主张“是根据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公式推想出来的，而不是对实际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的结论。因此，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在内容是抽象的，在政治和思想方面是无效的”。^③ 这些话虽然尖锐，却不能说全无道理。

另一方面，西欧社会主义的主流则对俄国革命经验持怀疑

① 《二十一条》（《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51页。

② 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第76页。

③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46页。

和否定态度。

几十年的议会活动实践使西欧社会主义深深地浸润在合法主义情绪中,本能地拒斥俄国式的革命道路。按照多数西欧社会主义者的看法,俄国革命是由少数人夺取政权,以暴力手段强制地把社会主义加给人民。考茨基毫不踌躇地对此表示深恶痛绝,不遗余力地大加谴责,视之为布尔什维克的荒唐举动;奥托·鲍威尔为代表的一批人态度相对温和,他们有条件地承认这种方式在俄国环境中的某种可理解性,但认为在西欧是绝对不能采用的。西欧“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应当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稳步地、逐渐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①

在民主与专政问题上,西欧理论家们对俄国革命抱更尖锐的敌视态度。他们确信社会主义与民主须臾不可分离,而民主始终意味着给不同政派、不同言论以保证,意味着确立一套互相制约的制度。俄国革命抛开这一套“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实施布尔什维克专政,在他们看来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不过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最好不过也只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专政”(鲍威尔语)。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伯恩斯坦、考茨基、鲍威尔这样一些人持如是观,就连热烈捍卫俄国革命声誉的左派思想家罗莎·卢森堡也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策”投以疑虑和批评。卢森堡虽然对俄国革命的种种做法表示谅解,但却认为“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仅仅有“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的状况殊难接受。她断言这

^① 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5页。

种状况如得不到纠正,便“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①

怎样判断俄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发展方向?这又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卢森堡盛赞俄国革命,但大多数西欧理论家们持不同观点。考茨基属于俄国革命的激烈否定者之列,他讥称这一革命是“一个怀孕的妇女为了缩短她所不堪忍受的妊娠期,竟然极其愚蠢地剧烈运动,以致早产”。^② 鲍威尔有所不同,他“想摸索一种既要攻击但又要稍微称赞布尔什维主义的办法”,^③ 这就是,承认苏俄革命建立了一种社会主义,但“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一个专制的社会主义”。^④ 它是历史进步中一个不可少的阶段,但它决不是高于、而只是低于西欧发展的一种过渡形态。这种批评无疑比考茨基的批评更精巧,大概正因为如此,列宁才认为鲍威尔是更坏的机会主义者。

在那个充满血与火的生死搏斗的年代里,“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具有压倒意义。由此着眼,考茨基、鲍威尔们的言论确实导致对俄国革命的伤害,从逻辑上说最终会取消革命。因为他们指出的种种缺陷都是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产物,要避免它们,唯一的办法便只有根本放弃夺取政权的念头。在这个意义上,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领袖向他们表示了极大的愤怒,是能够理解的。

今天我们可以从一个更高的历史角度对双方的分歧和对立

① 《论俄国革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9页。

②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4页。

③ 拉贝兹编:《修正主义》文集,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8页。

④ 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7页。

作出评价。当年双方都把自己视为真理的体现而对方只是一团谬误，今天却不难看出双方都有合理处而又都失之片面。从火热的斗争形势出发，俄国布尔什维克抓住了阶级斗争与政权斗争这一核心课题，因而坚持了革命立场，但却夸大俄国经验的适用性，忽视西方历史和社会的不同特点，以为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之未能走上与他们同样的道路，仅仅是由于少数领袖的背叛投靠。他们由此制定的国际策略便具有极大的盲目性，运用于西欧便难免碰壁。西欧社会主义者却大都以抽象的一般理论（多是从西欧历史中总结出的）为立足点，未能把握俄国革命的特殊意义。因而他们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唯意志论”之类的责难，无法影响实际的政治进程，却足以使自己落到可悲的境地。他们之间的差别和分歧，其实正是各自所依靠的不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差别的反映，是不自觉地通过了自身所处环境条件的三棱镜折射。也正因此，他们的观点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启发，但不能成为唯一的参照系。

（二）

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中，西欧改良主义一方大体上是处于守势，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一方则以咄咄之势大举进攻，力图把自己的阵地扩大到西欧去。西欧改良主义势力自然也不会坐视不顾，势必要报之以反击。在这一斗争中形成三种势力：共产国际、伯尔尼国际和居中扮演折衷调停角色的维也纳国际。它们分别对应于先前第二国际内的左右中三派，是这三派长期分歧的结果。

我们没有必要详细叙述这场斗争。我们只围绕一个问题再作点分析：这三派势力尽管政见分歧、各执一端，但还有可能在

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实行某种合作吗？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它们终于未能合作而分道扬镳，是无可避免的呢，还是出于某些偶然情况？

在伯尔尼国际和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双方的对立异常激烈，所使用的指责语言也都尖利无比。在1919年2月的伯尔尼国际会议上，虽然没有直接攻击苏俄革命，但由布兰亭起草，多数人通过的一项决议称：“一种专政……如果仅仅以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为基础，那么，这种专政就更加危险。这种政权的必然后果是，由于内战而使工人阶级的力量陷于瘫痪。最后必然会出现反动的专政。”^①一个月后的共产国际一大，则针锋相对、毫不客气地称伯尔尼为“一群工贼的黄色国际”，“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已”。^②伯尔尼国际认为支持正在同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是自己的责任，对苏俄政府取缔和囚禁这些派别人物的政策反应强烈，并要求派代表团在俄国实地调查。苏俄共产党和政府则针锋相对，称该代表团是“经威尔逊和克列孟梭恩准前来”的“社会投降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党”的“钦差大臣”，并发动国内工厂、机关和学校表示“全体苏维埃人民的愤慨”。^③共产国际一方不断猛烈谴责西欧的“工贼们”阻挠工人起来革命，伯尔尼国际一方则反唇相讥，说尽管在英国要发动工人罢工非常困难，但“如果在英国实行列宁的那种专

① 前引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卷第1041页。

②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0页。

③ 参见C.A.莫吉列夫斯基：《第二国际的复活（1919—1923年）——革命高潮时期国际改良主义中心的历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91页。

政,那么全体工人都会起来罢工的”。^①如此等等。在这种气氛中,合作是谈不上的。

在20年代初开始的新的形势下,倒是出现过某种有利于联合的契机。当时,经过几年的战争,苏俄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的干涉颠覆,获得了内战的胜利,但国内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预计早应爆发的欧洲革命的前景也日见暗淡了。在这种情势下,共产国际开始了某些政策调整。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随后不久又提出了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策略,表示愿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于是在第二半国际的斡旋下,三个国际开始了谈判。

但是,从共产国际方面说,统一战线仍只是暂时的策略转变,并非战略的彻底改变。托洛茨基在三大上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才感到我们并不是很接近最终目标,即接近在世界范围内夺取政权,接近世界革命的。以前在1919年,我们认为这不过是几个月的问题,而现在我们说这可能是几年的问题。”^②于是,谈判便只是这“几年”间的权宜之计,是与改良主义国际“争夺工人群众”的一种手段;拉狄克干脆直接了当地说,谈判是为了让对手“在我们的拥抱中活活憋死”。^③从伯尔尼国际方面说,不但民主问题,格鲁吉亚问题等等都是横在它与其共产国际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更重要的,它根本不信任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主张。在这种情况下,联合是预定了毫无结果的。

① 前引布劳恩考尔《国际史》第189页。

② 参见前引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47页。

③ 参见前引布劳恩考尔《国际史》第299页。

众所周知,1922年4月在柏林召开的三个国际执委会代表会议,终于只是一次唇枪舌剑的激烈争锋。中派的“第二半国际”看来倒是在那里认真调停,但其余两方都毫不掩饰对对方的敌视。他们都分别代表了各自地区几十年历史发展积累起来的深厚经验,对对方的评判都无法超出自己的经验范围。柯尔说得对,他们之间的鸿沟太宽,无法弥合。^①

随着柏林会议的结束,一个漫长的从分化到对立的时期终结了。开始了东方共产主义运动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两大潮流的对峙与冲突。

^① 参见 G.D.H. 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26页。

|| 第六章 ||

两大运动各自的发展

此后七十年间两大运动的发展演变,不论怎样起伏跌宕,都是本文前面各章所述线索的进一步展开。现在,让我们对这个过程作个简单回顾。

一 从社会民主主义到“社会的民主主义”

自从与共产主义运动分道扬镳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总的趋势是,沿着合法主义、改良主义的方向迈进,逐渐与资本主义社会一体化,成为西方多党政治框架中的一支主要政治力量。总结这一过程,可以大致辨认出几个发展阶段。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可算做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操作都已占据主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仍未泯灭;也就是说,改良主义虽取得了统治,但尚未获得与之完全相适应的理论形态,因而仍尽可能从马克思主义

学说中寻求支持。两者纷然杂陈,混合一处,形成了运动的突出特点。

1923年5月在汉堡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聚集了先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中派和右派。目睹了世界大战的连天炮火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血火搏斗之后,他们现在从内心深处已基本放弃了用暴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念头,而决心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通过程序民主的手段,去逐渐达到自己的目标了。争取选票,参加政府,上台执政,以便有节制地逐步实现国有化,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缓慢地接近社会主义,成了他们的新战略。因而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中,“务实”而不是革命的宣传鼓动,已占了主要地位。现在关心的,是如何拿出能令选民信服的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案,如何克服战后的大量困难,走出经济危机,促使国家复兴,缓和民族对立,改善工人处境,提高社会福利,应付紧张的国际局势,呼吁和平,等等。曾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领导工作的布劳恩塔尔承认:“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实际上是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国际。”^①

然而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的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影响仍相当强大。阶级意识在社会党人中仍较浓厚,执掌运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也还是战前那些属于“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理论家,如考茨基、鲍维尔、希法亭等。他们尽管都已认可并推动了运动的改良主义趋向,但他们的理论修养和思想方式,仍促使他们本能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风格去说话。这样,改良主义的整个战略和政策,现在仍被置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上,其目标也仍然被规定为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历史的

^① 《国际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页。

必然性。这种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奇妙结合,体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各种纲领、文件和理论著作中。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也仍能回忆起昔日的传统,喊出激进的革命声音来,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 1934 年布拉格宣言(主要出自希法亭之手)便是突出的一例。

两次大战之间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确获得了不少成功。例如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进步,北欧福利制度的初步确立、令世人羡慕不置的“红色维也纳”等等,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努力的结果。但是这些成就在那个动荡年代好像沙上筑塔,一遇上突如其来的风暴,便不免要立刻坍塌。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在一夜间便使社会党人数十年的奋斗化为乌有。社会民主党人遭受了痛苦的大挫折。

第二个阶段始于 50 年代。这一时期,与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相伴随,资本主义制度开始了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成为主要的选择。这给社会党人提供了大好的施展机会。五、六十年代是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得意时期。正如众所周知的,他们几乎在所有主要西欧国家中都有执政甚至长期执政的经历,即使作为在野党也在国内政坛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使得他们得以在国家生活中全面、系统、长期地实施自己的改良主义政策。尽管各国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具体政策措施不同,但推行国有化和某种计划性,通过国家干预调节经济生活,协调劳资关系,扩大就业,实行“三高政策”,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从摇篮到坟墓”包下来的福利体系,则是共同的做法。我们当然不会同意把这些都叫做社会主义,但西欧资本主义正是在社会民主党人手上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发展成为某种“社会资本主

义”，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全面的社会改良主义行动，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全面思想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短期的徘徊和纷争，各社会民主党最终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告别，以1951年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声明为突出标志，确定了一套新的理论和价值体系。这套体系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非意识形态化或多元化。即是说，自觉地远离明确的世界观和社会政治学说，奉行实用原则。只要符合社会民主党的自由民主互助精神，不论是基督教原则、人道主义还是古典哲学，均可兼收并蓄，面不再以某一种特殊的哲学—政治理论为指导思想。用勃兰特的话说就是，“我们不需要去谋求某种封闭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靠不住的庇护”。^①第二，伦理主义。我们前面已看到，这一倾向早在伯恩斯坦那里已发端，中经二、三十年代亨利·德曼等人的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面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从社会党国际著名的法兰克福声明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歌德斯堡纲领，都贯彻了伦理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现在被理解为是正义的而不是科学的，最终从马克思学说所讲的历史必然性移到了道德、伦理的基地上。如果说马克思本人仍受到某种尊重，那也是首先把他伦理主义化，看作一位追求人类正义理想的思想家的结果。第三，自由主义化。社会党人现在高度突出社会主义与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联系，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界定为对自由主义的更进一步的、彻底的发展。诚然，马克思本人也曾指出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思想在历史上的联系，例如他曾有过近代历

^① 勃兰特、克默斯基、帕尔梅：《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史是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深刻预言,他也把民主(实际上他主张的是直接民主)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但在马克思那里,更强调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理论基础上的质的区别。而在社会党人这里,突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意味着从人本主义出发,认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天赋人权、议会民主,而抛弃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自己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正因此,5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比以前更多地称作民主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已认同了现存的社会。那么,他们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岂不毫无二致了吗?不,还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社会党人仍然强调自己在理想和未来目标上同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之间寻求一种“第三条道路”,其使命仍是通过稳步改革最终改变而不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欧罗夫·帕尔梅关于这一点说道:“确切地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改变社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阐明民主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什么。假如我们不能成功,我们的社会就会失去唯一可能的政治选择,而向保守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①布鲁诺·克赖斯基在回答“维护体制与变革体制之间的界线在那里”时说道:社会民主主义“是一场高标准的改良运动”。^②那么,“高标准”高在那里呢?就在于,他认为逐步的改良会量转化为质,接近未来的目标。这表明,社会党人仍然企图作为社会的革新力量出现。

① 《社会民主与未来》第 11 页。

② 同上,第 42 页。

然而问题在于，当“高标准的改良运动”发展到影响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本身时，又该怎么办呢？而这样的时刻在70年代经济危机时似乎确实来到了。从那时起，福利政策遇到了困难。其结果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进退失措和80年代新保守主义的全面得势。社会民主党纷纷下台，沦为在野党。这不仅仅是党派政治意义上的失败，而且是一场社会运动思想上的危机。这场危机到90年代前期达到了顶点，那时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势力乘苏东大崩溃之机威胁着要连民主社会主义也一起拔除。

最近几年的事态发展显示出民主社会主义已进入第三个阶段的迹象。90年代中期，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神奇般地东山再起，纷纷竞选获胜，或单独上台执政，或与其他党派联合组阁。事实表明社会民主党并未像右翼势力所预言的那样已经衰亡，而是仍然有着相当强的生命力。但这里面的意味很值得分析。关键在于，这并非昔日民主社会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历史条件变化而前又经历了一次蜕皮的结果。尽管各国具体表现不同，但目前的各社会民主党，总的看来，是在思想方面作了一次较大的手术，其内容是，进一步削弱自身的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放弃国有化主张，抹去早已大大褪色了的阶级政党标记，以更具自由主义特点的中间形象出现，力求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框架中保持自身地位和获得新的发展。无论是英国工党放弃党章第四条，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要求改民主社会主义为“社会的民主主义”的呼声，都标志着从先前虽然温和，但毕竟还主张对现有社会实行改造的立场更加后退，无论在行动上和语言上都完全放弃变革理想，只关注于当下的社会问题、以完全的政治实用主义为要义。老实说，到了这一步，社会民主党与其他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政党的区别就已经微乎其微

了。它们都同样要迎合选民的心态,提出适应性的竞选策略,制定和实施几无差别的国内外政策,以换取它们作为政坛势力的短期成功。如果说还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只有这样一条:社会党人仍力图维持中间稍为偏左的立场,在承认新自由主义政策合理性的基础上留住一点先前民主社会主义的回忆。其典型化表现——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虽经人们尽力渲染,终究也只是头脑灵活、长于机变的新一代政客的政党策略而已。这样看来,当前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上的卷土重来,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以他们在思想上的退却为代价的。新实用主义吞噬着传统的“基本价值”,这就是当前和今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甚至使该运动的一些理论头脑也感到忧虑。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霍斯特·海曼就呼吁不要放弃理论,而要把“改良社会主义的理论进一步发扬光大”。^①然而如何既在现有政党活动框架中保持势力影响,又使先前的理论传统得以赓续,今后仍旧是一个不易解决的困难。

总的看来,社会民主主义从 20 年代到今天,在努力改造革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逐渐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改造和同化了。这是一个很难争辩的事实。可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它又确实使资本主义得到了某种改造。70 年代时顾准曾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生命力、原因在于它自身能够不断批判—改良,但这批判改良最终却会让它一点一点灭亡掉。^②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是否能起到黑格尔所

① 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58 页。

② 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2 页。

说的不自觉的“手段和工具”的作用呢？

二 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

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们刚刚取得政权时，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计划，因为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之上。他们确信，如果没有尽快使西方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他们在本国开始的事业便将失去立足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促成共产国际的成立，不惜用最大的牺牲去推动西欧革命的爆发。然而，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坚韧适应性和西欧工人阶级深厚改良主义情绪的估计都大大偏低，所作的展望都是盲目乐观的。这一失误的后果是严重的：几年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各国重趋稳定，世界革命战略推行不下去了。苏俄共和国不得不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孤立地设法自己摸索着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意味着，苏俄走上了一条艰难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先前未曾预料到的种种困难都出来了。首先是生产力的极度落后。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制度要以高度发达雄厚的物质生产力为前提，“穷过渡”只会导致失败。苏俄面对这个尖锐矛盾，怎么办？列宁的对策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加速发展生产力，以补上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不足。大见成效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个思路上的。然而还有另一个更具威胁的问题，那就是文化的落后。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大工业和近代民主制度的训练熏陶，在俄国普遍存在着专制主义和农奴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愚昧盲从，政治权力

至上,公民意识匮乏。总之一句话,建设社会主义所需的现代国民素质严重不足。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内要克服重重阻力贯彻自己的意图,对外要对付国际资产阶级的层层封锁,布尔什维克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严厉的纪律了。内战期间,党和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不断加强,以前被认为是党员正当权利的自由争论和派别活动现在都一一被禁止了,尽管当时还只被看作是暂时的应急之策而非正常制度。^①党和国家的权力现在逐渐集中到一个人数不多的革命领袖集团手中。

这种做法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的确是现实有效的。除此之外,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但是它们所显示的方向,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设想。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们中的一部分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列宁本人也非常清楚这条道路所隐含的潜在危险。因此他虽然亲手强化了党和国家的集中制,驳斥了“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反对派的意见,但他在晚年病中却对由此产生的种种弊病和丑恶现象表现出深恶痛绝,并尽一切可能想出克服的办法。然而制度的车轮一旦转动开来便很难制止,加上列宁过早逝世,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纠正。

列宁去世后,经过一连串尖锐的党内斗争,斯大林赢得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斯大林为首的一派,在思想上以“一国社会主义胜利”论为指导,在体制上则无可阻挡地走向更高程度的集中制。这两种倾向滥觞于此前的时期,但富有理论修养的列宁

^① 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颁布这些禁令时,总是附有特别的声明:一旦紧张局势缓和,禁令将立即解除。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提出了著名的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但理由是“这是当前局势的政治结论”,因为派别争论“现在不是时候”。

并未认可，斯大林却把它们变成了社会主义的不容置疑的基本原则，赋予了普遍的、绝对的意义。它们在塑造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则根本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凭心而论，“一国社会主义”论在世界革命战略成功无望的情况下，把人们的希望和信心由外向而内敛，转移到“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上面来，在当时自有其实用的积极意义。但从理论上说，它却并无多少深刻性可言。因为它把理论上早已明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客观物质条件，更换成了政权、政策等这样一些主观的保证。这就等于是宣布：物质条件是不重要的，我相信它能建成，它就一定能建成！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一切便归结为领导层的方针、政策和引导方向是否正确了。在斯大林战胜了布哈林，独揽大权之后，一切便归结为斯大林本人的品质、经验和决策能力了。

已经被人们谈论过很多的“斯大林模式”，其根本特点是什么呢？至今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在我看来，它的核心是在于，用强有力的领袖“托管”（用罗莎·卢森堡的话来说）代替了马克思一直主张的工人阶级自己管理自己的原则。从理论上说，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工人阶级现在已是社会的主人了，但并没有给他们民主自决的权利，于是在现实中，他们的命运和前途却要由代表他们的国家和领袖个人去决定。领袖谦逊自律，则可能意见畅通，领袖乖戾，便导致言路壅塞，人人自危；领袖英明则政治清明、人民幸福，领袖一旦出“昏招”，国家便立时出现大乱，整个国家生活现在都围绕着领袖个人转动。社会主义的领袖代替了“秘鲁的‘太阳之子’”——从反民粹派时的普列汉诺夫到1918年时的罗莎·卢森堡所担心的情况，现在确乎成了事实。

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大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从历史而不是从原则出发,便应承认它毕竟也还是一种社会主义。它与俄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文化条件直接相关,是来自西欧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块土地上几经演变的结果。布哈林在1922年曾预言,由于落后,俄国的社会主义将必然地“具有亚细亚的形式”。^①此说是那一时代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们不怕承认最严酷事实的坦诚品格的表现,今天看来,是多么深刻而富有历史感!

按照卢森堡在1918年所指出的“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斯大林的专制体制的确引起了“公共生活的野蛮化”。从全盘农业集体化到30年代骇人听闻的大清洗,淘掉了老布尔什维克的精华,也重重地打击了旧日的革命理想主义。一批钻营利禄者补充到了各级领导岗位上。这种状况甚至引起了墨索里尼的惊呼: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已经消失!^②

但另一方面,斯大林“以野蛮战胜野蛮”,强制性地推动了工业化。苏联人民依靠自己的艰苦努力,付出了沉重代价,使苏联在不长的时期里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瞩目的工业和军事大国。这就为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一种积极的条件,使得斯大林模式本身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斯大林一去世,新的时期便开始了。

赫鲁晓夫以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揭开了“非斯大林化”的帷幕。就个人动机来说,赫鲁晓夫此举是真诚的,是希望以揭露斯大林时期的严重错误来伸张正义,使党和国家生活回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② 参见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党治制的由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到正统列宁主义轨道上来。赫鲁晓夫时期的许多改革也带有类似的性质。但无论他个人的经历修养和他所处的环境条件,都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脱离斯大林体制。他只能反对这一体制的果而不是因,只能用一种开明的、较为宽松温和的形式代替旧形式,而对体制本身未加根本触动。尽管如此,赫鲁晓夫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下层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要求把改革进一步深化,他的同僚们却指责他打开了危险的闸门,其后果不堪设想。

勃烈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后,虽也试验过改革,但总的看来,是以维持原有的体制为要义。在他当政期间,苏联在世界政治事务和军备竞赛中可与美国相抗衡,但社会却沿着惯性向前滑动,润滑剂愈益干枯,效率大大降低,社会管理权操于因循守旧的干部和技术官僚之手,特权现象严重,颟顸之风日盛。在领导者中既缺少对现今世界特点的敏锐感受,又丧失了对昔日意识形态理想的真诚追求。先前的理想和信念,无论在上层和下层都日益淡漠,政治宣传成为无意义的说教。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享乐情绪、实用主义和恢复起来的复古主义、斯拉夫主义。由于没有发表言论的正常渠道,持不同政见者的“地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成为抨击时弊、针砭世事的受欢迎的声音。当局所采取的对策是封锁、监视、开除公职、监禁和驱逐,但结果,只不过是给受害者加上了殉道者的圣光而已。随着矛盾的积累,改革变得愈来愈困难,而拒绝和拖延改革又使社会愈益经不起改革。

在这样一种表面陈陈相因、内里危机四伏的状态中,戈尔巴乔夫最后登场了。戈尔巴乔夫属于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起初就他的本意来说,是想通过改革医治苏联

社会的沉疴，以诉诸民主的方式革故鼎新，使苏联走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怪圈，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成为体现出公正和效率的真正现代化的社会。从理论上说，这些都不为错，但从现实来说，在这个几十年来早已靠自上而下的控制而不是民主自治来维持的社会里突然倡导民主，便必然使先前潜伏的矛盾公开化和激化，引起混乱，直至动摇社会的根基。改革和“公开性”很快反转来对准了倡导者自己。这时，戈尔巴乔夫既不愿知难而退，又无法循序渐进，便只有在潮流中被动地跟着走，最终使苏联和他自己一起失败。事实表明，“苏联模式”具有极强的封闭性，缺少自我更新的能力，如不首先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政治准备，骤然实行转轨，便极可能导致制度本身的倾覆。

苏联的历史经验，无论兴衰成败，都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以巨大影响。在历史上，苏联社会主义曾以耀眼的光芒使人向往，到后来，怎样摆脱苏联模式的羁绊却成为各国共产党人的重大课题。“欧洲共产主义”、南斯拉夫自治道路和中国 70 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其中几种重要的方式。前两种虽已成历史的过去，但其中包含着颇可思索的启发性经验，中国的改革开放目前方兴未艾，已取得不少成功，但仍有大量问题有待解决。

总括以上，社会民主主义突出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特性，但却不能有效地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由布尔什维主义发展出来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以革命否定了资本主义，却未能成功地解决自身进一步发展中的问题。我们追溯历史，正是为了温故知新，总结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

|| 结束语 ||

几点看法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似可对本世纪初西欧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的分化及其往后发展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这一分化,确实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预测。无论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欧之未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贫弱的俄国之“提前”出现社会主义革命,都确实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始料未及。历史同理论相比,似乎走了一条全然相反的道路。应当承认这一事实并在此基础上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就是说,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方法应用于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自身的矛盾。^①

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它所处时代的产儿,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也不例外。19世纪资本主义是尚处于早期阶段的资本主义,

^① 科尔施早就提出了这一任务。尽管我对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持不赞成态度,但应承认他提出问题的功绩。参见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以下。

社会组织的不完备、社会自调节能力的薄弱,使这一社会形态的固有弊病以缺少控制的、尖锐的形式凸现出来,从而为马恩这样的天才人物剖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提供了可能。依据当时的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结构及其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他们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参照系,敏锐地把握了该社会形态由于内在缺陷而无法满足高度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的趋势,从而预言资本主义必将达到自己的极限,为更高的社会形态所替代。这一立足于资本主义少年时期所做的出色病理分析,由于深入触到了资本主义肌理中的痼疾,即使在资本主义进入成年时期体质大大增强的情况下,也仍能在主要之点上保持其说服力。

但另一方面,同样是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现实,使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和预测又不能不受到局限。当时资本主义脆弱而缺少弹性的结构与正在大步向前的大工业之间的尖锐冲突使他们把这一形态的灭亡看作一个十分迫近的过程,至于资本主义后来表现出来的适应能力,则相对被忽略了。与此相适应,他们对工人阶级发展程度的估计也显然超前。当时他们曾估计工人阶级由于资本主义矛盾的逼迫而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地起来推翻现存社会,并在客观必然性作用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一种确信工人阶级将能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是深刻的,但事实上当时工人阶级并未成熟到能够解放自己的程度。马、恩在世时目睹的一系列工人起义,从西里西亚纺织工举事直到巴黎公社起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深受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压榨

之苦的工人自发“对抗工业主义力量的一种防卫性行动”^① 恩格斯在晚年看到,这些革命客观上都是不会成功的。^② 因而早期工人的反抗未能把历史引导向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以自己的一次次失败,逼迫资产阶级充当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促使社会向一个更高的成熟阶段迈步”。^③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工人反抗的相互作用下,两个世纪之交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来到了。如本文第一章所指出的,这次革命的伟大作用之一,在于把世界真正联为一体,使历史完成了向世界史过渡的过程。它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的活动场所由先前狭小的西欧一隅扩大到了世界,从此不论是工业发达国家还是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国家,甚至前工业化国家,都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但进入“世界历史”中的各不同地区的社会组织结构的特点以及它们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使社会主义借以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条件必然彼此相异,甚至大相径庭。这便是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随着发展不可抗拒地走向多样化的客观根源。20 世纪初西欧社会主义与俄国社会主义的分化乃是这一多样化的最初表现。如本文在前而从各种角度所讲述的,西欧资本主义进入成熟时期后,依靠其大大加强了自调节、自控制、自修复机制,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展开活动的条

① 参见库马,《社会的剧变——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台湾志文出版社版第 173 页。

② 参见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③ 拙作:《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 年第 4 期第 11 页。见本文附录。

件。工人阶级心理的变化,改良主义的滋生蔓延,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与理论基础所遇到的种种复杂困难,以及最后当资本主义的震荡期到来时革命由于缺少“主观力量”而搁浅……所有这些,固然是通过大量“主观的”意识和活动而表现出来,但其根源却深藏于资本主义客观条件的变化之中。与此同时,地处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俄国由于尚处于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都相当尖锐时,却遇到了由“世界历史”所传播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而走上了跨越式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俄国资本主义的不成熟使革命具有双重特点。第一,工人阶级的政治素养、文化素养和阶级组织程度都远逊于西欧,缺少西欧工会工人那样的独立性,但却具有西欧工人所不及的自发反抗情绪,这使他们很容易接受革命政党的领导而成为“批判的武器”所需要的“物质力量”。第二,在阶级力量不成熟的条件下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必定使人数不多的、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大大高于它所代表的阶级的政党的意义凸现出来,从而形成一种由“革命家集团”为核心指挥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夺取政权的革命。这一道路从19世纪观点看来固然是“奇怪的路”(列宁语),但同西欧道路一样深具历史的必然依据。

总之,本文前述欧洲社会主义的地区性分化归根结底是世界历史整体客观运动与不同地区社会组织特点交互作用的结果。从表面上看,现实的历史似乎存心用自己的“错位”与理论预测开玩笑,然而更深入的观察指明,这种“错位”本身也是经济和历史运动的产物,因而仍然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才能把握。

(二)今天,我们有可能对上述分野所形成的两条道路——西欧式道路和俄国式道路——作更深入客观一些的评价。前者

的根本弱点在于,把资本主义这个特定历史现象自觉不自觉地当作一个永久现象予以认同,从而愈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本文前面的论述表明,西欧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增长的改良主义、政治策略中的机会主义和理论领域中的伦理主义等等,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但“理解不等于宽恕”,论证历史必然性不等于为历史的错误做辩护。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一味热衷于改良主义的政策曾给西欧社会主义带来多次重大损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革命时机的丧失和 30 年代面对法西斯主义的软弱无力,就是两次明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正式与马克思主义告别,完全把社会主义转移到伦理主义基础上,也是本文所根本不能同意的。^① 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这条道路在争取扩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社会权利,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经济与政治进步以及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等事业中做出了不少成绩,故不应抹煞。从历史“长时段”看,这些成绩是在不断推动社会扩大对现代生产力的社会化管理和控制,从而客观上在为社会主义的彻底改造创造着物质前提。

俄国式道路的贡献在于,依靠革命政党与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的结合,开辟了本世纪落后国家跳跃式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途径,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在往后的发展中,由于未能按照

^① 当然,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元化”中,马克思主义也被承认为有益的营养来源之一。托马斯·迈尔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分支之一(参见他的《论民主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9 页)。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预期的那样得到世界革命的“补充”，它终于在客观形势所迫下走上了“一国社会主义”的艰难路途。在这条道路上，苏俄以及后来沿同一方向发展起来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和辉煌的，其意义在历史上是重大的。但与此同时又不能不看到，在这条道路上，“先天不足”的内在缺陷几乎注定了要带来种种挫折与困顿。列宁作为这条道路的开拓者，很早便感受到这样的事实：在落后的国家中夺取政权容易而建设社会主义无比困难。“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顾准喜爱使用的譬喻，用以描述落后国家夺取政权后的艰难任务）始终严重地高悬在革命者头上。不须讳言，革命的狂飙突进时期人们很少关心这类问题，革命的热情和对未来纯真的憧憬占据了社会的头脑。但历史往后的发展却一再把问题提出来，顽强地要求得到回应。问题的最复杂最困难之处还不在于经济底子的薄弱，更严重的是在于与经济落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薄弱。严密的组织、铁一般的纪律和灵活的策略在夺取政权时固然可以补足阶级力量的不足，但当建设社会主义时，无产阶级的发展不足便显示出了问题的复杂性。它使得本应是一整个阶级的事业的社会主义，不得不由一个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党及其政府去推动。列宁曾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说：“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在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① 这种状况意味着社会主义在颇大程度上要依赖领导者阶层的主观素质，意味着离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直接结合的社

^①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6卷第155页。

会主义理想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在很长时间内,这两种对峙的社会主义彼此视若寇仇,势不两立,都把自己看作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合法代表,而对方则只是一群野心家。但在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能够而且应当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对上述两种社会主义来说,盲目的自满和盲目的虚无都是肤浅的,需要的是冷静客观的历史分析、评价和比较。

(三)任何现象都可从多角度观察。以上是从社会主义理论及目标角度着眼,还可从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总进程的更广阔视角着眼。从这个角度看,上述两条道路又都与它们所处社会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的不同发展方式密切相关。现代化运动是近代以来发轫于西方进而席卷全球的一场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根本推动力,全面波及深入到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等一切领域,使传统的农业社会迅速地过渡到现代的工业社会。这个大变革进程,以其不可抗拒的内在必然性极大地影响着近代世界历史上一切民族和社会发展变迁的具体面貌,也制约着它们内部发生的各种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向。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能维持强劲发展的欧美,本世纪初分化出的西欧式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在较早现代化的、已具备容纳变迁能力的社会中通过表达工人直接利益要求的方式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和制度更新。这与西欧类型的“内源现代化”是一致的。因为,如艾森斯塔德所说,在西方“多元立宪政体”中,“虽然,显然是统治者和那些制定和实施政策的人们发动政治改革和变迁,并提出主要政策,但是,这种变迁的最初的重要推动力通常却是来自这些政体中的各种社会的、专业的或文化的群体、不同的利益集团、社会运动、较为分散的舆论,以及那

些吸引这些群体、争取它们的支持并试图将它们纳入政党框架中的政治精英们”。^① 西欧社会主义通过施加压力和后来直接参政的方式，客观上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俄国的现代化起点全然不同。它的现代化因素不是从社会自身的演变中自然孕育出来，而是从外部先进社会那里直接引进过来。当它开始现代化时，人力资源、经济资源、社会容纳变迁的能力都远为薄弱，妨碍现代化的力量非常雄厚，国际环境也相当不利。1917年革命前由沙皇政府推行的初步现代化虽有一定成效，但制度的弱点也充分暴露出来了，无力应付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动员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的紧张状态。如亨廷顿所说，在经济与社会变革有一定发展但政治现代化滞后的社会中，最易发生革命。^②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起初革命的领导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任务与现代化之间的联系，而只是使自己的任务认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本国现代性低下与社会主义理论设计所要求的前提条件之间的差距，被认为可以用促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来填补。当事实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前所未有的任务必然被提上日程。苏俄领导人不得不承担起曾由维特、斯托雷平们着手实施的工业化设计。这样，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客观上成为一

① S. 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② 参见他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

个现代化连续进程中的有机部分,它的实质在于,在现代性不足
的条件下,运用社会主义理论发挥群众动员的作用,把知识分子
(即西方社会学所说“现代化精英”)与一般劳动群众聚集在一
起,通过革命首先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把社会经济资源和人力
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在国家手中,通过国家权力有计划、有意识
地推行强制性发展战略,大规模自上而下地促进工业化——现
代化运动。在这个进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发挥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使落后的俄国迅速地跨进了世界性工业化大国之列,同时,
它那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实行的
强制工业化,也造成过惨重的损失,并损害了社会主义理想的信
誉。

冷静客观地回顾过去,不论上述两条道路在意识形态上有
怎样的差异,它们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并以不同方式、不同手段
为更高的社会阶段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因为,现代化的
核心在于极大地提高生产力,而不论反现代化论者们怎样说,
我们仍然坚信,生产力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任何理想目标的
实现端赖于此。

|| 主要参考书目 ||

中文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4卷),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关卷,人民出版社版。

《列宁选集》(共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列宁全集》有关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

马克思:《资本论》1~3卷,人民出版社1963、1964、1975。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2~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1985。

《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第二国际第二、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米勒兰事件》,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80。

- 《社会党国际局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贝拉·库恩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65。
-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 1981。
- 《俄国民粹派文选》，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人民出版社 1983。
- 《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 1917 年革命》，德·阿宁编，三联书店 1984。
-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亚·柯谢尔编，中央党校科研办 1985。
- 卫布夫妇：《英国二会运动史》，商务印书馆 1935。
- 恩格斯：《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7。
-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三联书店 1963。
-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 1966。
-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 1963。
- 《福尔马尔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 1966。
-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 1965。
- 《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上卷。
-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 1981。
- 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三联书店 1978。
- 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三联书店 1964。
-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1982。

-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5卷,三联书店版。
-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三联书店 1964,上下册。
-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 1980。
-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三联书店 1966。
- 《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 1979。
-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商务印书馆 1992。
-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1。
- 《布哈林文选》(共3册),人民出版社 1981—1983。
- 周海乐:《第二国际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祖波克主编:《第二国际史》,人民出版社 1984(两卷本)。
- 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4。
- 高放等:《三个国际论丛》,东北师大出版社 1989。
- 戴维·麦克莱兰:《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 1986。
- 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人民出版社 1958。
- 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 1981。
- 高放、黄达强主编:《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 雅克·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 波诺马廖夫主编:《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第2卷,工人出版社 1984。
- 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三联书店 1964。
- 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 1986。
-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 1981。

纳尔斯基等:《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两册)。

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 1965。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 1989。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12 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三联书店 1971。

克拉潘:《1815—1914 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 1965。

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 2、3 卷,三联书店 1976。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三联书店 1978。

贝托尔特等编写:《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 1986。

米勒等:《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求实出版社 1984。

米夏埃尔·施奈德:《德国工会简史》,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2。

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 1984。

亚历山大·泽瓦埃斯:《1871 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三联书店 1983。

切尔涅佐夫斯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尼·尼·波波夫:《苏联共产党(布)历史概要》,中央党校科研办 1986。

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 1991。

波斯别洛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路易斯·费希尔：《神奇的伟人——列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60。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马健行等：《垄断资本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斯蒂芬·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东方出版社 1988。

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求实出版社

1984。

米留可夫：《苏俄革命之研究》，商务印书馆 1933。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 1980。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求实

出版社 1982。

曹长盛主编：《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大学出版

社 1988。

莫吉列夫斯基：《第二国际的复活》，人民出版社 1982。

殷叙彝：《第二国际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6 辑，人民出版社，1979。

李兴耕：《关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对第二国际的

评价》，《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 年第 4 辑，人民出版社版。

吴铭：《论第二国际时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世界历史》

1989.4。

李兴耕:《苏联史学界对第二国际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5。

殷叙彝:《议会斗争与第二国际的策略》,《世界历史》1989.4。

张世鹏:《恩格斯与第二国际的建立》,《北京大学学报》1986.1。

于沪生:《第二国际时期关于工会中立的争论》,《国际共运史研究》第5辑,人民出版社1988。

唐亮、张世鹏:《〈爱尔福特纲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4。

王学东:《伯恩斯坦与爱尔福特纲领》,同上书第17辑,人民出版社1986。

郑异凡:《帕尔乌斯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批判》,同上书,第12辑。

殷叙彝:《西方的伯恩斯坦研究述评》,同上书第6辑,人民出版社1982。

张文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费边社的工人运动政策及其实践》,同上书第17辑。

陈林:《革命与改良之争的由来和演变》,《江西社会科学》1995.7。

李景治:《第二国际内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歧是非原则性的吗?》,《教学与研究》1990.3。

殷叙彝:《“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1。

程人乾:《卢森堡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对罗莎·卢森堡的重新评价》,同上书第4辑,人民出版社1982。

李宗禹:《论罗莎·卢森堡的组织观点》,同上书第8辑,人民出版社1983。

李宗禹:《关于卢森堡的两篇文章引起的争论》,同上书增刊《卢

- 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 1988。
- 王启文：《“灌输论”是谁最早提出来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第 4 辑，人民出版社 1988。
- 王学东：《略论考茨基“灌输论”思想的形成过程》，同上书。
- 李宗禹：《关于“灌输论”的一场争论》，《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 13 辑，人民出版社 1985。
- 李景治：《伯恩斯坦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选择吗？》，《教学与研究》1990.4。
- 李景治：《论列宁建党学说的历史地位》，《世界共运研究》1995.1。
- 商德文：《布哈林和他的帝国主义论评价》，《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2。
- 李景治：《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渊源》，《江西社会科学》1988.2。
- 李景治：《俄国十月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共运》1987.5—6。
- 李景治：《俄国解散立宪会议问题新探》，《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5。
- 刘祖熙：《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比较》，《苏联历史》1986.1。

外文部分

-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 Vol. 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 G. D. H. Cole,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 (科尔:《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简史》),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0.
- T. shanin, *Russia as a 'Developing Society'* (山宁:《作为一个“发展中社会”的俄国》),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5.
- C. E.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1905—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Harvard Univ. Press, 1955.
-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of Rosa Luxemburg* (《罗莎·卢森堡政论文选》),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Dick Howard,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考茨基政治著作选》),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Patrick Goode, St. Martins Press, 1983.
- Dick Geary, *Karl Kautsky* (迪克·杰阿里:《卡尔·考茨基》), Manchester Univ. Press, 1987.
- Massimo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萨尔瓦多里:《卡尔·考茨基和1880—1938的社会主义革命》), London, NLB, 1979.
- T. Bottmore and P. Goode ed., *Austro-Marxism* (博托莫和古德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 David W. Lovell, *From Marx to Lenin* (大卫·罗维尔:《从马克思到列宁》),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4.
- A. Walicki, *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瓦里斯基:《俄国思想史》), Oxford Univ. Press, 1980.
- A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瓦里斯基:《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俄国民粹主义者社会哲学之研究》), Oxford Univ.

- Press, 1969.
- Samuel H. Baron, *Plekhanov-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 (塞缪尔·巴伦:《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 Stanford Univ. Press, 1962.
- A. Ascher, *Pavel Axelr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nshevism* (阿谢尔:《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和孟什维主义的发展》, Harvard Univ. Press, 1972.
- Neil Harding ed., *Marxism in Russia: Key Documents, 1879-1906* (内尔·哈丁编:《马克思主义在俄国:1879—1906年间重要文献》), Cambridge: the Univ. Press, 1983.
- Michael Haynes, *Nikolai Bukhari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海恩斯:《布哈林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1985.
- M. Donald, *Marxism and Revolution, Karl Kautsky and the Russian Merxists, 1900—1924* (莫·唐纳德:《马克思主义与革命, 卡尔·考茨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1900—1924》), yale univ. press.
- T. Sharin, *Russia 1905-1907, Revolution as A Moment of Truth* (山宁:《1905—1907年的俄国, 一场关键时刻的革命》),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1986.
- Alvin w.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古尔德纳:《两种马克思主义》),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0.
- John Thompson, *Revolutionary Russia 1917* (约翰·汤普森:《1917年的革命俄国》),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1.
- Jane Burbank, *Intelligentsia and Revolution, Russian Views of Bolshevism, 1917—1922* (布尔班克:《知识分子与革命》, Oxford U-

niv. Press, 1986.

Vera Brodovitch, *Lenin and the Mensheviks: the persecution of socialists under Bolshevism* (维拉·勃洛维茨:《列宁和孟什维克》),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87.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E. H. 卡尔:《1917—1923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8.

David W. Morgan, *The socialist Left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917—1922* (大卫·莫尔根:《社会主义左派与德国革命:1917—1922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史》), Cornell Univ. Press, 1975.

А. ф. Вовчик: Политика паризма по рабочему вопросу в пред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1895—1904) (А. ф. 沃夫奇克:《革命前时期(1895—1904年)沙皇政府的劳工政策》, Львов, 1964.

И. М. Кривогуз: Второ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889—1914 (И. М. 克利沃古兹:《第二国际》), Москва, 1964.

考茨基、帕尔乌斯等人在《火星报》上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央编译局1959年《火星》影印本)。

Г. В. Плеханов: Сочинения, М. - Петро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版, 有关卷。

|| 后 记 ||

这本小册子,篇幅虽然不大,从草写到定稿迁延时间却很长。它的最初的轮廓,是发表于《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的《论第二国际时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一文(署名吴铭)。^①当时本打算沿着这个主题扩展下去,写一组文章,对本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发展和演变勾划出一条有统一联系的线索,但随后几年,先是当时的政治气氛,后来是自己工作的忙碌,使得这个计划搁置了。等到再回到这个主题时,已经到了1995年。这本小册子是1995年10月到1996年3月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时写的。

^① 作者最近偶然发现,1995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进程》的论文(后收入会议论文集出版),多处照录了作者这篇文章的一些主要论点,但却不注出处。鉴于这些文字与本书有密切关系,故在此说明情况,澄清责任,以免误解。

从那时起,忽忽几年又过去了。这几年间,有感本书论述过于简略粗疏,一直想在具体分析和史料运用上做些补足工作,但手头的任务和琐事使作者无法如愿,现在只好按原样提交给读者了。唯有第四章和第六章,是后来按照友人的建议加上去的。

读者大概可以看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有别于传统看法。至于这些观点是否有道理,当然只能由读者去评判。作者真诚地希望听到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尤其欢迎不同观点的争论。只是,批评应当是以真诚无私的理论良心和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为基础,应当是对所讨论对象有最起码的了解为基础,无知和偏见是不能当作论据的。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并不多余。作者就曾遇到过这类批评者,他们对问题差不多一无所知,却摆出一副裁判官的吓人面孔。

这本小册子在成书过程中,得到过众多学界前辈和朋友们的关心。中央编译局为本书提供出版基金,李宗禹、殷叙彝、郑异凡、胡文建、张海滨诸位先生通读全稿,多所帮助。在不少场合,一些本来并不熟悉的朋友也都曾关注有关此书的种种经历。对于所有这些关心、支持和爱护,作者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张光明

1999年5月于北京

|| 附 录 ||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

马克思学说的核心之一,是宣告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然而,预言资本主义灭亡,并非马克思学说的独创。早在马恩之前,就有人激烈抨击资本主义的弊病并宣布它的灭亡结局了。马恩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不是简单地从道义角度谴责资本主义,而是始终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个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并以此为中轴,去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未来前景。这就使他们的学说具有超越主观好恶,超越道德评价狭隘眼界的巨大世界历史感。也正是这一点,使马恩学说一经产生,就令其他任何社会主义流派相形见绌,并很快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公认指导理论。

然而,马恩身后的百年历史,也向他们的学说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资本主义在西方的长期延续和社会主义在东方的意外突起,不仅为马恩所未曾预料,而且似乎也超出了他们的理论框

架。于是,理论受到了质疑,不仅政治结论,而且连构成其基础的方法论都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公开诘难或暗中修正。许多亲自经历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对他们从事的活动与理论之间的明显差异困惑不解。著名的克拉拉·蔡特金便心存疑虑地指出,现实表明革命不仅有赖于经济条件,而且有赖于无法捉摸的主观意志因素。^①沿着这种明显的二元论思路,斯大林时期发展出一种大不同于马恩唯物史观的、以经济宿命论加主观意志论为特色的历史解释,其影响至今尚未消除。

克服这些疑难的最好办法,是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发展唯物史观去真正解决历史问题,使理论的有效性再次得到验证,因此,不能不首先对马恩所处的时代做一番再考察。

今天,我们仍不能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出色论述,极其准确地把握了近代世界运动的脉搏。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②,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近代以来工业化运动——或者使用一个更具涵盖性、但不算确切的名词:现代化运动——的展开过程。这个过程在19世纪中期达到第一个高潮,这便是从英国开始、随即扩散到欧洲大陆和北美的产业革命。借助于蒸汽机的威力,资本主义制度在对封建势力的战斗中节节胜利,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领域,一步步把昔日显赫的专制贵

① 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辑第249页。

②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卷第279页,第125~126页,第554页。

族势力逐出历史舞台。不仅如此,“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①,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以世界为活动场地的。19世纪工业革命更加速了资本主义向全球拓展的势头。以伦敦为中心,势力所及囊括中亚、远东、拉美的世界市场已具雏形。所有这些,在马恩的著作中都有深刻的阐述。

与上述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相伴随的,是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中世纪的神学思维方式为科学求实的思维方式所替代。理性主义思潮统治了整个19世纪。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传统,由康德发端、黑格尔集大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由法国启蒙学者开启的政治民主主义思潮,事实上都属于这一理性主义思潮,代表了它的突出成就。而马克思学说,从社会思潮渊源这个大视角来看,应认为也属于19世纪理性主义思潮。但马恩的伟大贡献和突破在于,他们不是从精神的这种那种样式,而是从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中寻找历史进步的阶段性、规律性;他们不是听任规律的自发调节去达到人们活动的合理性,而是进一步诉诸基于把握规律性之上的自觉性和目的性;他们不是满足于机会、契约的一般平等,而是要求把政治、法律的平等和民主扩大到生产资料占有制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民主。所有这些,都那么严密地组织在一个具有强大逻辑力量的理论体系中,从根本上突破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反转来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这可以说是把19世纪理性主义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峰巅。

但另一方面,立足于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应看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基本上还处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蒸汽机革命所

^① 《资本论》第3卷第279页,第125~126页,第554页。

推动的工业生产力,无论是对社会的改造能力和对世界市场的扩展能力,都还相当有限,何况蒸汽机革命直到19世纪下半期才在欧洲陆续完成。与这种经济状况相适应,资产阶级当时还正作为新兴的“暴发户”向传统专制贵族势力争取权力。尽管英、法、美资产阶级大革命早在19世纪以前便已发生,但资产阶级所拥有生产力的不足,使它当时不能获得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全面领导权。只有当它能够借助于蒸汽机的威力时,它才或通过政治改革(英国)、或通过王朝统一战争(德国)、或通过民族统一运动(意大利),逐渐取得对社会的统治,而这已经差不多是19世纪晚期的事了。

换一个角度看。一般说来,判断一种社会组织是否成熟,应看它是否具备完善的自维持、自调节、自平衡、自修复能力,能否在各种相互关联的要素互动中有效地保持与内外环境的平衡。由此观之,19世纪资本主义由于物质实力的薄弱,还不能达到这一高度。生产力的不足,促使资产阶级只有尽量运用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的方式榨取剩余价值,并尽可能地把工人工资压至劳动力价值之下;由此而必然引起的工人反抗,只有经常使用政治暴力强制手段去解决;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便不可能实现对工人阶级心理的控制,从而使工人阶级始终处在社会的尖锐对立中。上述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状况决定了社会矛盾的经常激化和周期性动荡。而每一次动荡带来的都是生产力的大破坏、人民生活的极度恶化,直至政治流血冲突。19世纪工人暴动起义不绝,要不是工人阶级也还相应地处于不成熟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可能被一举颠覆。但历史决定了工人阶级只能是以自己的一次次失败,逼迫资产阶级充当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促使社会向一个更高的成熟阶段迈步。

上述社会背景,使我们可能对马克思学说做出更清晰一些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它的历史地位,但在对未来进程的估计上却大大超前。而这两方面同样都与早期资本主义的现实有关。正是由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不完备,使得它的基本矛盾以缺少控制的、尖锐突出的形式暴露出来,才为马恩这样的天才人物剖视它的固有弊病提供了可能;同样的现实却又在另一方面局限了他们的眼光,使资本主义的灭亡呈现为一个十分迫近的过程。黑格尔说得好:任何哲学都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希望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的时代是不可能的。^① 这句至理名言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学说。

由此引出下面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以其严密的逻辑力量和远大的世界历史感,而具有长久的认识价值;但他们对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性质和后果的分析,则应根据我们今天对历史进程的新认识给以更精确的估价。

二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大特点是,从不固步自封,总是不断根据现实的变化和新经验修正补充自己的理论。这一点,在晚年恩格斯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整理出版亡友遗稿的工作耗去了恩格斯的大半精力,但他仍然密切地观察着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

^①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尽管当时第二次工业革命还刚刚开始不久,其深度、广度和力度还远未显现开来,90年代初的恩格斯却已敏锐地感受到了它的某些影响。

首先,他明确地认识到,他和马克思先前对历史进程的估计过快了。现在他公开承认,当时世界市场还只是“潜在的”,1867年之后的历史发展才导致“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①;英国现在还只是刚度过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②。第二,他抓住了这样一个重大事实,即资本主义愈益褪去早期那些赤裸裸的野蛮压榨色彩,采取了比较文明的剥削方式;工人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就只能到制度本身而不是一般现象中找。第三,他指出(尽管当时还只视英国为特例)下述事实:大工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愈来愈感觉到工人的罢工、结社等活动对他们的益处,从而由竭力压制转为默认甚至支持。“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③ 所有这些,无疑会对社会主义道路发生潜在影响。

基于形势的改变,晚年恩格斯以很大热心关注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斗争形式。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内外影响的增长极为满意,寄予厚望,甚至确信沿着这条稳健道路,在不久的将来便能有把握地取得政权。他激烈反对那些要求尽早行动的

① 《资本论》第3卷第279页,第125-126页,第5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5页,第279页,第460页,第2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5页,第279页,第460页,第215页。

冒险鼓噪,认为那只会把革命者自己毁掉。他认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① 正确的策略应当是提高理论素养,扩大影响,积聚力量,准备未来的“决战”。正是在这个时期,恩格斯说出了那句名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②

恩格斯晚年的许多论述,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先前理论的再认识,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但19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部历史影响,只有很久以后才能辨认得更加清晰。

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无法比拟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新生产部门的兴起,通讯交通工具的重大改进……在生产和生活方面都造成了决定性变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无比提高,以至不仅流通、而且生产本身都成为跨越国界的世界性过程。人口的大规模移动,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的加速城市化,在工业化国家成为普遍趋势。正是在这个时期,统一的、以紧密联系为特征的世界体系基本形成,从而,工业化——现代化运动借助于先进工业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影响、冲击,扩展为全球性运动,使各民族的历史从此真正整合为统一的世界历史。但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在世界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差别,使它们承受、运用世界现代化运动总体成果的历史际遇大不相同。由此,世界总体力量与不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5页,第279页,第460页,第215页。

地区特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各地区发展既有统一的物质内容,又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恩格斯逝世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演变的复杂历史,归根结底也要从上述世界总进程的大背景上去理解。

三

20世纪以来,在由欧美工业化国家组成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社会主义运动总的趋势是日益合法化和改良主义化。这是不奇怪的。正是这一地区,依赖先行工业化的有利条件和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运用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成就,从19世纪末开始迈向资本主义成熟时期。这一过渡持续了好几十年,但首先是从调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开始的。其一般表现是,社会或通过个别资本家的自发活动,或通过国家的自觉活动,使工人争取自己待遇和地位改善的活动合法化、程序化,把工人阶级与资本的斗争维持在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减轻和疏散矛盾的破坏性,使之转化为促进社会自我调节的必要环节;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心理逐渐发生“一体化”,与社会的改革产生利益一致感,从而屈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语)。通过这种途径,资本主义建立起有效的自调节、自维持、自修复机制,度过了本世纪上半期的好几次大危机,逐步完成了从古典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在上述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必然地发生相应变化。从第二国际时期开始,伴随着议会合法斗争的成就,改良主义不可遏制地蔓延开来,历经演进,终形成今日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是晚年恩格斯也始料未及的,但却应看作是社会生活深刻转变的合乎规律的后果,它表明资本主

义不仅在 19 世纪,而且在 20 世纪仍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充分余地。

而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由受世界影响、靠政府实行自上而下输入工业化而展开现代化过程的国家组成),社会主义遇到的是不同的条件。这里的资本主义在起步时步履蹒跚,困难重重。处在转变中的社会既吃资本主义之苦,又吃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之苦。孱弱的资本主义缺少物质实力来维持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它只有仰赖专制势力来压制工人阶级的反抗,其结果就使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否定。这些表明,这里的资本主义尚未具有成熟时期的基本特征,还处于不稳定的早期阶段。但世界历史的整体联系性发展却注定要改变先前历史发展的一般程序。社会主义学说由西欧的输入,高度成熟的革命政党的形成,一旦找到与本地工人大众反抗力量的恰当结合方式,便不可避免地要打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把社会跳跃式地引进社会主义轨道。俄国做到了这一切,于是俄国变成了苏联。

在上述两类地区之外,广大落后的非工业化国家组成资本主义外围地区。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廉价劳动力供应地 and 产品销售市场,在世界体系中居于从属、依附的地位。在外部资本主义工业化力量的冲击下,它们原有的传统社会趋于瓦解,民族生存岌岌可危。要生存和进步,唯一的出路是顺应世界大势,使自己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又必须以政治革命为先导,摆脱外来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内部传统保守政治势力的阻碍,为工业化扫清道路。为完成这一任务,落后国家的先进知识界几乎无例外地经历了长期的思想探索过程。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改造方案中,社会主义学说显示出

突出的吸引力。它以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契合了饱受西方资本主义压迫之苦的落后国家爱国者的需要；它那对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的历史预测使落后国家找到了一种明确的理想目标；经列宁主义发展了的革命组织策略则十分适用于把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凝聚起来；因此，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在许多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中被接受、运用和改造，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手段，对争取革命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一系列东方国家，都是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夺取了政权，完成了现代化革命的第一步，并继而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

总结过去可以看出，20世纪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发展，一方面显示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其广度远超过马恩的视界；另一方面其线索却又变得复杂难解，实践与理论相比往往发生偏离甚至“变形”。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地带并未按预计的那样步入社会主义，落后的许多东方民族却抢先跨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无怪乎人们在现象的复杂性面前大惑不解，要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了。

但若以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历史命运是失败，则又大谬不然。首先，我们上面的分析证明，20世纪社会主义进程之所以打破了传统的理论模式，归根结底在于生产力的世界性扩展所造成的相互作用。而这恰好表明，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提供一条理清线索的思路，只不过在这里需要的是世界性的视角而不是狭隘的民族视野。其次，20世纪社会主义实际进展的跌宕起伏恰也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深刻性和预见力。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使人们看到，在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新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促使资本主义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着深刻

的变化,19世纪用流血也不能取得的东西,现在在生产力的魔力下自然地成为现实。这不就是那个经常被思想肤浅者嗤笑的“历史必然性”吗?沿着这条道路,以马恩所未预见的方式去接近他们的历史预见,难道是不可想象的吗?在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波三折、困难丛生,甚至出现大反复,也只能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恩格斯曾经说过,革命者往往在开始时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我们看到,1917年后的俄国革命家们并没有成为例外,他们以为,他们是在为—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点燃信号。但列宁在20年代初便初步意识到,说到底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先完成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在这里只能首先是现代化进程的手段。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任何理想和热情都违拗不过它。对此,我们在今天是看得更明晰了,而这,同样得益于马恩的唯物史观。

四

当我们回到本文标题的时候,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结论应当是:在马克思学说中,构成其灵魂的哲学——历史方法论要比结论甚至理论框架具有更大的价值。恩格斯说过,在一切哲学家那里,体系都只是暂时的东西。^①但包括在体系中的真正有价值的方法却可以长久地启人心智发人深思。一般说来,结论总不免受到时代条件局限,它们可能在历史中过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5页,第279页,第460页,第215页。

可能有必要做重大修正,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正确的方法却能给人们指出独立探索的合理途径,并且能够反过来检验结论本身。因此,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方法永远先于结论。^①

这句话用于马克思学说也是对的。应当承认,由于历史的巨变,马克思恩格斯百年前的不少结论确已失去时效。但要透彻地了解历史巨变并得出相应结论,他们所制定的方法却仍然必不可少。对一种思想体系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成就了。这也正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遗产。珍视这份遗产,真正研究它和发展它,应当是恩格斯逝世百年之际的一项重要任务。

(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年第四期)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84~185页。